

# 炎黃春秋

親見親歷 真個性與權威性并舉

翔實生動 可讀性與資料性兼能



為毛澤東與魯迅  
架橋的馮雪峯

迎春晚會事件  
披露始末

伍傳權：

60年代國聯共運大論戰的臺前與幕後

李德生：從廬山會議到 9.13 事件的若干回憶

範曾的  
辭國回歸與婚變



1993 年 範曾 訪問

# 神秘的 紫禁城

摄影 / 李少白





## 从庐山会议到 9.13 事件的若干回忆

从庐山会议到发生 9.13 事件,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个时期,本文作者李德生上将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以权威知情人的身份,回顾了这一关键时期发生的一个个重大事件,披露了林彪出逃经过,以及毛泽东与周恩来怎样冷静处理这一事件的始末,许多材料鲜为人知……

## 60 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

60 年代,国际风云突变,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裂。那么,这场论战缘何而发?周恩来怎样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赴苏?这中间发生了哪些从未见诸于报章的秘闻、轶事?曾任中联部部长伍修权的文章,一定会使您获得全新的感受……

## 范曾的辞国、回归与婚变

范曾是几乎家喻户晓的画家,他一再制造新闻,引起人们的关注。作者与范曾夫妇交往近二十年,对范曾深有了解。他以权威、知情人的身份向人们披露范曾出走法国、在法国的种种遭遇,他如何决定回国,他与其情人楠莉关系真相以及他与边宝华最近离婚的详尽具体的经过……

## “迎春晚会事件”披露始末

1964 年,中国文联组织了一个迎春晚会,参加晚会的两个人回来后向中央写了一封揭发信,毛泽东阅信后颇为愤怒,写下了那个著名的批示,认为文艺界如不加以整肃,将会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从此,文艺界大祸临头,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纷纷罹难!事隔 30 年,那两位“打”了“小报告”的当事人向记者披露了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

## “剿共名将”张辉瓒的“辉煌”与哀伤

“前头捉了张辉瓒!”国民党著名将领张辉瓒因了毛泽东这句词而广为人知。本文披露了张辉瓒被捉、被杀经过,以及蒋介石如何安葬张辉瓒的种种鲜为人知的轶闻逸事。

## 开国第一假药案

一个制造销售假冒伪劣药品长达 7 年之久的土窝子为什么坚不可摧?他们的伪劣药品使多少人身受其害,痛不欲生?在审判假药案主犯的法庭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党政领导干部被同时押上被告席?开国第一假药案的真相真是令人发指,触目惊心!

## 本刊特稿

- 从庐山会议到 9·13 事件的若干回忆/李德生 4  
60 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伍修权 12

## 求实篇

- “迎春晚会事件”披露内情/刘天鸣 26

## 英杰谱

- 张震将军与长江三峡/卢江林 19  
李立三夫人再谈李立三/李思慎 22

## 人海浪

- 范曾的辞国、回归与婚变/南友 30  
国门内外的“倒爷”们/德奎 36  
天桥杂趣/新风霞 39  
北京 101 中学校长王一知和她的学生们/徐然 42

## 赤子心

- 第一个拥抱奥斯卡金像的炎黄子孙/爱真 62

## 殒星篇

- 为毛泽东与鲁迅架“桥”的冯雪峰/辛平 64  
作家肖军与胡乔木交往轶事/王德芬 74

## 法纪苑

- 开国第一假药案/马先明 47

## 春秋笔

- “剿共名将”张辉瓒的“辉煌”与哀伤/冯都等 80  
我在巴黎通电起义始末/凌其翰 91

## 古镜台

-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孔茂山 78  
大英帝国与东方睡狮的初次碰撞/葛承雍 87

\* \* \*

# 炎黄春秋

1993/11(总第 18 期)

## 本刊 重要 启事

###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sup>翥</sup>系青

###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锲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副总编辑:刘家驹 杜卫东

总经理:徐 孔

理事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书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

邮编:100802

本刊自创办以来,已出版19期,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发行量逐月上升。但由于发行渠道不够畅通,仍有许多读者来信反映难以按期购阅本刊。为此,本刊从1994年开始已交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向全国邮发,每月20日在北京出版。目前,各地邮电局(所)正在办理本刊的订阅手续,欢迎您速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82-507。如您在邮局漏订,亦可向本刊办理邮购。(每册3.20元,另加收邮费0.3元)款寄:北京市文津街7号《炎黄春秋》杂志社邮购部李小姐收。邮编(100802)。

新的一年中,本刊在保持刊物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开拓进取,革新版面,推出一系列重大选题,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以不辜负您的厚爱。

# 从庐山会议 到“九·一三”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光辉的也充满波折的一生。

我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一名红军老战士，从1969年起又曾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四年多，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记叙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前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史实，作为对一代伟人的纪念。

1969年7月党中央决定调我到北京工作。当时我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开始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又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记得到北京后没几天，总理就带着我去见毛主席。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坐在一起，心情既激动，又有些紧张。毛主席随手拿起总理放在桌上的眼镜戴了一下，问我戴不戴眼镜，就这样亲切地开始了同我的谈话。谈话中，主席向我讲了党的斗争历史，还问我看什么书，并且谈到可以看看《红楼梦》、《天演论》和

《通鉴纪事本末》。在总理向主席谈了对我的工作安排后，我感到担子太重，提出职务太多，安徽和南京的工作是不是免掉。毛主席说：

“一个也不要免，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面搞调查研究。”后来，我一直是按主席的这些指示去做的。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我到生产落后的安徽淮北去搞调查研究将近一个月，接到会议通知后，就从安徽直接上庐山。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那天，是毛主席主持会议，周总理宣布了会议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按宣布的程序，下面应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可是这时林彪讲话了。当时认为，虽然总理宣布的会议程序中没列入这一项，但林彪是党的副主席，他要在康生前面发言，也是正常的事。林彪在讲话中大谈毛主席的天才，说“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导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等等。林彪讲话后，当天晚上在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的会上，吴法宪突然提出要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讲话。会议也就作了这样的安排。

第二天在各组讨论中就出现了问题。林彪一伙按事先密商的口径，照叶群的部署，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要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本刊  
特稿

# 事件的若干回忆

□李德生

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正式提议，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林彪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他在这次会议上又重提此事呢？原来林彪认为，毛主席早在1959年66岁时就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1970年77岁，不可能再重当国家主席。只要有了这个职位，毛主席不当，就会轮到自已了。林彪想当“国家元首”，“国家元首”这个词就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讲的。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很早就

作了准备。上庐山后，他们又急急忙忙拼凑了一些语录，经陈伯达选阅后，连夜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了一些人。林彪讲话后的第二天，除叶群部署她手下几员大将在各组鼓动外，陈伯达在华北组作了一个发言，其中讲到：“竟然有个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



想。”“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为了尽快配合行动，将发言稿作为华北组2号简报，于25日一早就发到了与会者手上。

据后来揭发出的材料，林彪在听秘书读简报后，高兴得笑起来，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大家都以为林

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陈伯达是中央常委，他的发言份量很重。所以这份简报一出，会议整个气氛都变了。会上会下议论纷纷，会议日

程全被打乱。而且矛盾激化到要毛主席亲自作出裁决的地步。

会议下一步如何进行？大家十分关心。

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大组长也参加。毛主席采取断然措施，在会上作了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主席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主席的批评很重，形势急转直下，大家终于明白，这次声势不小的风波绝非偶然。

几天后总理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我回北京主持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把黄永胜换上山来开会。李先念同志也回北京，换回纪登奎同志上山参加会。随后我和先念同志乘汽车到九江，等北京来的飞机。不久飞机来了，黄永胜、纪登奎下了飞机，我们就乘那架飞机返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山上的有些情况当时不太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9月1日毛主席在庐山

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送到北京后，我仔细看了几遍。毛主席的这篇文章，点出了事情的性质，公开批判了陈伯达，但对林彪还是采取“保”的态度，给他以觉悟认错的机会。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书面检查。毛主席看了他们的检查后，进行了严

厉的批评。1970年10月14日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1971年4月15日毛主席在叶群的检讨书上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这最后一段讲政策的话，是毛主席当时的指导思想，后来事实证明，毛主席主要是要让他们认识错误。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





题。华北会议从1970年12月22日开到1971年1月24日。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我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毛主席在我的任命宣布前亲自和我谈了话。

在华北会议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到北戴河见了林彪以后，他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从北戴河回北京后，总理又带我们一起去见了毛主席，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因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有说什么。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99人参加，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会议上做了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底，七个多月中，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

讨，毛主席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绝于人民。

经过批陈整风运动，毛主席从大量揭发材料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南方巡视。他先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南昌、杭州，一路会见了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并着重讲了1970年庐山的这场斗争，指出：“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员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说：“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还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

左起：吴法宪、林豆豆、叶群、林立果



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主席8月31日到南昌后，获悉林彪集团骨干分子周宇驰曾到江西把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进一步引起了警觉，于9月3日，离开南昌到达杭州。

毛主席沿途找各地负责同志谈话时，一再强调他的谈话不能传，可是9月5日当李作鹏因外事活动到武汉时，刘丰却把毛主席的谈话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于第二天一回到北京，就将此信息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就在电话上告诉了叶群。9月5日深夜，林彪在广州的爪牙将毛主席讲话内容密报北京的于新野，于记了十五页，在9月6日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送给了林彪、叶

群、林立果。两路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吓得林彪一伙失魂落魄。惊恐之余，狗急跳墙，他们决定下毒手谋害毛主席。

9月8日，林彪亲自用红铅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同时叶群给黄永胜送去密封亲后信件：“现在情况很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后来审判罪犯时，他们供出林立果和同伙研究谋杀毛主席的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高炮改装，平射火车；三是让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带上手枪，在毛主席接见时，在火车上动手。

毛主席到杭州后，叫把专列转移到绍兴。9月10日，毛主席突然决定下午走，也不要人送行。离开杭州。3个多小时后，到了上海。他没有下车，叫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第二天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由人领着他的汽车直驶毛主席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完话，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吃饭。汪东兴送走他们后，刚回

来，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

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从9月8日到11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一直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方案；有的提出在上海虹桥机场放火，乘乱干掉他，有的提出用火焰喷射器烧；有提出用飞机轰炸。还有一个方案是在苏州硕放铁路桥炸火车……此一方案还没有来得及执行，毛主席的专列已安全通过硕放桥，飞驰北上，一路不停。通过了蚌埠——济南——

1973年李德生（左一）与叶帅等在《毛主席在庐山》油画前合影



到了天津。毛主席叫停车，嘱咐随行的张耀祠：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火车站来见我。我们在1971年9月12日12点，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见到了毛主席。汪东兴同志也在座。毛主席长途南巡归来虽然一路疲劳，而且思虑着同林彪一伙斗争的大事，但他精神很好，和往常一样，谈话十分幽默。他先问了我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这次接见的正题。他说：“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接着又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筒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是有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顶六万句，他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这时，毛主席对着我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一年说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指的是他们不发“天才论”语录给我的事。我在一次会上提起过，毛主席当时就说：“你向他们要呀！”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毛主席又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这句话已等于点林彪了，最后毛主席要我去执行一项任务：调一个师来南口。当时毛主席不但十分警惕，而且已作了具体部署，对林彪一伙可能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离开毛主席，我立即部署了一个师的调动。

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大事。

9月12日晚上，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会议由总理主持，讨论他即将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黄、吴、李、邱

也参加了会议。

10点多钟，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部队直接给总理打来电话，说林豆豆报告：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山海关的飞机外出，时间是明天（13日）早上6：00，目的地是广州……。黄、吴、李、邱是他们一伙，预定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总理对这一情况的出现，也十分意外，他紧皱眉头，叫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总理立即向吴法宪查问：空军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并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吴法宪支吾回答，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说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总理命令：“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马上回来。”

这时林彪、叶群得知总理查问三叉戟飞机的事，更加惊慌，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在晚上11：22分，叶群故意给总理打电话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总理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下动？”叶群答：“空中动。”总理又问：“你那里有飞机吗？”叶群说：“没有。”叶群一句话露了马脚。总理这时已知道山海关不但有256号三叉戟，还有几天前他们调去的一架伊尔——14。叶群的撒谎，证实了他们企图南逃的阴谋。总理立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因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的命令才能飞行。”而李作鹏却将总理指示篡改：“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这时总理不断进进出出，我知道有些新的情况发生了。

到9月13日零点32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山海关机场曾三次报告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然没有下令阻止起飞。总理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一些事情，回来后立即对我说，林彪乘

本刊  
特稿

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阵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实际上，我五天五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军司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总理曾问调度员：“用无线电向 256 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说：“能听到。”

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总理说：“那就请你向 256 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报告总理：“他不回答。”

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又调转方向往北飞的。

我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航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

“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这是空军指挥所，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他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9月13日凌晨那架飞机出了国境。

我及时报告了总理。

凌晨 3:15 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天上向张家口飞去。”我立即报告总理，他请示毛主席后，指示说：“要它迫降，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我命令北空起飞了八架“歼 6”拦截，迫使直升机回头，迫降在怀柔境内。周宇驰打死了驾机回返的陈修文同志后，与于新野自杀了，李伟信被活捉。

林彪乘的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么结果？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往苏联，毛主席、周总理都商量好了应付一切由此而引起的事件。

林彪出了事，必须以最快速度告诉各地领导，方能应付意外事故的发生。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待一切安排妥当，总理已五十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到了 9 月 14 日，下午 2 点，总理刚

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特急电报，只好把总理又叫醒。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林彪所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已于 13 日凌晨 2 时 30 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后，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我连夜组织搞清查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词，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



吴法宪受审时

罪证。其中有谋害毛主席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等等重大罪证，我即派专人送给了总理转呈毛主席。

这时空军成立了曹里怀同志等组成的五人小组协助我工作。

在清查工作中，毛主席十分强调掌握政策，再三指出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

甚至具体地说：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使清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从1971年12月到1972年1月，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文件，向全国人民彻底揭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对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历史贡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识破了林、陈反党集团的阴谋，但仍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人进行了严肃

的批评，耐心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挽救帮助，但林、陈反党集团的一伙人不思悔改，最终走上穷凶极恶，准备搞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的罪恶道路，值此危急时刻，毛主席亲自到南方巡视，接见党政军领导，不但在要害地区完成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防范，而且机智地脱离了险境安全回京。林彪集团见到一切阴谋诡计均被粉碎，最终选择了

仓惶叛逃的道路，落得个摔死异国的可耻下场。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对“文革”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亲自着手纠正一些过“左”行为，如指示尽快尽多的解放干部。林彪搞“战备疏散”给弄到外地去的老师 and 老同志们，也都先后请回了北京。

朱德同志回北京后，总理和我陪同他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朱总就说：“人家说你是黑司令，什么黑司令！你是红司令嘛！”

林彪摔死后，毛主席让叶剑英同志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解散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由叶帅主持。毛主席交待这项任务时，也是总理和我陪叶帅去的。毛主席见到叶帅后，当面向叶帅否定了所谓“二月逆流”的说法。以后又在公开场合多次讲了这个问题。

这之后，毛主席又亲自批示了大量解放老干部的信件和申诉给我，让总政办理。在周总理，叶帅领导下，我们做了艰巨的工作，顶住了“四人帮”的阻挠，使得军队大批高级将领得到解放。

“四人帮”粉碎后，到1980年11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陈伯达、黄、吴、李、邱及王、张、江、姚等一伙罪大恶极的罪犯，终于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分别判刑。

历史又一次证明，一切反人民的罪人，都逃不脱人民的惩罚，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李德生同志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出版物题词  
甘耀稷 摄



# 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

伍修权

据师哲同志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等中国同志说，依我看来，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得了胜利，将来就会在中国发展，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

我不知道这话对毛泽东有过什么影响，但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世界革命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出现了谁听谁的，即谁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的问题。尤其是赫鲁晓夫上台以来，他继承了斯大林在党的关系上的“老子党”做法，在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作风。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和极力抵制，自视为“正宗”马列主义的苏共头头处处咄咄逼人，从来不买外国人账的中共领袖常常寸步不让，这就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从而导致了中国党对苏共方针路线和内外政策的全面抵制和公开批评，最后造成了国际共运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60年代初，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及世界各国的马列主义政党及其组织，全都一分为二，重新划线站队，绝大多数党或国家本着传统做法支持苏共，也有少数国家的党或小派别，赞成或同情中共，各国各党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这场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共产党之间的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当然地成为“交战”一方的最高决策人和战略总指挥。

在此之前，我已从外交部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由从事政府外交转为党内国际联络工作，因此也直接参与了这场针对苏共的名为“国际反修斗争”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事情是从斯大林辞世几年后开始的，先是赫鲁晓夫苏

1963年1月毛泽东亲率中央领导人去机场欢迎邓小平、彭真等（右起第3位为伍修权）



共 20 大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动摇混乱，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中国党虽然力求维持表面上的中苏团结，实际上是反对苏共的许多做法的，赫鲁晓夫对此也心照不宣，对中国党的不紧跟他们十分不满。50 年代后期，他们的不满日益公开化，苏共一面对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国内政策表示批评和反对，又在当时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偏袒印度一方，赫鲁晓夫甚至在我国建国 10 周年庆典时，不指名地攻击我国是“好斗的公鸡”，又在种种场合用各种方式批评指责我国的内外政策是“实际上反动的”、“冒险主义”、“唯意志论”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等等。毛泽东本来就对赫鲁晓夫不大恭维，这一来就使矛盾激化了，我们许多人也就成了中苏两党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二人对奕争雄的棋盘上的“兵卒”或“仕相”。

1960 年 2 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欧几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我国派出了“观察员”身份的代表团，我是代表之一，康生领队。当时赫鲁晓夫正鼓吹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苏联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单方面裁军 120 万，华沙条约各国也跟着裁军共达 380 万人，又宣称要同美国等西方大国签订互不侵犯和

裁军、禁止核试验等一系列协议。康生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在会上作了主题相反的发言，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国际形势的好转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帝

## 本刊特稿

国主义性质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所有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协议，对我国一概没有约束力。赫鲁晓夫对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很恼火，在招待会祝酒时，就不指名地说中国党在拆苏共的台，暗骂中国领袖是“应该扔到墙角去的破套鞋”，又在其他场合多次批评中共的主张和做法，我国代表团向国内报告后，又奉命作出了回答，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和国际混战，就此揭开了序幕。

当年 4 月是列宁 90 诞辰，经毛主席决策并审改，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重要文章。文中按毛主席的观点及要求，对苏共的思想路线及其内外政策，引据马恩列之经典，作了全面、系统和严厉的批判。其批判对象虽然只提了南共“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但谁都知道其矛头是直指苏共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苏共对此当然不能沉默，马上与各党通气，决定利用当年 6 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代大会，约集各国党领导人，讨论和解决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歧。毛主席决定由彭



真、康生和我加上驻罗大使许建国等，组成代表团赴会。出发前先集中在钓鱼台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研究制定赴会后的方针政策。我们按时出国并与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五月一起参加了罗共的大会。赫鲁晓夫亲率苏共代表团先我们一天到达，他们不仅利用罗共大会讲坛在致词中不点名地指责了中共，更在当天向各国代表团散发并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中公开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

的程度，我见代表团长彭真有时也情绪激动得难以自控，就悄悄给他递过去一张写有“哀兵必胜”的字条，一面表示支持，一面让他压压火。当时担任现场口头翻译的是闫明复，这次显示出了高超的翻译水平和很强的思辨才能，准确而有力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与意志，反而使赫鲁晓夫等围攻者常常慌不择言甚至语无伦次。

苏共原想利用这次机会压服中共，结果只“打”成了平局，反而使分歧更明显、矛盾、更

尖锐了，他们岂肯就此罢休，经过组织发动和挑拨收买，使本来只是中苏两党之争，变成了中共与各国党之争，并且使本来主要是党内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观点之争，很快转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布加勒斯特会议一结束，苏共中央就通过苏联政府通知我，将按照协定来华帮助建设或进行合作的苏联专家，立即全部撤走，并中止执行和片面撕毁几百项协议、合同，又找岔子驱赶我国外交人员，在中苏边界上挑起纠纷，一时真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是，毛

主席镇静又充满信心地指挥全党全国，顶住了突然而来的恶劣形势，迅速组织了反击，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立场，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尊严，使赫鲁晓夫等人未能完全得逞。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由于苏联的毁约以至反华，我国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上，都蒙受了不少的损失，加上几乎同时发生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其实也是这场国际论争和政治风云的反映和后果之一。

1960年9月上旬，我出访古巴尚未回国，就奉中央电令转道莫斯科，参加当月17日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我立即赶去并参加了会谈。我党代表团长是邓小平总书记，他在会上



担任我国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时的伍修权同志，与铁托总统亲切交谈。

1955年摄于贝尔格莱德

冒险主义”等等，接着又发动各国党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围攻中共代表团，全面批驳我国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说中共是“要发动战争的疯子”，搞的是“假革命的极左路线”，是“托洛茨基方式”和“民族主义”等等，使我们一时十分孤立，只剩东欧最小的阿尔巴尼亚一家还倾向和同情我们。

我们将事态迅速报告了北京，中央马上给我们发来写好的声明，让代表团立即译成外文发出去。声明中揭露苏共对我党搞突然袭击，对各国党采取家长式的专横态度，而中国党决不听任何人的指挥棒，决不向任何错误的观点和作法屈服。这个措词强硬的声明更加激怒了赫鲁晓夫，他们在会上对我们几乎到了对骂



严正指出，苏共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使党内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已造成了我国的损失，同时表示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决不妥协的决心。苏共当然不会轻易认错，于是这次本想解决两党两国关系恶化问题的会谈，仅仅是“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散了会，唯一

达成协议的是于当年10月和11月的十月革命43周年，中共再来代表团继续会谈。不久，由

1964.11.14 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从莫斯科归来



是这场国际论争的前线指战员，稳坐指挥并“钓鱼”的当然是毛主席了。

1961年的苏共22大，将分裂形势推向了新高潮，赫鲁晓夫等公开攻击中共及支持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当时惯例是党代大会得邀请各国党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却不许阿党参加22大。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公开

邓小平和刘少奇于10月、11月分别率领代表团连续赴苏，可惜每次都是各抒己见争吵一番而已，只在十月革命43周年时，和81国的“兄弟党”一起签署了一项纯属对外宣传的《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但是这些文件丝毫掩盖不了由中苏两党分歧引起的国际共运间的分裂状况，由于中国党的批评反对，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为首”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了。

国际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主要发生在1960年。从这年2月起，我党先后派出5个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或在布加勒斯特与苏共领导人接触。每次会谈接触都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决策进行的，每次会谈结束回国时，他都要亲自听取我们的汇报，有时他在杭州或北戴河，我们都要专程赶了去，他对代表团的的活动，一再表示了肯定、赞许和支持，我们也因为上头有着他的指导和指挥，不论什么情况都觉得信心百倍。由于这年我党代表团曾去莫斯科5次，数咏若雷为此写诗说：“五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虽然毛主席本人并不住在钓鱼台，但是我们每次出国前的准备，回国后的总结，大都在钓鱼台进行，中央的“反修”领导和写作班子，也常在钓鱼台办公。如果说我们

回答苏共对我党的攻击后，提前回国不再参加会议。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中央决定我为代表团长出席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4国党代大会。各党大会无一例外地按苏共的调子对中共及阿党进行攻击，我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一作了回答，苏共及东道国当然要作出反应，结果在捷、德的党代大会上，我致词中提到苏共时，台下有意起哄、拍桌吹口哨和跺地板企图打断我的发言。我当时心里虽然不免尴尬，表面上却还镇静，我想自己正代表着一个伟大的党，执行着自己领袖的指示，作为一个客人来到这里，主人不能也不应该对我无礼，就像毛主席诗中说“我自岿然不动”地硬着头皮顶住了。有的记者形容我当时能“泰然自若”，因而称我为“伍泰然”。

与此同时，中联部另一副部长赵毅敏代表我党出席意大利党代大会时，也受到了与我相似的对待。对这股气势不小的政治风潮，我国蔑称之为“反华大合唱”，我们几乎到处受到攻击反对。我和赵毅敏先后回国后，分别向毛主席作了如实汇报，他对我们进行了鼓励和慰问，甚至连续吟诗自励：

本刊  
特稿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还“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当时对毛主席跟得很紧，在“反修”斗争中特别活跃的康生，也卖弄文才地以我和赵毅敏出国遭遇为题材，写了几句打油诗，其中两句道：“伍秦然四闯恶狗村，赵再见独战骡马国”。“恶狗村”是诬指我刚去的东欧四国，“赵再见”是因为“赵”是意大利语“再见”的意思，“骡马”则是意系罗马的谐音。康生在党内常常血口喷人，对别国也如此任意侮辱他人，暴露了此人的品德恶劣和趣味低下。只是他骗取了毛主席的信任和赏识，使其有恃无恐地到处疯狗咬人。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将“恶狗村”改为“恶虎村”，将“骡马”改为“罗马”，以免传出去有损别国的尊严。

苏共指挥的“反华大合唱”，我国针锋相对的“独唱”以及阿尔巴尼亚等的“帮腔”，正喧闹得不可开交时，与我国友好的越南等国建议停止公开论争，举行中苏会谈以平息争端。几经周旋磋商，定于1963年7月由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可是因为在此以前，苏

共不仅公开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共的文章报道，还在中苏边境、我国新疆和我国驻苏大使馆连续制造事端，其反华调子正越唱越高。为不让苏共乘机封住我们的口，就在代表团访苏前的6月14日，发表了由毛主席亲自定题定稿的，更加全面深刻地批判驳斥苏共观点的长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实际上使中苏论争达到了又一高峰。苏共哪能认输，立即予以“断然拒绝”，认为“25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诽谤与攻击”，并再次驱赶我国外交人员和留学生，还砸坏了我国驻苏大使馆的展览橱窗等等。就在这股极不平静极不友好的气氛中，我党代表团还是按原计划启程出国了。我又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中苏两党的高级会谈就在双方的激烈论争和互相抗议中开始了。会谈中自然也是各不相让地你攻过来我顶过去。对于这种“会谈”，西方记者称之为“聋子对话”，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代表团每天及时将会谈的情况和内容报告北京，中央

向毛主席报告请示后，又立即给我们发来指示，所以会外反而比会内忙。就在会谈中，苏共于7月14日又发表了名为苏共中央给全党实际上是给全世界的公开信，对中共的“25条”进行了坚决回击和全面驳斥。这使勉强进行的“聋子对话”也对不下去了，最后仅达成一项协议：会谈暂停，以后再谈。第二天我们就全体回国。

我们的专机飞临北京机场时，我发现机场上十分热闹，一下飞机，忽见守候在机场，亲自来迎接我们的竟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全体



1962年冬出席东欧四国党代会期间，伍修权（左二）和熊复（左三）等代表团工作人员

中央领导人，机场上聚集了五千多人的欢迎队伍，还有各国的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喧天锣鼓声中不时传出震耳的“反修”口号，全场到处都是红旗、彩旗和标语横幅。我们刚走下舷梯，毛主席就领头走过来，与我们一一热烈握手问好，又让少先队员为全体代表团成员献上了鲜花，还让我们与以他为首的欢迎者一起排在飞机前合影留念。我们绕场一周和离开机场时，全场一片雷鸣似的欢呼和掌声，中外记者纷纷把这一盛大场面和热烈气氛摄入镜头和写入报道，第二天各报和各种新闻工具都突出报道了我们代表团的归来特别是毛主席对我们的迎接。对这场破格破例的欢迎仪式，我们都明白这并不是冲着我们这几个人，而是借题发挥地对外国“帝修反”特别是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组织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政治示威，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按毛泽东“总导演”调度的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一些尽职尽责的“演员”。

欢迎仪式一结束，又破例地没让我们各自回家休息，集体代表团成员都奉命跟着毛主席的车一直开进了中南海。毛主席和我们一样，也一直沒有休息，坐下来就让我们作详细汇报。邓小平、彭真作汇报时，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认真地静坐倾听着。从毛主席那专注和满意的神情中，我看出他对这次会谈的无比关切，对所汇报的内容不断点头称是，有时还插几句问话甚至笑话。

这次无结果的会谈，特别是中共“25条”和苏共“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苏论争和共运分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的“反修”写作班子，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连续发表了9

篇深入批判“苏修”的大文章。原来计划连发10篇，哪知才发表了第9篇，赫鲁晓夫就被迫下台了。虽然这是苏共内部的一次“宫廷政变”，但我们许多人都认为，我们的“九评”也是促使“赫修”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九评”把他轰下台的。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这天夜里，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以中联部负责人身分，出面接待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听取他的重要情况通报。因为中联部机关都已下班，我只得用自己家的客厅接待了苏联大使。他来就是通报赫鲁晓夫由于“健康原因”下台的事，于是我有幸成为我国第一个知道此事的人。苏联大使离开，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杨尚昆，他马上报告了毛主席。没想到这位“总导演”马上利用这一事件，又导演出了一幕极其精采的国际活剧。

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莫斯科时，突然从我国又发出了一个更具轰动效应的名符其实的“爆炸性”消息——中国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原来我国的原子弹试验早就一切就绪，但是毛主席非要等一个最有利的时机。赫鲁晓夫一下台，毛主席当机立断，立即下令“起爆！”于是不仅把世界公众的视线牵到了中国，更把我国的这一胜利和赫鲁晓夫的

在匈牙利党代大会致词的伍修权（后为本达尔）



垮台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形象地说明了“苏修”的失败和我们的成功。正如7月间在北京机场利用欢迎中共代表团回国进行的政治示威一样，这次又利用原子弹试验进行了一次实力示威。这不能不说又是毛主席这位大“导演”的大手笔。

毛主席马上又“导演”了下一幕，他决定再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的时机，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去苏联祝贺节日，我有幸又参加了这一代表团。我们出发前，中央已用各种方式向苏联发出了重修于好的意愿和信息，对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表示祝贺，在报纸上介绍其新的建设成就。我们到过莫斯科后，一一拜访了苏共各领导人，反复表示希望团结友好的愿望，所有的庆祝活动都积极参加，对苏方人员一律热诚相待。哪知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苏方仅仅撤掉了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其思想路线，新领导人仍然坚持原来的政策方针，相反企图使我们改变方针。

在一次宴会上，苏共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竟对我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下了台，你们也应该像我们这样，把毛泽东搞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元帅马上顶回了他的挑衅。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当即向苏方提出抗议，勃列日涅夫打马虎眼地说这是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了，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不，他这是酒后吐真言。”迫使苏方向我们道歉认错。这次访苏也就这样未能如愿地结束了。我们来时颇有劲头，回国时不免有点失望甚至败兴。哪知毛主席这位“总导演”，利用这一机会又导演了一场精采活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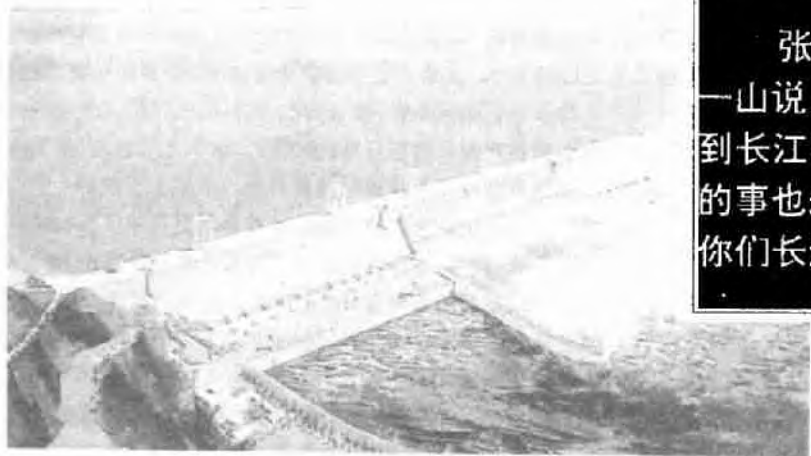
我们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时，只觉面前重现了几个月前的盛大场面，毛主席再次领着刘少奇、朱德、和邓小平等所有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和数千各界群众在一起，为我们举行了又一次热烈的欢迎仪式。我们下飞机和他见面握手后，他又领着我们绕

场一周，接受各界群众对他和我们的欢迎欢呼。毛主席此举，再次向外显示了中国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对他本人的拥戴，苏共的妄想图谋永远不会实现，同时也宣告了我们党与“苏修”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次中苏双方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矛盾更尖锐结怨更深了。也就从那年十月革命节起，我们与苏共完全停止了交往，我直到24年以后即1988年，才能再去苏联，中苏关系中断了几乎整整1/4个世纪。

中苏关系恶化期间，我还曾出访过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这两国一个与苏联对着干，一个也已不一条心。当时我们在东欧除了有的国家党内的少数反对派，也就剩下了这一个半朋友。只是后来那个被毛主席誉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也同我们闹翻了，据说他们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反而成了什么“修正主义”之类。这世界大舞台真比舞台小天地更加变幻莫测令人莫衷一是。可惜毛主席老人家已经去世，不然他可能还将“导演”出同样出人意料的活剧来。

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国际“反修大战”，我党已在种种场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应发生的，任何国家的党，都不应该干涉别国内部的内部事务及其方针政策，应当尊重各党和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苏联，是曾不断干涉过我们的内部事务，多次批评指责我们的方针政策。不过，我们也对人家的一套进行过毫不客气的严厉批判和全盘否定。我个人认为我们当时从若干论点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无误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最高指挥，一方面表现出了他非凡的才智与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了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我作为当年这些活动的参与者与过来人，仅将以上事实回忆出来，供后人对此进行分析评说。

## 本刊特稿



张震 1975 年对林一山说：我从长江尾，管到长江腰，现在长江头的事也来找我，哈，我跟你们长江算是结缘了！

# 张震将军和长江三峡

□ 卢江林  
张世黎  
成绶台

党的十四大之后，老红军张震重新成为新闻人物。消息传到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拍手叫好；消息传到宜昌，葛洲坝工地上的一些老工程师、老工人奔走相告。

“听说了吗？张震当了军委副主席。”

“哪个张震？”

“张司令嘛！我们的老政委。”

张震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科学家、工程师有什么关系？他跟葛洲坝又有什么关系？

张震是湖南平江人，14岁参加革命，16岁当红军。翻开他的履历表，你会发现，他一生中当参谋长的经历居多。部队的编制番号枯燥，如果你要问张震先后给谁当过参谋长？军史早已列出

了一串令人炫目的名字：彭雪枫、黄克诚、粟裕、陈毅、邓小平。

当然，张震不仅当过参谋长，他还当过营长、旅长、军分区司令、纵队司令、军长、大军区副司令，又当过总后勤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国防大学的校长兼政委。可以说，以这样的经历出任军委副主席，毫无疑问会让全军将士心悅诚服。

那么，他又怎么会得到那么多水利、水电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拥戴呢？

也许，人们在看报纸上介绍的张震上将的简历时，会忽略了一句话：1970年至1975年张震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并兼葛洲坝水利工程指挥部政委。他刚到葛洲坝工地时，面临的是一座困难重重的葛洲坝，是一座危机四伏的葛洲坝。

工地上的一切，都是按部队建制编组的。把专家、教授和工程师们，编成设计团试验连水泥沙排泥沙坝之类，一位水电学院的副院长、国际著名的泥沙专家，则被称为“泥沙战士”。这种荒唐的事情让今天的人听了也许根本不会相信是真的，但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的确真实地发生过。

知识遭到了野蛮的践踏，知识分子忍受着无情的蔑视。他们一方面满腔热情把自己的全部知识拿出来贡献给葛洲坝，一方面又必须战战兢兢地接受“千人设计，万人审查”的荒唐局面，稍一不慎还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批斗。

“工宣队”、“军宣队”君临一切，专家们不得不对穿军装的人怀有戒心。

张震政委知道专家们与他保持着距离。

他悄悄地走进简易工棚搭成

英杰谱

的设计室。有人抬眼看了一下，又埋下头去画图纸。

工棚一晒就透，上面烤，下边蒸，室内比室外的温度还高。

工程师懒得去打水，也懒得喝。

这一切，张震都看在眼里。

第二天，两名战士抬来了一个保温桶。后来，后勤部门又送来了电扇。设计室里一阵骚动。

“太好了，太解决问题了！”

“谁让送来的？”

“张司令。”

文伏波，著名的长江水利科学家。周总理曾开玩笑说：“文伏波治水，马伏波镇南。汉朝有个伏波将军马援，越南人不喜欢。你以后别到越南去。”文伏波与张震是湖南老乡，两人谈得来，讲起家乡话，别人听不懂。张震经常向文伏波请教一些水利学知识。当葛洲坝政委，一点业务也不懂，怎么能做好政治工作？文伏波说：“张震这人聪明，很专业的知识，一说他就明白。不像有的人，不懂装懂，还跋扈得不行。”

现在是长江科学院泥沙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的殷瑞兰说，那时候工地上赶设计，没白天没黑夜，也没有星期天。碰到阴雨天，工棚潮，被子、褥子、衣服、到处都是粘乎乎的。一天，出大太阳，晴空万里。传来张司令的命令，设计团放假一天。好容易有个大晴天，让大家晒被子，洗澡，换衣服！男同志也许不觉得，我们几个女同志，心里好感激。你看，这事记到现在也忘不了。

殷瑞兰讲起张震来滔滔不绝。那时候，我们是被压在最底层的臭老九，见到当官的，都不敢多说话。但是在张司令面前，可以无拘无束。他没架子，喜欢跟我们讲笑话。每次开会之前，都先来一段。有一次，他讲样板戏中，座山雕、杨子荣。这个笑话，大家都知道，但是公开场合谁也不敢讲。反样板戏就是反江青，了得？张司令就不怕江青，人们笑得好解气呀。

黄宣伟，现任太湖流域工程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张震政委很民主，我们讲什么意见他总是耐心地听。有时候技术讨论会上冷了场，他讲几句笑话就把会场气氛活跃起来了，大家在他面前敢讲话。而且，会议结束作结论时，他总是让技术人员来讲话，自己不轻率地下结论。

有一次，一位副指挥长，大概是个什么军分

区的干部吧，和一位工程技术人员发生争执，那个副指挥长很霸道，以势压人，争不过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就罚他去烧开水。这事儿让张震政委知道了，你别看张震平时温文尔雅，谈笑风生，发起脾气来吓死人，他把那位副指挥长熊得一愣一愣的：“我告诉你，你不要不懂装懂！今后如果再这样，我就撤你的职！”

林一山谈起这段往事，也同样感慨万千。

我当时只是个挂名的副指挥长，说话没人听。看到那么多问题我心里急呀，有话我就找张震同志说。我跟他作过几次长谈，向他说明，泥沙问题是工程成败的关键。根据模型试验，我提出在大坝上游的大江和三江上，各修一道防淤堤，就是现在人们称之为“关刀宝剑”的那两道防淤堤。在他的支持下，通过了这个方案。

张震后来调到总后勤部当副部长，离开了葛洲坝工地。人走了，我跟他的友谊一直没有断。我到北京开会，他到饭店来看我，心里还一直惦记着葛洲坝的事。

1975年冬，林一山带着本书作者之一成绥台，找到总后勤部张震副部长家里来了。

一谈到葛洲坝，张震的情绪振奋了，问长问短。

接着林一山说，我有件事要求助于您了。

林一山说：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陈毅元帅主持国务院外办时，曾经批示外文出版局、新华社和我们联合编印一本反映长江的大型摄影画册。这一晃就是十年。现在我和外文出版局商量好了，要重新组织力量去探清长江源头，拍下源头照片，编好这本画册，早日出版，完成陈毅元帅的遗愿。

陈毅是张震的老首长，一提到已去世的元帅，张震心中怀念之情油然而生。“您就说，要我干什么吧！”

林一山说，我已报告了先念同志，也向总参的领导报告了，我们要和首都新闻摄影单位联合组成一个长江源头拍摄采访组去探险，弄清长江源头的秘密。建国二十几年了，还不知道江源在哪里！

张震听后，连声说，好办，好办，我们全力支持您！

林一山指着成绥台说，决定由他当领队，具体要求由他说吧。

张震副部长热情地介绍了总后在青海设有青藏兵站部，从格尔木到拉萨，沿线都有兵站，在格尔木还有530输油管线指挥部，你们的后勤保障，都可以由总后下命令，让他们帮你们解决。

张震还笑着对林一山说：“我从长江尾，管到长江腰，现在长江头的事也来找我，哈，我跟你们长江算是结缘了！”

长江尾，指的是1940年渡江战役他从东线渡江。

1948年1月，毛主席决定抽调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

组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由粟裕同志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过长江，跃进江南，打到敌占区进行外线作战。粟裕选中张震当参谋长。

跃进江南的战略计划，是毛泽东亲自提出而且非常钟爱的一个计划。是扬长避短的外线作战方式。而且这个理论，得到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践成功的印证。

粟裕觉得，还是在长江以北大量歼灭敌人，从战略上更为有利。急于跃进江南，一是付出很大代价而不一定能完成预定战略任务，二是分散兵力不利于大量歼敌。粟裕据理力陈，终于说服毛泽东放弃了跃进江南的计划。

1949年4月20日夜，由粟裕、张震率领和中央突击集团部分部队先行突破长江防线，直下江南。

连克镇江、常州，直逼上海、杭州。

现在为了探明长江源头，林一山来找张震，张震漏能不管？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1976年6月长江源考察组一切准备就绪，从北京出发了。

7月8日当长江探源的先遣人员到达西宁市时，青藏兵站部派来车辆、罐头食品、衣物装备、氧气瓶等等，都按张震的指示一一落实。

我国首次长江源头探查活动，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无人无路无图、高山缺氧、举步维艰的条件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查清了长江发源于6621米的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群，长江长度从原来的5800公里确认为6300公里。

1980年底，葛洲坝大江截流。

为了拍大江截流的场面，需航拍，要动用飞机。水利部副部长陈赓仪要成绥台向解放军求援。

林一山听了成绥台的汇报后，立即派成绥台连夜赶回武汉。

武汉空军黄副司令轻轻地摇了摇头：“情况是特殊，但审批手续是军委规定的呀！”

李处长说：“张震副总长管作战，如果你能直接找到他，当然最好了！”

“那好，我来试试吧！”

不到两分钟，电话要通了。

成绥台首先作了自我介绍，“我记得你，我也收到了你们寄来的江源照片。”话筒中传来张副总长亲切的声音，成绥台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成绥台尽力想把话题拉到直升飞机上，说了时间如何紧迫，飞机如何必须，可是，话筒里传来张副总长亢奋的声音：“不忙，不忙，你慢慢说说，葛洲坝大江就要截流了，你详细谈谈？”

采取什么样的截流方法？决战的龙口在哪儿？准备石料有多少？机动车辆有多少？万一截不住怎么办？长江现在的流量是多少？泄水闸修得怎么样？”

张震将军对葛洲坝一往深情，对大江截流兴奋不已，问个没完没了。

又问把龙口缩窄，快到合龙时的上下游水位差有多少？流速有多大？25吨、30吨的混凝土能不能截得住？

成绥台一一作了回答。

大概是对大江截流的情况听满意了，张副总长自己才把话题转到直升飞机上。他说：“按照规定手续，时间是太紧了。这样办吧：你今晚上车，明天赶到北京，请水利部给总参来个函，我马上要我的秘书，先和总参作战部以及空司作战部办好手续，你到京之后，直接去空司作战部，他们会给你办调机手续的。”最后，他还忘不了他的老战友：“请转告林主任，祝大江截流成功，请他多多保重！”

这次通话整整讲了40多分钟。最后解决问题，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成绥台，连夜赶往北京。他拿着张副总长亲笔签署的命令，立即办好一切手续，随即一架正在待命的米8直升飞机立即起飞，飞往离葛洲坝最近的军用机场。

1月3日7点30分，大江截流指挥部下达截流命令。张震派来的军用直升飞机载着各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师、电视摄像师，准时飞抵龙口上空。只见整个工地彩旗飞扬，左右两岸的截堤像两把钢刀向江心逼进。左右两岸截堤头同样有七八十部载重自卸卡车，满载决石分上下两排向江中抛去。

江面越缩越窄了，流速也逐渐增大，长江象一头被激怒的巨龙，翻腾着，咆哮着，激起一股股浪柱，四日下午6时，龙口几乎只剩了一道缝，这时，金字塔形的重25吨、30吨的混凝土四面体一块块倾向龙口，长江已经牢牢地把它缚住了，按照人们的意志在泄水闸中分流了。

历时36小时23分，大江截流胜利成功！这不仅在世界大河干流上是首次截流，而且它提供的实践经验，为解决三峡大坝截流问题奠定了基础。



## 初访西柏坡 再说李立三

□ 李思慎

她，为实现在有生之年到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西柏坡看一看的夙愿，不顾年迈，不顾七月流火，风尘仆仆来到这一中国革命的圣地。

她，从北京乘车颠簸四个多小时，一到石家庄就兴致勃勃地前往华北烈士陵园，瞻仰了白求恩、柯棣华、爱德华、巴苏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墓，详细询问柯棣华夫人郭庆兰和孩子的情况，认真听取陵园工作人员对先烈们英雄事迹的介绍。

她，一位满头银丝、中国国籍的俄罗斯老太太，正是蜚声中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的遗孀、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莎。她原名叶丽莎维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1914年3月20日出生于伏尔加河畔，1946年10月告别家乡父老亲友，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在西柏坡，应工作人员要求，她在留言簿上写下三行刚劲有力的俄文：“应该了解历史，珍惜历史。”

以留言为头，我在驻地，请老人谈一谈此行的感受。她略加思索，立刻明快地向我以四字以概之：“喜悲交集”。

喜从何来？首先，老人从参观中再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她说，她1946年10月来到中国，从立三同志的革命活动中，对伟大的三年解放战争虽然多少有一些了解和体会，但是，并不深刻。这次在西柏坡，看到党中央、毛主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在那么一个偏僻的山村，既顶住了美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又顶住了斯大林要中国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的意见，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指挥完成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在是了不起！第二个喜是，在西柏坡纪念馆的陈列中，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纠正了过去多数展览的不真实内容。比如，关于王明、林彪、康生等人的展品，都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历史。第三个喜，有关立三同志的展品有“四个第一”：第一个看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立三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的真实位置。他是在前排毛主席左边，只隔着刘伯承、陈毅。过去公开的照片，总是把立三同志的像遮盖起来，现在恢复了本来面目；第一次看到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44名正式中央委员名单顺序，是以得票多少排列的。在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34名正式中央委员中，立三同志排在第十位；第一次看到了立三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场中的座位及在会上发言的纪录电影镜头。立三同志是会上27位发言人之一；第一次从纪录电影中看到了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立三同志与毛主席亲切交谈的动人情景。这些对这位老人来说，虽然都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来得太迟太迟了，但她终于在有生之年见到了。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喜庆之余，很自然地引起了她对那逝去的充满磨难和坎坷的60年往事的回忆和悲感。

1930年，立三同志因犯路线错误，被共产国际调到莫斯科去作检查。检查结束后，



又不准他回国，留在苏联学习，并改称“李明”。先后与王明、康生、陈云、陈郁等同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为首席代表。李明在王明领导下，虽然主编“救国时报”，主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却“成天像小媳妇一样过日子”。1931年，李莎在印刷技术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伯力和海参崴远东出版社担任技术编辑。结识了中国侨民中的许多革命者。1933年，李莎调回莫斯科工作，同时参加业余大学学习。一次在朋友家中与李明相识，逐渐结为好友，得知李明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在李莎的心目中，李明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中国青年。1936年2月，在一批中国朋友的庆贺声中，两人结为伉俪。

不料，新婚的温馨尚未散尽，在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冲击下，李明第一次遭受劫难。1938年2月23日，李明被冠以“日本间谍”投进监狱。李莎为寻找李明的下落，跑遍了莫斯科的所有牢房。“你是要李明还是要团证？”李莎在共青团支部召开的批判会上，面对阵阵威逼声，毫不犹豫地把“共青团团证”扔在会议桌上，愤然离开会场。她坚信李明不是日本间谍，“宁要李明，不要团证。”从此，她失去了“共青团员”称号。李明在狱中据理抗争，从不妥协，直到1945年11月4日由周恩来出面（当时在莫斯科治伤），保释出狱，夫妻才得以团聚。

1945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长帕纽什金（数月后，来中国重庆任苏联驻华大使）突然把李明请去，一见面就对他说：“祝贺你已被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为中央委员。”这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半年之后，李立三第一次得知此消息。这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当选的。喜出望外的李立三从内心真诚感激党中央、毛主席给予他的公正待遇。他离开祖国已整整15年，不能再在苏联等闲了，决心立即回国参加到新的革命斗争中去。于是，他再次向苏方提出回国申请。1946年1月15日，他告别妻女，只身离开莫斯科，先到海参

崴，后由苏方用飞机将他送往哈尔滨。回国后，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同年8月，军调部解体后，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长、城工部长、东北

局职工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莎经过一系列准备后，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心情，也于1946年10月6日，告别自己的祖国，带着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烈士女儿孙维世，以及自己年仅三岁的女儿李英男，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投身到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斗争。为便于工作，李立三以她的小名丽札的谐音，把她的名字改称李莎。

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由紧张继而破裂，李立三就开始“坐上了冷板凳。”1966年5月，在中央解决“彭罗陆杨”的上海会议上，李立三因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局梅河口会议问题受到点名冲击。有人在发言中说，李立三在梅河口会上与彭真一起反对过林彪。同年6月18日，华北局办公厅书面通知李立三：“停止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1967年5月25日，关锋、戚本禹在接见华北局机关造反组织的代表时，公开给李立三扣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这是他第二次成为“特务”。6月18日，造反派把李立三夫妇拉到北师大批斗以后，就没有让李立三回家，对他实行了“群众专政”。这一次李莎与李立三分别，竟成了这对患难夫妻最后的诀别。据华北局某人的交待材料称：6月22日上午，他奉华北局造反组织《红联》派遣，带着一名大学生到关押李立三的地方，通知他当天下午要到天津去接受批斗。李立三当即以身体不适为由，多次恳求改期。此人到《红联》请示后返回，坚持不能改期。近中午12点，看管人员通知他吃午饭。李立三说，材料尚未写完，请稍等一会儿再吃。时过不久，再去通知他时，发现他趴在桌子上，不省人事，手中的香烟尚未熄灭。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尽管后来华北局和河北省委多次追查

## 英杰谱

李立三死因，都无结果)。李立三被迫害致死  
后第二天，李莎及两个女儿即被关进秦城监  
狱。虽然母女三人同关一地，却相互间谁也不  
知其下落。李莎在监狱一蹲就是8年，直到  
1975年5月24日才获释放，立即又以“养  
老”为名，流放到山西省运城，后经多方交涉，  
于1978年12月20日才被准许回到北京与女  
儿团聚，恢复了自由。人回来了，往日的一切  
温馨全都化为乌有。亲人永远见不到了，住房  
被占了，家中的财产也不知去向，唯有二女儿  
所患的严重精神病需要她这个做母亲的照料。

如今，李莎在与亲人分别了整整25个春  
秋，有幸第一次从纪录电影中看到了李立三的  
音容笑貌，她怎不感慨万分，不引起阵阵心酸  
和痛苦？

## 二

在回首往事时，李莎对胡耀邦生前对她的  
关照表示了深深的感激之情，终生难以忘怀。  
话还得从老人回京说起。她动情地说，要不是  
耀邦同志敢于负责、大胆拍板，1978年底，我  
不可能那么快就回到北京。

事情是这样的：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  
来，特别是自1967年5月25日关锋、戚本禹  
讲话后，作者，一个从1960年至1967年间担  
任李立三秘书的普通干部，处境也是极端困难  
的。“与李立三划不清界线”的帽子，一直扣  
在我的头上。为了表明同“苏修特务”一家  
“划清界线”，我是不能同李莎及其女儿进行联  
系的。即使后来李立三的两个女儿出狱后与我  
同在华北局干校——汉沽农场一分场劳动改  
造时，相互间也不能说上一句话。1969年12  
月底，华北局军管小组调我去甘肃工作。这天  
中午，我背着行李去火车站途中，碰上李立三  
的两个女儿收工返回。我鼓起勇气对她们说了  
一句话：“我要到甘肃去了，你们多保重。”我  
在甘肃时期，长达9年不能与李立三同志的女  
儿联系。1978年12月2日，正值十一届三中全  
会前夕，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我借到五机  
部汇报工作的机会，冒着风险第一次到北京外  
语学院找到了李莎的大女儿李英男。“你妈妈

在哪里？”我问她。“在山西运城，是1975年  
从监狱出来弄到那里去的。”

原来，李莎1975年5月获释时，是由公  
安部、北京外语学院和山西省委组织部的三个  
人把她从监狱中接出来，直接到北京火车站上  
了火车，送到山西省运城住下。李莎问：“是  
不是在这里住监狱？”他们回答说：“在这里不  
是住监狱，是在这里养老。”

我忙问：“能不能回北京？”

英男摇摇头：“不允许回北京，我们可以  
去那里探望。”

“找过中组部没有？”

“找过，中组部的同志说，爸爸的问题很  
复杂，一时难以得到解决，等以后再说。”

我思忖片刻，拿定主意说：“这样办：你  
给耀邦同志写封信，不要提你爸爸的问题，只  
提出一条要求，就说妈妈年岁大了，在山西无  
人照顾，要求把妈妈接回北京。信不要邮寄，  
邮寄出去，耀邦是看不到的。你利用晚上趁耀  
邦回家吃饭的时候，直接送到耀邦同志家里  
去。让耀邦能亲自看到你的信。”

英男说：“不知耀邦同志的家在哪里住？”

我先诉她：“在灯市口西口往西，第一个胡  
同往北，富强胡同×号院内。”

12月4日晚，李英男带上写好的信到了  
胡耀邦家中。当时胡耀邦没有回家，由他的儿  
媳安黎接待。安黎对英男说：“你放心好了，  
只要爸爸一回来，就一定把信交给爸爸。”令  
人欣慰的是，12月6日，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  
党总支接到中组部电话通知，传达了胡耀邦  
12月5日的批示：“先把人接回来再说。”中组  
部的同志还说，北京的一切手续都不要办，那  
样太麻烦。已经通知山西省委组织部了，你们  
直接去接人就行了。12月7日，李英男夫妇及  
俄语系副主任陈丽珍匆匆登上去山西的列车，  
一路去省委组织部，一路直插运城，帮老人收  
拾好行李，12月20日就回到了北京。

李莎回京后没有住房，是耀邦说了话，很  
快安排了舒适的住处。1980年3月20日，又  
是耀邦同志亲自主持，召开有千余人的大会，

给李立三平反，恢复名誉。对李立三的革命功绩，作了恰当公正的评价。这一天，恰逢李莎生日。老人说党中央选择这个日子为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是送给她的最好不过的“生日蛋糕”。令人痛心的是，立三同志去世后，华北局的有关人员不通知他的任何亲属，就将遗体化名火化，将骨灰埋于乱坟地之中，没有做任何标记。中央在为李立三平反时，寻找李立三的骨灰，始终也没有找到。现在，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李立三骨灰盒里，只能以他生前使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代替。李莎恢复工作后，享受教授待遇。还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再一件令李莎难以忘怀的事是，在前苏联有个名叫郭绍堂的中国人，三十年代是共产国际办公厅的负责人。李莎从1935年开始与他认识。1938年，郭被抓，整整关了18年。50年代在前苏联一个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说他是“苏联特务”，闹得纷纷扬扬不可开交，株连了国内很多人。1986年6月，中央为了给他平反，恢复名誉，以对外友协的名义，把郭绍堂邀请来北京，胡耀邦亲自在人大大会堂设宴招待，同时把李莎这些过去受到株连的十几个人也请去作陪，再次给大家平反恢复名誉。李莎说：“当时我接到对外友协打来的电话，说是郭绍堂来了，一开始把我吓了一跳，我想我就是由于他坐了8年牢。因为过去我们在莫斯科认识，1957年周恩来请他来北京时，我们也请郭绍堂吃过一次饭。‘文革’中说郭绍堂是苏联特务，我们也深受其害。”

胡耀邦对李莎的关怀照顾无微不至。就在这次宴会上，当她了解到李莎在夏天休养地有困难时，当场向秘书交待，要中央办公厅在北戴河西山中直疗养区为李莎确定一栋别墅——二十五号楼，供其使用。

李莎还谈到，自此之后，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都邀请她去参加，亲切交谈，征求意见，问寒问暖，使她受到极大鼓舞。

### 三

近半个世纪来，这位磨难虽多洁而无瑕的

老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问心无愧的奉献。

李莎于1946年10月来到中国之初，即在哈尔滨参加了战地医护训练。从1947年起，始终在教育战线从事园丁工作。开初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当教员，1949年4月9日到达北京。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教员。“文革”前，她在物质上不搞特殊，业务上没有职称，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平凡的教员岗位上辛勤耕耘，而今已经桃李满天下。前不久，我到北京去看老人，才知道她仍坚持每周到校上两节课。我劝她应该好好休息，保重身体要紧。她笑着回答：“这也是一种乐趣，比总是呆在家里要强。”在这次闲谈中，我说到现在俄语人才很缺，据说，要在石家庄寻找一个俄文打字员都很困难时，英男介绍说，妈妈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多次提出加强俄语人才培养教育的建议。老人的这一建议，表达了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片赤诚。

闲谈中，李莎对我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及其取得的伟大成绩，表现出由衷的高兴和满意。她说，1989年她回莫斯科探亲，成天为采购食品排队。莫斯科一亲戚结婚，要买家具，到家具站去登记，回答说，现在登记排队，要过17年以后才能有货。苏联人家庭现在大都还是看黑白电视机，有彩电、录像机、收录机的家庭很少。去年以来，莫斯科的亲友曾多批来华，见到什么东西都要，对中国的物资这么丰富，感到惊奇、羡慕。

李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了信心。她说，只要继续按照邓小平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只要教育后人了解历史、珍惜历史，抓住有利时机，坚持改革开放，中国一定会搞好，也一定可以搞好。这就是一个俄罗斯老人、国际共产主义女战士李莎对我们的最好祝愿。



(责任编辑：陈贻林)

# “迎春晚会事件”

记者：

“大革文化命”前二年，毛泽东主席对我国文艺界连续发出几次极为严厉的批评。其中之一是1964年6月27日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稿上的批示。全文如下：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跃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在此以前，他还在中宣部的另一报告材料上愤然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了。”他进而又责问道：“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他还几次说：“《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这些指示特别是上引1964年的那个批示，从何而来，因何而发，许多人都追溯到了1964年春节期

间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一次“迎春晚会”。据说正是由于有人告了“御状”，向毛主席“揭露”了这个晚会，才使他老人家如此气愤，不仅当时就让文艺界进行全面整风，而且不久又在全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界特别是文化人的“命”。

那么，当初那个“告御状”的到底是谁，他怎样向中央“揭露”了那次晚会，那个“迎春晚会”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近30年来，文艺界许多人都认定这是某一个人所为，以致不少在香港、台湾出版的书、刊、报上，也指名道姓地披露和指责那个“罪魁祸首”似的人物。这个被当作“始作俑者”就是原《解放军报》文化处编辑、著名的诗人兼作家顾工。正好《炎黄春秋》今年因发表他的作品，有些交往，记者就便给他看了一份港、台出版物上有关“迎春晚会”和他的材料。他看了不仅十分生气，并且满腹委屈，不久给《炎黄春秋》写来一份辩解性的“校正和说明”材料。为此记者又听取了也曾参与此文的原军报编辑刘天鸣等提供的情况，特将当年“揭露”那次“迎春晚会事件”的“事件”，如实披露。

顾工回忆道：

在1964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时，我的身体和心境都极不好。我从下放到青海唐古拉山的骑兵部

队，刚回军报不久——那次下放，摘下了我的大尉肩章，换上了列兵的领章，骑着马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冰山雪地中剿匪。先于我下放的有八一电影厂的导演：严寄洲、张家毅等。宣称我们都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958年春，我作为军报的记者去“大闹共产主义”的徐水作了采访。我对到处没饭吃的“公共食堂”，把男女老少拆散分类居住的“新型家庭”，还有瞒天过海的“大放卫星”……都作了揭露和抨击）。回京后，看到同窗战友都已擢升为少校、中校，而我依然。大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凄凉感。在我收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发给的“迎春晚会”邀请时，我放到一边，不想去参加。傍晚，军报文化处管体育和文化报导的编辑，记者刘天鸣来找我。他也有张请帖，定要拉我同去看热闹。我只好懒慵慵地同行。

到政协礼堂，门前车水马龙，京城文艺界的名角似乎云集。进那金碧辉煌的大门时，有几位浓妆艳抹的妙龄女郎，为入场的嘉宾在胸前插上一支迎春花。我和刘天鸣走进大厅，舞会已经开始，在温馨的气氛中彩裙旋转……我不善跳舞，此时此刻更没有欢乐的心情。我孤独、寂寞地坐在角落里。刘天鸣舞跳得轻盈、潇洒。跳完一曲，就介绍个舞伴向我邀舞。我愧怍地摆手。

# 披露始末

——原《解放军报》编辑顾工、刘天鸣与记者笔谈录

舞与舞的间隔中，有各种轻松、逗趣的节目插入，如：男女反串的《兄妹开荒》；一位毛胳膊毛腿戴两段乳房的女性“小天鹅”，人扮的木偶《梁祝哀史》，“楼台会”时提线断了，梁、祝长抱一起难分难解……在哄堂大笑中我却笑颜难开。我对刘天鸣说：“我身体不好，先提前回去。”天鸣也不强留，就和我同回军报。那时，军报文化处日夜加班加点。处里的编辑们听刘天鸣和我谈起“迎春晚会”场景，就都聚拢来。军报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是绷得很紧很紧的。编辑们的斗争嗅觉也极灵敏。大家一听这种轻歌曼舞和庸俗节目，便立时激起“革命义愤”。纷纷说应该上书中央。文化处主编章文龙也很同意，便叫我和刘天鸣连夜执笔。我因精神怠倦，写了百十来字就写不下去，全部推给天鸣。天鸣很认真，从头至尾写了一遍又改一遍，由他上送给了章主编，主编上送给报社党委，报社党委又上送……至于署名，是天鸣还是主编加上了我的名字并放前面，我就不清楚了……不久，中央军委办公厅和中宣部同时发下文件，文件中附有两封信（还有一封信是军报另一编辑宋维化名写的）。文件上有罗瑞卿和陆定一的批语，严厉批评了这个资产阶级的庸俗不堪的“迎春晚会”。要每个参加晚会的文艺工作者作出检查：你是反感的？是随大流的？还

是由衷喜欢的？……很幸运，在人人过关的检查中，我和刘天鸣被列为第一种人：反感的、抵制的。人人检查后，中央又叫全国文联的各个协会作检查。这些检查呈送到毛主席手中后，毛主席于1964年6月27日作了批示。

如今回顾这段史实，不是说谁写了“迎春晚会”的情况反映，谁就大错而特错。作为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各级组织，如实反映下情是完全正常的。至于以后发生的汹涌政治波澜，那确是任何人都难以料及的……

记者：

上文提到的原军报文化处主编章文龙同志，看了顾工这段回忆，认为“过程如实”。刘天鸣同志的回忆，则证实和补充了上述情况。

刘天鸣写道：

其实这原是件很普通的事。那个“迎春晚会”是全国剧协组织的，主持人是李超。我作为军报记者，自己又好热闹，就去参加了，同去的还有顾工。晚会是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一进门就有两位打扮得很漂亮的女孩走过来，殷勤地笑着在我们胸前别上一朵绢花，说是献给您一朵迎春花。那段时间我常出去看戏、看球和吃饭，这种晚会参加得多了，这样的排场见到不是一次，但这次却感到有些新奇，觉得那献

花的女孩有点做作，没有引起什么好感。

我和顾工进的主会场是舞会。李超的开场白不是按惯例叫“同志们”，而是称“女士们，先士们！”解放以来我是第一次在“公家”组织的会场上听到这样的称呼。感到主持人是有意效法解放前的那些做法。舞会开始后，我看到不少人在跳“水手舞”和“伦巴”一类的舞。50年代初期我也组织过舞会，但是从来没有跳这样的舞，我还是解放以前在上海和南京看到过这些东西，那主要是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美国大兵、外国妞“吉普女郎”等跳的，互相挑逗，舞姿淫荡，当时我们作为正派的大学生是不跳这种玩意的。所以在晚会上—见这些舞蹈，就感到有人有意在搞这种不健康的东 西，心里有点反感。

舞台中间穿插的小节目，就更使我看得不舒服了。有个男演员穿上《天鹅湖》中女角的乳罩和短裙，大跳天鹅舞，主持人还在一旁肉麻地加以赞赏。我觉得这是在追求解放前歌台舞榭中那些庸俗的东西。我本来也爱跳舞，这次只跳了一阵交谊舞就出来了，又到灯谜室猜了几个谜，就和顾工一起回报社了。

当时许多同志还在办公室，我和大家谈起刚参加的晚会，发表观感说晚会场的节目把肉麻当有趣，认为这是在追求资产阶级那一套，正经人不应该搞这种“下流”的东

## 求实篇

不过这误解的影响确实不小。比如：

七十年代后期，我写了部中篇

小说：《情如山水》，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当时《当代》的编辑部主任孟伟哉认为很好，要发头条。韦君宜却恼怒地认为不能发顾工的作品。后主编秦兆阳认为：历史归历史，不能由某一个人承担，顾工的作品还是可以发——不久，还是在《当代》刊出，不过由头条降格为二条。

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全国评选各种文学作品时，我那初选入围的诗歌，小说等总被某些评委拉下了马。以后，在围绕我儿子顾城的朦胧诗，全国展开激烈争论时，我的多年诗友公刘，在《文艺报》上发表谈话说我“教子无方”……在我写文作答后，他又在《作品与争鸣》上写道：“我在写信给顾工、顾城二位解释并道歉的同时，……也可以奉告顾工同志，诚然如今不是‘三娘教子’的时代了，但同样也不是为‘两个批示’和‘文艺黑线’之类‘立功’的时代了。为人，总还是厚道一点好。”我想：公刘的为人“厚道”不“厚道”，姑且不论，只是直到八十年代他仍抓住我那六十年代的“辫子”——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根“黑辫子”；其实那是一口“黑锅”。有人说“北京文艺界的朋友们多不肯原谅顾工”，不是全无道理。

历史就这样被传说的油彩涂抹得大大变了形：史实成了非常可笑的哈哈镜，以致谬误至今还在海内外传播和弥漫……

记者：

顾工不能不“喊冤”。港台某些

有让我作检查，但这事对我印象很深。所以十几年后的“迎春晚会”，我马上想起自己过去的教训，认为这个晚会气味不对，这就是我写那信的动机和想法。

可惜当年我这件“好事”确未为我“保险”，后来的“文革”中我被打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反革命”，主要罪状是我在参加将林彪与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成军报社论时，说了几句悄悄话被人揭发了。我只得来个死不认帐，才免遭灭顶之灾。所以有人把我说成是早就搞极左的“打手”，显然过奖了。

记者：

刘天鸣同志把写这封信的事揽到了自己身上，基本未说顾工参与此事的情况，另一位同志也写过信的事，他则根本未提。好在这已不是什么好事，不提也罢。不过记者还是找到当年也曾为此“上书”的宋维同志，他除同意以上事实外，说自己虽未参加那次晚会，但在听了刘天鸣、顾工同志说的情况后，也觉得很不像话，便用笔名以“读者来信”形式，向《北京日报》反映了晚会的问题。后来不知怎么这信也转到了中央，和顾、刘二人的信一起被中央文件转发了，结果引起了比“晚会文件”更大的事件。

上述各节，大体一致。这说明了一点：顾工并不是最主要最积极更不是唯一的上书“揭发”者。显然因为在写过的信三个人中，他当时的知名度最高，结果就既荣幸又不幸地成了这一文件的“头号人物”，以致在“文革”以后，文艺界人人都被落实政策和平反昭雪之时，顾工反而背上了新的“黑锅”，并且一直无从申辩。对此——

顾工又写道：

认为我“告了御状”坑害了“整个文艺界”，显然是个大误解。

西。同志们听我说后，竟都很生气，说应该批判这种做法，要我向有关部门反映晚会的问题。有同志要我写信给更高层的领导人，我觉得不必要，只给中宣部文艺处写了封信。因为是和顾工一起参加晚会和一块谈的，信写出后就署了他和我两个人的名字，文化处的领导和同志都支持我们写这封信。

过了不少时间，我碰到总政文化部的邓斌助理员，他见到我时，说“阁下”真不错，思想很敏锐。我有点莫名其妙，他说中央文件上批转了我写的那封信，说这事已引起很大震动。那时我还不是党员，没资格看党内文件，加之有点清高，不想主动去打听这事，更不愿让人以为自己做了点什么事就沾沾自喜，所以一直也没见到那个什么中央文件。不过自那以后，常有人称赞我政治上敏锐等等，我暗自心中也有点得意，只是尽量不表露出来，并且不想通过这事为自己捞什么好处，更未用这个“本钱”捞党票。直到“文革”以后我才入党，而这时我当年那事就另有说法了。

后来我想，那年我写的原是封普通信，是向作为业务部门的中宣部文艺处反映点情况，并没有“告御状”的打算。这封信后来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其实是当时的党内斗争形势造成的，其中的许多错综复杂原因我一直不了解，其后果我确实始料不及。

回顾当时我写那信，还有个情况，就是我在1949年参军后，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新大队学习，曾负责全队的俱乐部工作。学习结束时我们俱乐部组织了一次结业晚会，也搞了化妆舞会和一些花样，主要是参军前当学生时常搞的那些。哪知这个晚会受到了政治部的批评，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回潮”。虽然因为我那时参军不久，没

出版物，将那次“迎春晚会”说成是“全国文联”举行的“化妆舞会”，说顾工见参加晚会的个人模狗样。男男女女，人人戴着假面具，妖魔鬼怪，相互搂着、扭着，放浪形骸……”。于是，顾工“出于一个战士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首都文艺界存在着的糜烂风气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严重问题。”后来又通过一个同康生侄子同学的诗歌爱好者，经过康生将自己的信“呈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手里！”毛泽东“当即在顾工的信上批示”如何如何，因而顾工便在自己所在的“基建工程兵机关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五好干部，立三等功一次。”只是在“文革”中，“他因带头造部队首长的反，被打成‘反党分子’，投入监狱三年。”

顾工看了这些他啼笑皆非的“史实”后，不得不一一予以校正和驳斥，他说当时“我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他“从没听说过有个康生侄子的同学”，当然并未通过此人“呈送”过什么，更未因此当过“标兵”立过“功”，并

且他从未在过“基建工程兵”，当年还根本没有这个兵种。为此——

顾工特此写道：

“文革”开始，军报贴大字报，标题是：《顾工是中国的叶甫图申科》、《顾工是中国文艺界修正主义的急先锋》……从此我被打入另册。我对“文革”不理解，甘当逍遥派。从未“造部队首长的反”；从未被打成“反党分子”；从未“投入监狱”。只在1969—1974年下放，带全家在渤海荒滩的农场劳动……后来全家返回北京，从原来的总政调到总后，继续从事专业创作。

记者：

顾工见港台出版物上说他如何“头脑灵活，想象力丰富”，他说自己怎么也达不到港台某些“文人”那样，“灵活”到仅凭道听途说、全靠捕风捉影就著文写书，那些人的想象力竟“丰富”得完全无中生有、胡编瞎造的地步。因此他对于关于自己的杜撰和臆造，“我也只能当作面对‘哈哈镜’付之一笑了。”

话说到这分上，事情已经清

楚，不论“黑锅”“红锅”，都不应该由顾工一人一背近30年，他仅仅是那封“揭发”信的参与者之一，而且那信实际上是一件“集体创作”，在他们所处的那个“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阶级斗争观念最强最强”的时代，要没人写那种信，反而是不正常的，顾工是恰好赶上摊着了。由于他的知名度本来就相对高一些，此事栽到他头上，不仅“事出有因”，还是“查有实据”的。虽然此事的前因后果和中间环节，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我们今天重提此事，既不是对某个名人“揭秘”，也不是将某种轶闻“曝光”，而是企图借此让人们回顾一下历史，并希望通过共同努力，一一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做到如巴金老人在其晚年名著《随想录》所说的，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以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让这种浩劫再一次发生。”

（责任编辑 卢弘）

## 欢迎订阅作家文摘

《作家文摘》以关注热点、荟萃精品为宗旨，依靠实力雄厚的作家队伍，展示文艺界最新创作成就，是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熔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炉的九十年代文化快餐。

《作家文摘》每逢周五出版，四开八版，辟有众多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栏目，视野开阔，选编精当，真实生动，品位高雅。

《作家文摘》自1993年元旦创刊以来，已跃为首都零售量最大的周报，愿在新的一年里能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怀与厚爱！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222 邮发代号 1—190

月 价：1.30 元 季 价：3.90 元

半年价：7.80 元 全年价：15.60 元

1993年6月28日下午，巴黎上空天气晴朗。中国画家范曾同前来送别的朋友们告别后，默默地拥抱亲吻了一位穿着雅致的女士，穿过人群，向即将起飞的航班大步走

去。即将走进机舱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来，见他心爱的楠莉正用手帕擦着眼眶，他挥挥手，然后毫不犹豫地钻进了机舱，机身上几个大字在闪烁：巴黎——北京。

此刻，楠莉还在巴黎的土地上仰面凝望，而范曾所坐的班机在晴朗的天空逐渐变成了黑点，而最后连一个黑点也消逝了。

范曾抹了抹机窗上的雾气，默默地低头凝视机下迷茫的白色云彩。

巴黎、楠莉、巴黎郊区的别墅、小小的庭院……被远远地甩在了后头，过去三年的一幕幕在他眼前展开、消逝。

范曾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1990年11月4日，星期日，在香港……中午，他同两位朋友共进午餐，这两位朋友劝说他打消赴韩国讲学的安排，从香港直接飞回北京。席间，洽谈正欢，大家有说有笑，范曾还将有他自己亲笔签名的画册送给这两位朋友作纪念，这两人拿了画册也都十分高兴。

不料，就在这之后几个小时，范曾单枪匹马来到后德机场，登上了一架飞往法国的飞机，跟他的祖国不辞而别。

当时，港英当局表示，如果范曾持有有效证件，又有赴法国的签证，按照正当合法程序离开香港，香港当局是不能加以阻止的。而据有关权威人士称，范曾与楠莉在新加坡时，护照上没有盖上法国的入境签证印章。他们也不曾向法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申请签证，这就是说，范曾和他的亲密女友楠莉赴法国的签证，肯定不是在新加坡获得



# 范曾的辞国、回归与婚变

●南友



的。

关于范曾的出走，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在回答港报记者询问时只说：“未有所闻”、“无可奉告！”

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人员也马上受到询问，使馆人员回答：“范曾没有和我们接触，就是来了也不会通过我们。”

11月6日，巴黎新闻媒体称，范曾将在明天于巴黎的一家叫“鲁弗提雅”的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解释他这次对祖国“不辞而别”的行动。

11月7日，画家范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露面了。

面对中外一百多位记者，他一会儿目送飞鸿，一会儿挥手致意，显得很得意的样子。他说：“……与其说我的行动是政治的，莫如说，是心灵的。……”“另外，作为艺术家，我愿向诸位披露一则消息，我的出走也包含着爱情上的原因，我愿与我深爱二十多年的楠莉小姐共赴天涯，我既爱江山，也爱爱人。”一位在场的记者问：“温莎公爵是不爱江山爱美人，你说是既爱江山又爱美人，范先生你是否能再作进一步解释……”范曾笑着回答说：“江山的内涵，范曾不可以作皇帝，但我很满意在美人身边。——尽管美人已经迟暮了。”

范曾这句话，使会场反应强烈，有人哄笑，有人惊愕，有人用法文大叫：“这不公平啊！”因为楠莉从外貌看实在太年轻了。而范曾身边的楠莉，依然风姿娴雅地垂着眼，脸上没有特别的表情。

这位楠莉女士，当时年已51岁，比外边传说的要大五、六岁，她仅比范曾小一岁，跟早先在红旗越剧团的丈夫曾育有三个子女，两年前，离了婚。据说楠莉是一对日本夫妇在中国生下的孩子，父亲木男是侵华日本军官，在1945年日本

投降时，沈阳发生过一批日本军人集体切腹自杀的事件，一共有30多人，楠莉的父亲是自杀者之一。她后来由一位好心的中国妇女收养，在去法国之前，她曾在北京东四一家服装厂工作。她天生丽质，妩媚动人，言谈话语比较得体，似很有教养。但没有上过大专学校，所以不能有自己的专业。据熟悉她的人说，她聪

明过人，很多有疑难的朋友都找她帮忙。

“文化大革命”期间，范曾曾经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范曾已与边宝华结婚，楠莉也有自己的家庭并育有子女。但范曾同楠莉从第一次见面起，相互就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可谓“一见倾心。”这也就成了范曾自己后来所说的多少年来心中痛苦难以摆脱的事情。

因为，他认识边宝华远在楠莉之前，而且是患难之交。范曾，在爱情上，曾有几次波折。当范曾与边宝华进入爱河时，边宝华走进范曾的宿舍，看到的是：环境萧然，杂乱无章，范曾那条早已破了的被面，是用红纸粘补的。

边宝华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时，是个高材生，工笔和白描的功夫要在范曾之上，泼墨写意则比范曾差得多。早年，范曾在画一组名为《毛主席与科尔班》的画时，边



范曾与楠莉

宝华是他的助手。在他们合作的过程中，凡是涉及工笔重彩之处，都有边宝华的心血。1971年，她同范曾结婚后，她的绘画艺术逐渐生疏了，边宝华为范曾献出了一切——从自己的心血到自己的才华。为了范曾能有更大的成就，她不知疲倦地替范曾裁纸、打图章、收集整理各类资料，接待客人，料理家务。在范曾写旧体诗同时，因为边宝华普通话说得不好，就由她发音来认定“平仄”四声。范曾回南通，上黄山，下洞庭，远渡扶桑，都是偕妻同行。终日忙碌的边宝华当然也乐于跟范曾去开阔眼界，可谓之形影不离了。范曾说过：“在我，倘是妻子不在身边，心里总觉得少了什么似的。”

范曾在为边宝华所绘的《玉洁图》上题写了一首七绝：



“玉洁冰清美人譬，临风素缟意飘然，亭亭不作幽共怨，日下依稀是谪仙。”

边宝华算不得仙女，也不是范曾常在朋友们面前戏称的“土豆和白薯之美”，她娇弱、惠心纨质，感情既丰富又单纯，她不会秋波含情，也不会目予神授，而且，她比范曾大三岁，还带着一个小女儿走进范曾的生活中来。

但在那几年，范曾常对朋友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能像我现在的妻子那样爱我。”

后来，他又说：“在男女私情方面，比较拘谨的人一般来说是出于三种心态：不敢、不愿、不忍，我是不忍，这不忍之中包涵着良知、情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因为，我有一个真诚地倾心爱我的妻子！”

当然，边宝华决不会想到1990年11月4日范曾会带着他心爱的美人棉莉小姐远离祖国，抵达法国巴黎。尽管，棉莉一度也是边宝华的朋友，尽管宝华也知道，在范曾辞国前，他同棉莉已同居了一年多……

所以，当范曾出走之后，边宝华在家中接到不少人的电话，她曾无奈地表示，他出去前并没有通知她，她也只是听说范曾要到新加坡开画展，此外便一无所知，而且，她明确表示，范曾不应该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在国内也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合情合理的解决。她相信，范曾对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迟早会后悔的。

到底，要了解范曾的莫如和他生活20多年的边宝华。

范曾到达巴黎之初，一时期，

新闻媒体等热网非凡，范曾成了许多报刊的头版新闻人物。

半个月后，范曾住在巴黎11区一座漂亮的住宅楼的七层。一位华侨朋友抢先登门，将他的一幅画买去，一次付款20万法郎，不久，又有印尼巨富出价20万美元，订购了范曾的另一幅巨画。

1991年底，范曾在巴黎的郊区买下了一幢带花园的小楼，取名美松白兰别墅，一次付清50万美金，当时即合300多万法郎。这是一幢欧洲式花园洋房，门外没有一



范曾1991年在台湾遭胡云鹏袭击

丝中国味，门前植了矮树丛，后面矗立一座两层高的白色金字顶小屋。进入花园拾级而上，经过一个小阳台才到门口，沿路花草修剪得整齐美观，客厅全以西式布置，水晶吊灯，欧洲古典实木家具，法国宫廷式镜边大镜，同系列的相架。范曾还喜欢光顾罗浮宫对面的一家古董商场，曾在这儿一口气买了20万法郎的铜雕摆设。

因此，国内一度曾盛传，范曾在法国穷困潦倒，混不下去了，这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他虽对记者说，他在法国生活虽非巨富，然其存款即使自此后一幅画不卖亦足可生活20年。

对一个像范曾这样的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精神、感情世界。

对范曾来说，在法国生活渐趋安定下来后，他们心情却越来越不安起来。

范曾这个人，一般来说，他是喜欢热闹和习惯于忙碌，他不喜欢悠闲。

有人问到范曾的生活，他用“简单”二字形容，每日早起画画，写诗词散文，再有是逛古董店、跳蚤市场。

范曾说：“我没有交上法国朋友，况且深居简出亦鲜与本地华人来往。这里的人，互不关心，这是法国的社会病态。”他说：“一段时期的寂寞，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对刺激创作方面，有莫大的好处，但长久的孤寂，将会影响性格变迁……”

1992年2月10日，他来信对我说：“我已购得巴黎近郊之花园别墅一处，远离市厘喧嚣，日日与闲云野鹤为友，心境依旧郁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

何求。’他在信中还寄来新诗一首，诗中说：“……怅触伤心忆故都，丛菊犹吟工部句，高松自许孔明声。海门掩闭箫声断，小径徘徊竹影孤。我自抱冲甘寂寞，萧团夜坐煮花舒。”

1992年3月19日又寄来一首《减字木兰花》：

“天涯何处，又见无情飘柳絮。雨冷丁香，忍识他乡是故乡。浮生旷放，报国书生余痛枪。目渺家山，早悔东辞函谷关。”

显然，他不停地写诗，不停地绘画，可是他内心感到越来越孤寂，创作的灵感越来越枯竭。

早先，范曾曾对我说：

“我每次出国，都有一种最深刻的体会，无论外面是什么花花世界，锦绣乾坤，任你五色迷目，五音乱耳，都不能动摇我对祖国的热诚，相反，更增加我对祖国河山的爱恋和怀念。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但是，我从外国的山河那里演化不出生动的形象，诱发不出深刻的意境，无法寄托我的情思。回到城市，我更觉得‘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我相借倘使我在国外生活几年，我一定会得思乡症，而且我知道那时我的绘画将失去感人的魅力，失去灵魂，空剩躯壳。”

他去法国不久，虽出版一批名信片，以西方画为题材，以国画手法作出。但反应极为冷淡。在法国三年，法国没有一个人买过他一幅画，亦没有卖商登门求售。在法国，懂得欣赏中国画的人很少，更遑论高价收购。

我记得几年前范曾曾对我说：

“我在祖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滴水，这一滴水，一旦离开了江河就会枯竭。我的艺术立刻会变作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艺术家一旦离开了哺育他的大地，任凭他有多大的才能，也只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没有祖国就没有我的一切。”那时，我听范曾这么讲，以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而实际上，那时，这些并不是他的切肤之感，因为那时他出国，到底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而已。而蛰居巴黎三年，三年的孤灯冷雨，这才使他有了一颗真心的体会，才使这些美丽的词藻变成了他从感情上、思想上真心理解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范曾实在是太痛苦了。他只能面对森林吟诗，面对孤灯作画。他开始大口大口地抽烟，从烟斗中细品其中的所谓妙趣，他养花、养狗、

养猴……

范曾在痛苦中思念他的祖国，拳拳依恋于东方的艺术文明。他说：“我一向推崇东方文化。我来到巴黎之后，并无东方艺术自惭形秽之感，西方之雕刻，固有惊心动魄结构，然跟我中华之龙门、云岗，莫高窟诸胜迹，恐不可将此两者分其高下轩輊。绘画上情况亦然。”他说：“……东方的文明自有它永恒的不朽的魅力，对西方正不必高山仰止，累行行止”。东西方的艺人，在互相寻找自己的参照系，从而认识自己，也认识他人。我来到巴黎，不是企图邯郸学步，最后走也不会了，再爬回东方……”

对范曾来说，引起他内心的不安莫如在参观留学生宿舍时看到学生们床头挂着他曾为国家教委所题赠他们的字幅：“月是故乡明”，“砥砺品学”，“忧乐关天下！”

他难以反躬自问。于是他“悔当初一怒辞天阙，解不了，相思结。”

# 人海浪

他常常收到国内朋友和南开大学师生的来信，自1985年为天津南开大学“两年画一楼，两鬓添秋霜”，今大楼已成，他一手建立的东方艺术系已开学两年，他说：“莘莘学子，我所深爱，至今未见我一面，我的辞国带给全系师生无可言说的遗憾和痛苦，此亦我远居异域内心不安的主要原因。”

了解范曾的人大都知道，范曾很富有艺术家气质，做什么事情往往凭自己一时的感情冲动，而且很难听取朋友们善意的不同意见。当初辞国时，匆匆忙忙，连最知心的



朋友都一无所知，到巴黎过了一段时间，冷静下来，发现周围一切的人与事未如原先想象中的尽人意，于是又后悔。范曾经常在冲动、冷静、有悟、后悔中往前迈步。

吴祖光先生说：“总的感觉是，范曾性格属于冲动型，容易感情用事，……他的出去出我意外，出国的理由只为了争婚恋的自由，是‘真名士自风流，爱情至上，无可厚非，也无法反对，我希望这是唯一的理由。”“千万别扯上政治。”

经过两个月与国内有关人士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通话，书信传真往来，商谈，1993年6月27日晚，在巴黎歌剧院旁的新敦煌酒店，范曾对众多的记者们宣布：中央已批准他返国，他将于28日下午起飞，29日上午7时抵达北京机场，然后去天津南开大学寓所。他说：“我是5月6日公开提出要求归国的。”一个多月就能成行，以圆思国之梦，确是十分温馨。”

他向记者们散发了两份文件，一份是记录他在巴黎生活两年多

的照片画册，题为《去意徘徊》。是白桦的手笔。范曾说，这是一言难尽的诗意。“往昔不可见，来者必可追。”还有一份是手写复印本《归国声明》。他解释说：“两年半前，我来巴黎发表过《辞国声明》，今日发《归国声明》，以求一个严肃的回答和完美。《归国声明》称：“范曾于巴黎近三年在域外岑寂而孤独的生活，使我知道，一旦远离幅员无垠的神州大地山河，离开博大精深、东方文化的土地，我只能写出如此的感叹：‘归程应识天无际，畸离翻知海有涯’，和如此凄惶‘雨冷丁香，忍识他乡是故乡！’从而使我悟到艺术家不能囿于因一时一际困惑而追求的小自由和小解脱，这就可能重陷另一种心灵的桎梏。”“唯有与祖国同在，才应是我永恒的、不朽的追逐，才是我心灵的大自由、大解脱。”

《归国声明》还说：“当我看到二十世纪末世界经济萧瑟而故国一枝独秀这不争事实时，我为伟大的中华民族蕴含的自我调节力而

自豪，向前看是一片慎无际涯的浩荡的景象。”

当记者问到他的女友楠莉是否回国时，范曾说：“不，我先回。此刻楠莉回国难免尴尬。待我回国办完离婚手续后，请楠莉回国完婚。然后再来巴黎举行结婚仪式，请大家来喝喜酒。”

早先，有人传说，范曾曾“两次”有意回国，结果如何？对此，范曾回答说：“我莫止两次几乎每天魂牵梦萦”。在招待会上，记者问他是否“归心似箭？”他说：“佛家说，一切随缘。但我确实为能回祖国而高兴。我深盼，故国山河无恙，亲人安康。”

范曾归来！

范曾终于回来了，远离母亲的游子！

29日晨，当范曾通过机窗，看到祖国山河大地时，他内心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的眼眶中默默地流出了眼泪。

闻风而来的国内外记者正焦急地等候在北京机场的门口。

一架银灰色的来自法国巴黎的航机在首都上空盘旋，降落。范曾走出机舱，站在机舱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祖国大地的空气，那么新鲜，那么甜美，那么滋润！他立刻发现，停机坪上有来自天津南开大学的五、六辆漂亮的小卧车。

曾经陪同他



边宝华（右）在她的展览作品前

去新加坡、香港的两位老朋友也在欢迎的人群中，他们手捧鲜花，互相热情地拥抱着，其中一位给了范曾轻轻一拳：“老兄，害得我们好苦！”

范曾微笑着说：“我会报答的。”

归心似箭，范曾坐上了小卧车，一溜烟浩浩荡荡上了京津唐高速公路，急驶而去。

范曾，凝视着左右急速退向后的华北大平原，田野中的庄稼树木不那么葱绿，那么生机勃勃，那么亲切，那么熟悉，在祖国的大地上，他从来没有感到如此舒适伸展自如！

7月2日，我在北京家中，电话中传来范曾熟悉的声音，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今天中午，南开大学校长宴请了我，席间，校长对我说，他准备聘请我担任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

范曾又开始了忙碌，诸多的事情要等着他去办。7月9日，是他55岁生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范曾忙里忙外，显得情绪很高。人们说，范曾是喜

欢热闹的，现在真正的热闹非凡。孤独曾经使他难以忍耐，热闹、前呼后拥，使他感到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艺术创作的自信心。范曾，在他的学生中间，如鱼得水。

范曾曾对人说：“我辞国的主要原因，其一是家庭生活

之不睦，今我已与原偶分居逾三年，离婚之事当不成问题，这对我亦如释重负。”

在范曾回来之前几个月，我曾问过边宝华，“你还爱不爱范曾？”

她率直地回答我：“爱，尤其爱他的艺术。范曾确实是个极有才华的画家，在他身上，有我不少可以学习的东西。为了范曾的成就，我献出了近二十年的全部心血，连我自己的绘画艺术也荒废了。我们从1971年结婚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朝夕相处，我对他毕竟是有感情的，何况我们还有一个很聪明、懂事的孩子。我希望他能回来，回到我的身边，当然这仅仅是我的愿望。范曾的性格您也知道……”

范曾去国近三年，虽然同边宝华没有一封书信的来往，可是边宝华时时关注着范曾的情况，常常她从电话探询中得悉范曾的动作，不管如何，范曾已成为国内外媒体追踪的新闻人物。

当她得知范曾在归国前回答记者说：“待我回国办完离婚手续后请楠莉回国完婚，然后再来巴黎

举行结婚仪式，请大家来喝喜酒。”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不少的刺激。这个时候，她已决定，各走各的路。

作为他们二人共同的朋友，我曾为此而担忧。

然而，我没有预料到，几经周折，终于在9月15日，范曾与边宝华走出了北京市民政局的大门，他们手中各执一份离婚证书。范曾与边宝华二十多年的缘分走到了尽头。

范曾送边宝华回家，那里有她年已80的老母——那位曾经无微不至照顾范曾的善良的老人，还有相依为命的女儿……

那座熟悉的大楼一会儿就在眼前了。边宝华依然像老大姐似地对她的小弟弟范曾说：

“看到你这次回来戒了烟，我很高兴，希望你保重身体，并好自为之。”

范曾苦笑了一下，低声说：

“宝华，你以后如果有什么事，还可以给我来电话！”

宝华鼻子一酸，径自快步进了大楼……

孤寂的范曾（1992年在巴黎）



# 国门内外的「倒爷」们

□ 德 黎



不久前，我经历了一次花洋钱受洋罪的中亚之旅，其感受颇为新鲜独特，且记

参加这一购物团的倒爷，每人用 2798 元人民币买来这次出国机会。当他们拿着护照出入国境，后面行李车跟随送货，比起那些在内陆地水陆码头手提肩扛跑单帮的小倒们，自我感觉好多了。可是一到国门关卡上，也一个一个的蔫儿了。

我到过阳关、玉门关、潼关、兰关、函谷关、剑门关……进进出出多少次，从未感到是在过关，因为那都成了不设防的历史纪念地。可这次不一样，和倒爷们一起进出的是由两国军队分别把守的海关和边防检查站，其严格紧张气氛使人们的心提到嗓子眼上怦怦乱跳。

我们从喀什以西 170 公里的吐尔福特口岸出境，过国门后，人、货都要换上对方来接的车。到对方海关时，天已摸黑了。事前旅行社专门来疏通过，希望购物团带货进出时合理收费。对方的关长，一位以前的旅游局官员回答说：“我来这里就是为赚钱，不然来这鬼地方干什么！”倒爷们早就从旅行社听

说过这段掌故，坐在车里屏气静悄悄等候我们称为“团长”的旅行社全陪与他谈判的结果。过了好半天才有回话：“两车货交 20 万卢布放行”。起先开的数是 30 万，团长好说歹说减了 10 万。不等大家商量，关长跳上车来，叽哩咕嘟喊了一阵下去了，翻译说他让赶快交钱，不然他要下班了，明天再说。这里地处帕米尔高原，海拔 3000 公尺以上，不少人有高山反应，头重脚轻象晕船一般，且是冰天雪地，又没吃没喝没住处，长夜难熬，于是赶快凑卢布。连我带的 6000 卢布也借了去，才够 15 万，又拿去商量，让再交面包费，就是羽绒服，送了去，还要酒，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带，我拿出饮料高糖，问这行不行？团长拿了去，不一会就回来说：“放行了！”车终于开过关去，倒爷们如获大赦，这才喘了一口气。

出关后，大轿车在茫茫夜色中高速行驶。明月升起后，望着车窗外依稀可辨的异国景色，想起了唐僧玄奘。此时此刻，我们走在他当

下以兼读者。

## 误随“歌舞团”

为回访几位从独联体中亚国家来的朋友，我们通过旅行社办妥了手续，旅行社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一个“歌舞团”一起走，我们一听便同意了。想着能一路载歌载舞，轻松愉快。不料上了乌鲁木齐到喀什的飞机一看，哪有什么唱歌跳舞的姑娘小伙，净是些不讲究穿戴的跑买卖人。原来我们把“购物团”听成了“歌舞团”。不由得有些丧气。不过这个误会倒使我们有幸与倒爷为伍，身临其境，真切地观察体验了一番他们的甘苦生活。

## 过关被“斩”

年走过的路上，似乎才理解了他偷渡出关远行的艰辛。

九天后我们又回到这吐尔苏特口岸。倒爷们卖了货，多半又办货回来，带回的洋货也是两大卡车。此行成败是赚是赔，全看海关收多少钱物了。倒爷们又把心提到嗓子眼上。

果然这回更糟。海关先给来了个下马威，借口五里外国门上沒有接我们的车，不让过，留客人了。其实我们到海关一小时后来接的车就到国门等候了，但消息被封锁了。我们自前一天晚上十点离开比什凯克，行一夜车，清早到纳伦，匆匆喝了一碗牛肉土豆汤，又行车大半天到这里，指望下午过关，半夜回到喀什好好睡一觉，这下只能在车里再坐一夜了。

我好在已作了过不去关的思想准备，不像倒爷们着急，便悠闲地下车溜达，抓到一张异邦雪景，还同一位吉尔吉斯士兵攀谈。他说自己三十岁了，还没结婚，现在月薪一万卢布，言下之意是为攒钱娶媳妇来的。我知道当时他们国家新规定的最低工资是一千六百卢布，给我们开车的长途车司机月薪

六千卢布，他的军饷还是较高的。我摸起他染了色的光板皮大衣，真了摸他里面穿的只有两条单裤，整天站在风天雪地岂不要挨冻，除非为挣钱成家，谁肯来受这份罪？他看出我的同情心，变得非常友好，合影时竟让我挎起他上满了子弹的冲锋枪，不过事后他一再逼我，照片别露出去，以免给他惹麻烦。我送他几块大大泡泡糖，他又向我用拇指食指捻了几下，我明白其意，又给了他余剩的一些零卢布，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

天黑了，我们坐在车里，司机要我们交了50元人民币才给烧了几壶开水，供了暖气。熬到天明，又等到日上三竿，海关上班，报来了价：两车货出境，交700美元。独自办了一车货的梅倒应声喊道：“我交！”麻利地数出350美元。余额按各人带货的数量分摊，又凑了350美元，交了不给收条的过关费。当全车人下去交验护照回到车上时，发现又被检查人员收走了几件呢大衣。

过了海关，正要开车，又被俄罗斯边防军拦住，惊恐不安的倒爷一个个瞪大了眼睛。边防军官说还

要两条地毡，据解释说，地毡不让携出，扣下两条表示他们检查过了，好

交差。可是谁也不愿意把已过了关的地毡再交出去。捱了多时后议定，让对方翻看谁的就事谁的，回到喀什大家出钱买两条还他。这样又交了两条地毡，总算放行可以回国了。

在国门上倒货换车，刚才痛快她交了350美元的那位梅倒没能过关，他一人带的一车棉布要补税，可能是一万来元，货车扣下了，人垂头丧气。

天黑以后，我们换坐上破得不能再破的车，在坏得不能再坏的路上颠簸着回到喀什。这一车人大都似乎忘记了整整50个小时连续坐车的疲劳，风尘仆仆也不能掩盖脸上的喜色。

### 倒爷的神通

回头过去再说出关以后的事。倒爷一到市场，个个如鱼得水，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每天天一亮，他们就在旅游宾馆东院内外练起摊来。树间拉起绳子挂上红红绿绿的服装，就是摊位了。杂七杂八的货中，最多的是运动服和面包服，运动服一律称是阿迪达斯牌，价格只合人民币二三十元，显然是冒牌货，面包服色彩斑斓，薄薄的，不过卖一千几百卢布，也只合三十来元。他们一人都带数百上千件衣服出去，在境外不过滞留个把星期，我替他们发愁会卖不完，更愁他们卖不够本，可只一天，见了包倒，他笑眯眯说，赚钱不敢讲，旅费是挣出来了。我一年的工资还不如倒爷一天挣的！不过倒也不易，会倒也要点真本事，与我同行



比什凯克副食品商场

办公务的刘君想把身上的新羽绒服卖了，换件呢大衣回来，正宗的YY牌，按国内买价卖也值七八千卢布，去集市几次，虽不是无人问津，但几天下来还是出不了手。

倒爷们的货能那么快出手，诀窍在哪里？他们的道理又简单又明白：“现在卢布不值钱，人家只能买便宜的东西，就认假冒商品，真好的他们还不要，买不起！”

最有本事的是老马，他是个建筑队长，本来是出来玩的，顺便看看那边的建筑业和房地产市场。不料与他同来的弟弟出关时打架，被扣留在海关上没让过来，装在行李车上的货却过来了，他只好替弟弟卖。他卖得最快，二十来包衣服，三下五除二，没三天就卖完了，每天晚上回来，从内衣里往外掏钱，不好意思地解释说，钱没地方装，就往贴身的内衣里塞，一大把一大把掏出来，最后解开腰带一齐抖干净，卢布散了一床，名副其实的汗水钱，还净是面额一千、五千的大票子，数一数，一百多万，把来坊的客人看呆了，这中国人这么有钱！

老马卖得快自有一套生意经。他开的价任人砍，三言两语就成交，决不锱铢计较；衣服数量也任买方自点，点完了报多少就是多少，说缺就补，挑出有毛病的他看也不看就另给拿，那有毛病的就白送了；忙时连钱也让买方自己数了给，他说他一个人也买是顾不过来，不过别人数时他还是用双眼的余光留心看的。这样顾客心理上很舒服，都愿意买他的货，就卖得快。卖完以后他到集市上一看又乐了，说



喀什市场上的俄罗斯地毯

同样的面包服那里零售还一件1350卢布，他1450卢布批发，还多卖100卢布。

卖不易，买更难。老马只留最后一天买带回去的货，我担心他会两手空空，抓一大把随时会贬值的卢布回国。我们几个有空就跑市场，从国营商场“促姆”到街头集市“巴札”，好几天也没买到多少东西，我两个女儿的大衣才买到一件，不想老马一天就买回堆了一屋子的呢大衣，大大小小，质量都不错，我奇怪他怎么搞到的，他说，到商店找经理，塞上几百卢布，就可以进库里挑，店堂里虽有时空空的，库里可满着呢，挑好以后，每件再加100卢布就都买回来了。几个商店跑下来，就买下这一大堆，总共不过多花几万卢布。折算成人民币，一件合五六十元的呢大衣也就是多花二元钱，到国内卖价至少翻一番，他这样跑一趟，少说净赚二万。

多数倒爷的本事不如老马，带的货多半要靠当地的老关系帮助处理。新疆各族的倒爷在那边有许多亲戚熟人，语言也大致可通，人一到打个招呼就都来了，小汽车和

货车一车车往外拉，货也能很快处理完，再约下次的买卖，做起来得心应手，当然这算不得神通，只能算人通了。

### 倒爷的辛苦

购物团的这些倒爷，出有车，食有鱼，可干得真辛苦。

连日行车赶到比什凯克后，大家都困乏不堪，却在东院的货虽有栏杆加了锁，雇上保安员带枪看守，并不能放心，怕夜里来人哄抢，怕看守自盗，还得轮流值夜，不然丢几包衣服就损失不小。老马值第一夜，说好两小时一换班，可是旅馆大门上了锁，他就没惊动大家，独自顶了一夜。时已入冬，他两天没睡，又在外站一夜，其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天一亮，倒爷们就起来卖货，贴在堆成小山似的麻袋上讨价还价，一天下来口干舌燥。只有几天时间，货都得售完，再进往回带的货，一点旅游闲逛的时间都没有不说，那份着急就够受的。还有过不去关的心理煎熬、风餐露宿和赔钱破产之险，不是为了发点财，大约是很少人愿受这洋罪，吃得这份苦的。

人海  
浪



旧时，北京的戏院子多。以珠市口为界分街南、街北：街南是天桥一带，街北是从前门到大栅栏等地。街南天桥是贫民地区穷人娱乐的地方，街北算是高等人娱乐的地方。北京出了不少好演员。我虽是戏曲演员，从小唱戏，对

历史没有研究，但只知道来北京唱红了才算好演员。但在街南天桥唱了戏，就不能进街北戏院了。

天桥戏院子一家挨一家：天乐戏院、小桃园戏院、万胜轩戏院、小小戏院、吉祥戏院。天桥的戏院子大都是铁罩棚，没有楼，观众坐长板凳，大门口进来可看见台上戏。因为是流水坐。门口有一个大斗，观众看看台上的戏。喜欢进去向斗内扔一毛钱，就可看一天，早八点开戏，晚九点散戏。几出戏来回倒，轮流唱，主演也是随着倒换，因此进了剧场就是一天，吃饭得见缝插针。

在天桥众多戏院子中，属吉祥戏院设备最好，也最大，房最高。这块地方也特别热闹，

# 天桥杂趣

新风霞

吉祥北边是故衣摊的吆喝声光叫，粗糙对比，骂人吵嘴声，象杂牌大乐队、五音合奏。故衣摊成排连成趟子，可是也有新衣服摊、丝线、头绳、扎腿带、新旧鞋摊、鞋面、皮底、面口袋、新旧布头摊。

还有“鸟市”，可热闹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应有尽有，各种鸟叫出各种声音。猫、狗、猴、鼠，一次我看见大笼子里有一条大蟒，真敢玩邪的，好吓人！去鸟市的人男人多女人少。坐着包月车的太太、小姐们带着佣人是专门买猫、狗的。作买卖的会看，亲自到买主面前，和颜悦色、逗着小猫、小狗，使买主欢心！他们说：“作买卖人喜欢、作好一当子买卖，就得吃一个月窝头。天桥这地方藏龙卧虎，来鸟市的人各阶层都有。常看见人们提着鸟笼子，牵着小狗、抱着猫、架着鹦鹉，鸟市真吸引人。

我从小喜爱动物，去鸟市也是一大开心事，看见什么都爱，可买不起，但我还是买了两只小白老鼠，一个长方的铁丝笼子。我在天桥唱戏，很多在天桥作买卖的大都认识我，叫我：“大姑娘。”看我来来回回的看小白鼠。掌柜的丁大伯看出我的心思，说：“大姑娘，你爱上这对小白鼠了！来吧！连小笼子你提走，咱们都是在天桥这块地方找饭吃的，你在台上演唱，我在台下看戏，你这来了，就是给我添了光啊！爱哪对你就拿走。”我说：“不，大伯，我是从小爱小动物，可是大了没有功夫玩了，你看我一天连场唱戏，一天要轮到五、六出戏，哪有时间玩呀！谢谢大伯了。”

鸟市离吉祥戏院很近。我进了后台不一会

年青时的  
新风霞

儿，我母亲陪着卖白鼠的丁大伯，来找我，丁大伯手里提着那个长方铁丝笼子，里面两只小白老鼠在小滑轮上翻跟，太好玩了！丁大伯说话声音大，他是在鸟市习惯了，说话象吵架，大嗓门儿：“大姑娘！我给你把这对白老鼠送来了！要当个好角儿哇！你可要学学那些大角儿，梅兰芳他喜欢养猫、狗、鸟，更爱鸽子。我晚上去你家，给你讲一个好故事，是个大演员。”丁大伯声音越说越大，后台老板过来了：“行了，行了！前台唱着戏了，你的嗓门儿大，前台都听见了。”我母亲明白了说：“丁大伯呀！为了找新风霞，亲自送来这对白鼠，我太谢谢您了……”大伯仍是大声说：“不，还是为了让大姑娘懂得当个大角儿，要有大角的脾气！喜好哇！这得教她！我可跟大角们打了不少交道了，说起来可多了，在后台我先不说，赶上阴天下雨，咱们有空了，我去您家，嫂子，给我冲壶茶就行了，哈哈……我有一脑子的角儿们，好玩的事呀！当个大角儿得学学大角儿的喜好！”他把小白鼠笼子向我怀里递过来，说：

“这对小白鼠，大姑娘收下吧！”我说：“大伯，您不是教我玩吗？我一定学。可是玩得给钱，您要是不要钱，我就不学！”丁大伯摆着手，我母亲拿出几张小票子来对大伯说：“咱们为了把凤霞教育成角儿，头一回可得要钱，叫孩子知道这是买来的，玩的要仔细。”我已把小白鼠笼提在手里，后台有人七嘴八舌的说：“对，说的对，老妈。咱们在天桥的公平市场，吉祥戏院后台，可要公平买卖玩的痛快呀！”又有人说：“好角儿会挣、会花、会唱、也会玩儿，钱多也会糟！”这一点我唱了一辈子戏也作不到，不会抽烟、喝酒、玩牌、跳舞、买东西，我把钱包交给售货员，让她替我数钱交钱。

金少山是著名京剧名净，他是名净金秀山的儿子，天生有父亲的血统，遗传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人称金嗓子。他和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人称他金霸王，观众说他唱一句，房梁都震得向下掉土。

在鸟市哄传着一件事，金少山是个好演员，也讲义气，花钱如流水，有气魄、爱玩的

新风霞与小诗人金今



好人。他常常同一位女士来天桥鸟市买鸟、猫、狗、猴……更新鲜的，他买了一只小老虎。鸟市作买卖的人就把金霸王买猴、买老虎作为宣传。

金少山有一个情人，石头胡同班子的名妓绿牡丹——老大。这个名妓长的眉清目秀，瘦高个子，常梳一条大辫子，脸不白紫里透红，穿长衫颜色淡素、清水脸不化妆。经常女扮男装陪同金少山出入天桥鸟市。跟包的马褂子——大杨，随去替他们拉、提着买来的动物。

丁大伯跟马褂子——大杨，也都住在天桥南下洼子，是我们的邻居。有一天下大雨，天桥的买卖是风来停，雨来散。丁大伯和马褂子大杨来我家串门，我母亲给他们冲了一壶茶，茶喝好了，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先问：“丁大伯您知道为什么杨大伯外号叫马褂子吗？”丁大伯哈哈大笑说：“这是你们戏班人起的，也是金老板叫响的，大杨的妹妹是唱过花旦的，后来嫁了一个戏院子经理，大杨是舅爷，很多戏，舅爷都穿黄马褂子，金老板有事大叫：‘马褂子……’就叫响了，人人都知道大杨外号‘马褂子’大杨人老实厚道，也从来不反对人叫。”

大杨人善良，他说起金少山的很多事，金少山有骨气，不怕权势，讲义气。说是在上海演出“法门寺”，也怀里揣着猴，手里牵着一只长毛洋狗。他每次画好了脸，都要留下两笔不画，就在上场前才画。有一次因最后两笔误了场，有权有势的黄金荣拍桌子说：“好个金少山，他敢在上海舞台耍手腕，枪毙了他！”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们也都横眉竖目地准备着，结果他上场念了四句引子：“四海腾腾庆升平，锦绣江山咱大明。满朝文武尊咱贵，何必西天拜佛诚！”台下哄堂叫好，黄金荣也下了火气，并传话请金少山老板吃宵夜。

金少山给权势头头演出，要耍角儿脾气，有意晚到场，故意画脸，慢慢腾腾的，最后上场，前一两分钟才画最后一笔。但在每年冬季，为贫苦人义演，他早早就到场，而且特别卖力气。有一年大伙儿在上海演出，想念家乡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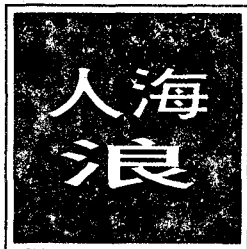
他主动亲自为大家作一顿灌肠火烧，大家吃着京味的灌肠火烧，感谢金老板替大伙儿着想。

金少山在京剧演员中经济收入算是可观的，但因嗜好太多，好友爱交，玩古董，买字、画，收藏工艺品，还染上吸鸦片的恶习，进来的钱不够支出，负责累累。他贫穷到包银到了手就光，头上戴的，身上、脚下穿的戏衣全部进了当铺。演戏用时，叫跟包的大杨赎回，演出完了又进了当铺。

丁大伯和马褂子大杨还说，金霸王爱养狗，当要债人来了，就让狗扑过去，但要债人就装作低头拾石头，这样狗也不管用了。于是他去鸟市买来一只小老虎，要债的来了，他开笼子把虎放出来向要债人扑去。丁大伯在鸟市大声宣传：“来呀！各位先生看看我这里有什么有什么，爱玩什么都各有特色呀！有金丝猴、小袖猴，看家的狗、迷人的猫、还有亲近人的东北老虎哇！京剧名家金霸王家里的小袖猴、黄老虎，就是从我这里买去的呀！霸王牵着虎，美人绿牡丹——老大抱着猴哇！后边跟着人，提着笼子里边是金不换、会叫的黄色的鸟哇！”

金霸王最开心的是他躺在床上，绿牡丹老大斜卧在他对面，双手为他烧着烟泡，狮子猫、小花白狗，在床上跳来跳去，小猴子趴在他腿边为他抓痒痒，黄老虎蹲在他脚跟边，吐出舌头为他添脚气，解痒痒。高兴了和美人老大两支烟枪一对一地吸着，听着鸟笼里画眉鸟的叫声，鹦鹉的学话声：“您好，您好！”他吃饭喜欢整桌酒席，水果只吃一个尖，都是最鲜最好的。他最怕是阴天下雨身子骨难受，抽筋剥皮似的痛，要为他捶腰砸腿。他还怕要债人的声音。不高兴了，最喜爱的古董扔了，鸟给放了，动物赶出门，甚至连美人老大也轰走。

一代名净金霸王，  
可说是会挣的，会玩的，会花的，也更是会糟的，最后空空落落，一贫如洗地死去了。



50年代的中国，有过一座全是“高干子弟”的学校，即今北京101中学。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学校，造就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学生，这个学校的校长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



1948年，一个明丽的北国冬日，有位陌生的中年妇女，来到西柏坡。

“一知同志你来啦？欢迎你呀！全国就要解放了，解放后你想做什么工作？有什么要求，给我说好了……”

这便是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对这位由上海辗转香港来到西柏坡的妇女异口同声说的话。

新中国建国在即，这位为中国人民革命立过汗马功劳有过传奇经历的女子，那一天她原本可以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出那样的请求。

她的任何要求都会被接受。

请看——

王一知，1922年秋经刘少奇、俞秀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中国共产党屈指可数的第一批女党员。大革命中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结为伴侣。她参加了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她是青年毛泽东的密友，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知生病，毛泽东搬个小板凳，坐在她的病榻前，娓娓而谈；周恩来与一知更有着深深的友谊交往……还有，家喻户晓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所描述的便是王一知参与领导的上海地下党电台的一段真实故事。王一知曾在李大钊家中寄住，在李大钊和向警予的直接领导

下做党的妇女工作……

然而，她却什么要求都没提。

### 没有走上银幕的女主人公

1942年9月，秋风阵阵吹袭着已经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上海。那一天，一个风姿绰约、手提咖啡色考究手包的妇女，出现在法租界建国西路一带。

她站在福祿村10号一座三层楼的大门外，突然她看见一个奇怪的场景：那个她熟悉的楼房主人的女佣人，面朝里，背向外，一只手却在背后使劲儿摇、摇、摇！

闯进的女客迟疑了一秒、两秒，明白了！轻盈的脚步继续往前迈，离开了福祿村10号。

这个打扮成贵夫人的女子，便是上海地下党三部秘密电台的联络人王一知。王一知那时还不知道：一天前，设在这座三层楼顶层阁楼上的党的地下电台之一，已被敌人破获，中央从延安派来的李白同志被捕了，而敌人正藏在楼里张网以待……

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形。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由党中央从延安派往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单身汉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便由王一知出面物色了思想进步的纱厂女工姜惠英与李白假扮夫妻（后来他们真的结成了生死与共的革命夫妻），在法租界建立了那个秘密电台。那是个夏不通风、冬不御寒的低矮阁楼，李白用一双共产党人的坚韧的手，敲击键盘，让电波超过江河，超过高山，把上海地下党获得的情报传送给党中央，再把党中央的指而传达给地下党。

在那个漆黑的九月之夜，李白来到阁楼上，熟练地打出“哒哒”鸣响的密码。突然，电灯灭了，电台只好停止工作。不一会儿，灯又亮了，李白又开始了工作，哦，过一会儿又灭了，又亮了……

停电，李白没有料到这是为了他！——敌人就这样利用分区停电、步步缩小停电区或来探测这神秘的电码来自何处。直到楼下响起急促的敲门声，直到李白听到奔向楼梯的脚步声，他才匆匆将电台埋进阁楼上的煤堆里。日本人、汉奸在阁楼上一番搜查——什么也没有发现。有的敌人已转身出门，不知怎么的，这时一个不死心的汉奸使劲儿踹了几脚薄弱的楼板，被震落的煤球刷刷滚落，暴露出来依然散发着炽热的电台……

由于女佣人的机智而侥幸脱险的王一知心急如焚，必须把李白被捕的消息通知所有和李白有关系的地下党员。可以想象，敌人对

# 北京101中学校长 ——和一知和她的学生们

●徐然

李白必将使用酷刑，如果被捕者忍受不了酷刑，招了供……

那么由谁来执行这可能牺牲生命的重任？王一知挺身而出，这位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纤弱女子，把生死置之度外，完成了转移地下党的重任。此外，党的三处地下机关转移后，还需要把党花大笔经费买和“顶”来的房屋处理出去。不言而喻，党的机关也随时可能暴露。一经暴露，谁出面处理房屋，谁就可能被捕。还是王一知自告奋勇，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在党的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把党投进大笔金条的房屋处理掉，为党收回宝贵的资金。

拔指甲、上老虎凳，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使李白同志屈服。

为营救李白，王一知到处奔波。而李白始终坚持他的电台是为一位商人了解黄金行情而设，他终于被保释出狱了。

王一知又从西柏坡回到了上海。她找到做地下工作时的老上级刘晓同志，她说：“我从青年时代在肖警予同志主办的淑浦小学教书，就爱上了教育工作。现在革命胜利了，我想踏踏实实做点事。给我个学校教教书怎么样？教育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我都想体验一下，先做班主任也行……”

就是这么简单的要求啊！

王一知革命接管上海最大的

吴淞中学。

这是王一知与高官厚禄绝缘的抉择。

圆明园——开国之初，那儿汇集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干部子弟”

1950年，王一知奉调北京。有关部门依然根据她本人搞教育的意愿，安排她在华北中学任校长。嗣后华北中学与师大附中二部合并，再后附中二部又更名师大二附中，最后更名为101中学。

这些均是干部子弟学校。这样，在一个中学校长千头万绪的工作中，王一知便有了不一般的工作课题，那就是教育——建国40年来常常引起中国老百姓注视、评说甚至非议的——“高干子弟”。

怎么会有干部子弟学校呢？难道中国共产党人也搞俄罗斯帝国时代的“皇村中学？”

不是的。

请看看王一知的学生。

这儿，有烈士遗孤。

这儿，有红军丢在江西、湖南、长征路上的孩子。把他们找回来，十八、九了，大字不识，哪个学校



晚年的王一知

录取他们？

从延安送到苏联的一批，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长大，20几个人，一句中国话不会说。

地下党工作者的孩子。父母不能暴露身份，其中有人将长久隐藏在敌人内部，这些孩子曾经流落街头，有的又不被自己人理解而曾倍受屈辱……

一大批解放后被父母从农村接出来的大娃娃，也是十八九、二十郎当岁了还是文盲！由谁对他们进行这特殊的补课？

孩子们实行供给制，穿一色衣，吃一色饭，一律住校。王一知领导着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她知道自己肩头沉重的分量。师大附中二部的校址选在被八国联军焚毁的圆明园，她要在圆明园的废墟上为这一批革命后代、烈士遗孤创造一个温暖的家园。

教育，是一门大学问。针对师大二附中的特定干部子弟群体，她说了普普通通的八个字：学到知识，懂得劳动。

她担心的只是——共产党人的后代，会不会变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新生入学，头一堂课便是建校劳动，而且，那时学生的课表上每周有一天的课程是：“劳动”……孩子们在杂草丛生的圆明园旧址荒坡上，自己动手平操场、填坑洼，栽树种花，建校办工厂、种试验田；整齐的田埂上，行行果树，畦畦蔬菜，映出了孩子们红红的脸蛋和强健的体魄……

当时的客观历史是：进城不久，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出了刘青山、张子善……并不是任101中学校长的王一知杞人忧天。在圆明园，王一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每到星期六过午，学校办公楼前的庭院里，便有成排的小汽车等候着。

是的，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人，开始有小汽车坐了。圆明园离城怪远的，一周就放一天假，让司机接接孩子吧！

1952年，师大二附中明文规定，学生离校、返校不许乘坐小汽车。家长有事来校，汽车不许开进校园。

为了配合学校的教育，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站在圆明园的土坡上对师大二附中的学生谆谆教诲：“……你们的父兄是为革命立了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们，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什么，那就是一幅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

50年代的不少人是以前正的心灵对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时代。王一知是一个历经革命磨炼的共产党人，她力求把自己的纯正信仰传递给这些革命的后代。“101”的毕业生，许多已成为共和国的栋梁之材。他们有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各部委、军兵种的负责人；有的成为活跃在科技、经济、文学艺术、教育、新闻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的业绩已为人民所知晓。为了说明王一知校长的心血没有白费，为了让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代子女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干部子弟”，让我们随意选择几位50年代就读于师大二附中的学生的状况公诸于此吧。

——他们，都是些名不见经传，记取周恩来总理、王一知校长所教导的人生哲理，至今怀抱着50年代的纯正信仰的那一群。

吴本宁，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财政部部长吴波之子。响应知识青年要到艰苦地方去的号召，1954年自愿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工作。一别北京30年，历经大自然和人世的艰险，却至今不悔

自己的选择。

邢立统，烈士遗孤，中共党员。从延安到北京，进城前进城后，都是干部子弟们最崇拜最敬佩的“大哥哥”。任“101”学生会主席，勤奋、热情、干练，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永远微笑着帮助他人。高中毕业，王一知校长要求这位优秀的学生会主席留校，他微笑着服从分配。以老校长为样板，从无索取，就那么默默地在教育战线上忙碌了一生。

葛士芬，中共党员，父亲是抗日英雄节报国的亲密战友。战争年月，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讨饭，母亲、弟妹全饿死了，只留下葛士芬，党找到了他，送他入101中学。毕业后做公安工作，这个出身贫穷的苦孩子，直到70年代还住集体宿舍：一张木板床，一台自己用三合板钉的半导体收音机，这是那时候他的全部财产。

邓瑞生，中共党员，原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之子。长征时留在江西农民家，解放后找回来，误以为是林伯渠留在同一农家的儿子，故起名林秉苏，发现错了，旋改名邓瑞生。17岁入101，聪慧好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到湖南工作——做一个普通的工程师直到今天。

罗平顺，中共党员，肖华将军侄儿，也是烈士遗孤。从江西兴国找回来，进101中学时已20岁。被同学们起绰号“老百姓”，因为穿的土，又满口改不了的兴国腔。土归土，不管别人说什么，他只是玩儿命学习，一点不夸张，是拼了命的努力啊！凭着只有中国苦孩子才有那种硬气，这个20岁上中学的笨“老百姓”追上了别人，毕业于101中，到沈阳一家工厂落了户。

焦林义，中共党员，国务院人事部部长焦善民之子。从农村接来

入101中学,学习努力,威信高,在101任班长、年级学生会主席。只是学习太吃力,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一份儿平平常常的工作——在北京隆福大厦当过工会副主席,又做大厦保卫。

杨为民,中共党员,是曾任河北省省长、高教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的杨秀峰之子。1953年毕业于师大附中二部,再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北京航空学院搞航空技术研究。成绩卓著,被北京市评为“模范共产党员”。不言而喻,有着那样的学历,那样的表现,那样的“关系”,这些年多次有人要他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不知是否从王一知校长那里受到感染,他遵循不要名、不要利的原则——不挪窝,几十年如一日,就那么铁了心的把自己扔在了“北航”。

……

## 从行政八级到行政十二级

70年代的北京某著名医院,一位患败血症的老人家高烧不退,急需庆大霉素注射治疗。那时庆大霉素还是限量供应的紧缺药品,这位级别不高的老人,无法得到这种药物的治疗。老人的女儿伊红、儿子杨明开始为寻找庆大霉素四处求援。一位同事——她是位将军的女儿——得知此事答应想办法。不久,医院忽然开始组织对老人的抢救,护理、药物全奇迹般地解决了。

事后,那位将军女儿告诉弟弟:“本来是想请父亲帮忙弄点药,他一听是王一知校长生病,就给周总理打了电话。总理通知北京市委,王一知是老同志要全力抢救,市委传达总理指示到×××医院,这才……”

老人病愈,伊红和杨明去拜望

那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将军微笑着说:“我认识王一知同志呀!她可能不记得我了,20年代在广州我给张太雷做过小鬼……”

也许人们会以为这一段病中插曲,定会使垂危而得不到治疗的王一知为过去自求降级而感到遗憾……不!她从未有过一点儿遗憾!

建国初期,王一知以其对革命的奉献被定为行政八级,那是相当于副部长的级别啊!然而她的职务仅仅是中学校长,按有关条文规定:中学特级校长也只能是行政12级,她和周围工作同志的级别相差太远了!实在显得过于突出。没有经过多少考虑,王一知向组织提出了降级的要求。于是这个新中国第一位特级校长从50年代到90年代,就那么拿着行政12级的172元工资,没有长过一文钱。直到1990年调资,按政策查找解放后没有长过工资的人,王一知,这才长成了生命终止时的基本工资数——240元。

王一知对自己如此“苛刻”,而对他人——对待101中学的教职员,她却充满了宽厚和情爱。众所周知,王一知不搞极左,终生反对极左。

“三反”“五反”时“打老虎”,王一知在摸清了学校情况的基础上,得知“打老虎”打出来的天文数字,对当时分管这项工作的王冶同志说:“王冶,你这个算法不对头呀!要实事求是。怎么可能出来这么大的数字,这么大的老虎呀!”

1953年搞“肃反”。有个人汇报:“我一进屋看见他拿一张报纸急忙盖上了什么,隐隐约约好像是一把手枪!”

有手枪?不是特务是什么!于是那个他——一位叫崔立滨的男老师便遭到审查。左查查查查不出

结果,于是有人说:查不出来先吊着慢慢查吧。在那样“左”风盛吹的时代,这样的决定是司空见惯的。王一知听到这话,却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手枪,就不能捕风捉影。查不出来,就不能给人留个尾巴!”

雷天奕,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语文教师。在调来101中学以前,她在运动中曾受过点儿审查。调到101这所著名中学,在那强调“政治”的年代,她就自然被视为有问题的人了。有人给她贴大字报:“站在社会主义的讲台上,讲反社会主义的课……”

多沉重的铁帽!雷天奕真是有口难辩了!在这关键时刻,王一知做了这样的决定:她去听雷老师的课。听一堂两堂做决断难免轻率,王一知听了二十多堂课。听雷老师讲作文、讲古文、讲今文……王一知然后下结论:“雷天奕没有反社会主义。”

如此这般,在那样“左”风劲吹,人人自危的年代,王一知挺身保护了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这不能算做丰功伟绩,也表明了 she 具有一颗真正共产党人的正直、仁爱之心——人们称这个就叫“人道”。

1957年反右,101中学没“打出”一个右派。

……

## 长留红烛照人间

人生既漫长又短暂。

1991

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用超规格的篇幅报道了“杰出的教



育家、原北京101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一知同志，因病于11月23日在北京逝世……”的消息。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肃穆的灵堂里，全国政协、全国妇联、北京市委；李鹏、聂荣臻、李铁映、康克清、董小鹏、王光美……向这个在新华社通稿中仅仅被称为“教育家”的中学校长表示了深切哀悼。

王一知辞世后，仅仅被称做“教育家”，或许原因就在于她的“级别”；就在于她谢绝了行政八级……无独有偶，仅仅是“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局老干科”一个普通离休干部的王一知，在生命历程的最后，又遇到了“级别”问题——因为级别不够，这位年近九旬的中国共产党老党员，无权住进安静一点的单间病房，在她的心脏即将停止搏动的时刻，依旧是通过亲人种种努力，她才得以有个安静的归宿之地。

她终于安息了。灵堂、哀乐、花圈……

参加告别仪式的一大批50年代的孩子，而今已然风霜两鬓。他们之中有著名的专家学者，有担负党和政府部门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也有星花满肩的将军。

这都是王一知的学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教委主任，101中学1955年毕业生李铁映也为王一知校长的辞世而写来情词恳切的唁函，专致母校：“……30年含辛茹苦，殚精竭力，耕耘在校园，终至桃李芬芳，英才叠出。王一知校长，功不可没！……”

灵堂里洁白的花圈、挽联、诗篇都是对这位辞世的中共党员、教育家的肯切评价。

献身革命七十年，风雨雷霆俱等闲。

久把生死存度外，更将名利付云烟。

自求减俸垂先范，不就高官育后贤。

救国有功无索取，长留红烛照人间。

这首感人肺腑的诗作出自101中学政治教师、团总支书记路开老师的心扉。不是在这个肃穆的灵堂里，多年前，他就为老校长——“世间竟有这样美玉珍珠般的一块心灵净土，真是奇迹！”而流下过眼泪。那是一个炎热夏日的午后，他去看望老校长。老人手里捏着一柄小扇，银丝下满溢着汗珠。望着校长那生活环境，路开的眼眶湿润了，他想：“王一知的历史完全可以

放在有空调的房间展览了，何况她自己！”没有空调，闷热的居室里，伴随老人的只是那一柄小扇。路开知道，王一知那不多的几个钱用在了哪里：资助校办工厂、资助有困难师生员工了。学校有一对高龄老人，生活困难，她月月给老人们送钱去。待组织派人去了解老夫妇的困难时，老人的回答竟是这句话：“有啥困难？到月头儿我到王校长那儿开支！”

1950年入师大附中二部的学生曹连明这样说：“面对王校长那磊磊胸怀，你干得出坏事么？那时我们学校是清一色的男生。男孩子，没有不淘气的。可再淘，也没溜门撬锁打架抽烟的。受着老校长那样的言传身教，接受的只有纯真美好，干那号事儿，孩子们想也不想不到呀！……”

他哭了。他抽咽着说：“我是无神论者，现在却希望王校长九泉之下有知，我要她知道……知道我们对她的爱戴和思念……”

礼堂已然空寂，只留下圣洁的花圈和诗幅。花圈和诗章也必将从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消失。

她只存活在人们的心间。

（责任编辑 卢弘）

## 附件：

### 张太雷简介

张太雷（1898—1927），江苏常州人。1921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25年春调至广州工作。在候补中央委员、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湖北省委书记。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广东省委书记。同年12月11日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广州公社）代理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12日与国民党军作战中牺牲。



# 「开国第一假药案」庭审记

□罗先明

提起药品，人们自然会想到“救死扶伤”那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想到古代神农氏为解除民间疾苦冒险尝遍百草的动人传说，还有现代制药行业的先进设备，一丝不苟的消毒环境。看看流传多少代的满脸慈祥、银须飘飘的药王形象，你能不说他是至德至善的化身。

正因为这样，人们于1993年3月11日从报上得知，河南周口地区破获建国以来最大一起制造、销售假药案时，无不愤怒多于震惊。

周口安在？位于河南省东南之隅，与安徽阜阳接壤，乃老子故里，陈胜、吴广家乡。据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确证：早在五亿七千万年前至十九亿年前的震旦纪期内，中国境内还广为海水所浸淫，这儿就有了大片古陆。在这块素有“华夏先

驱、九州圣迹”称誉的古陆上，至今保留着规模宏大的太昊伏羲陵，古朴肃穆的始母女娲城。

也是在这一片土地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却出了件伤天害理、辱没先人的假药案。经执法部门历时数月艰苦细致的侦查工作，才于1993年9月6日上午8时30分将王志强、郭新灵、刘炜东等13名被告

一并押上了法庭。至9月9日凌晨2时，公正而严密的审理宣告结束，笼罩在“周口假药案”上的云山雾海悉尽散去，这伙丧尽天良的犯罪分子的丑恶嘴脸终于在庄严的国徽下暴露无遗。

## 制造假药的卑劣伎俩

1. 周口第一兽药厂原厂长王志强当庭供述：他从建厂一开始就生产假药。

“制假”主犯王志强被带上来了，男，现年37岁，体格壮健，不乏精明。在法警的押解下走进法庭时，一双狡黠的眼睛还不住地左右逡巡。履历表上载着：他在部队服役期间，因乱搞男女关系、超计划生育和经济问题被开除党籍，撤销副指导员职务，于1984年以战士身份复员，回原籍河南省周口地区沈丘县农业局当一般干部。1986年初，只有初中文化、不懂医药知识的王志强，忽觉得制售药品既能赚大钱，又可

“好风凭借力，重新上青云”，于是自筹一笔资金，占据县农业



局下属农场的数间瓦房，领着6个对制药配剂同样浑然无知的乡民，办起了既不象国营企业、也不是乡镇企业、还不完全象个体企业的制药厂，取大名曰：“沈丘县兽药厂”。

倘若就创业而言，王志強此举当大力推崇。君不见多少实业巨子，起步于草舍蓬壁。以王志強30岁出头之盛年，长于筹谋之心计，再认真吸取跌跤于军营之以往，循着正道勇猛奋进，焉能不立业图强，实现鸿鹄之志？

然而，王志強办厂伊始心眼就是歪的。请看他的当庭供述：

审判员问：你们首批制造了什么产品？

王志強答：土霉素。

问：有没有批准文号？

答：没有。冒充开封制药厂的产品。

问：有没有技术员？

答：没有。正式文凭的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的都没有。

问：第一批生产的假药销到哪儿去了？

答：主要销往安徽阜阳，后来被查获了。

问：谁让你这样干的？

答：我自己。后来农业局、农委都要我们厂。

问：为什么生产假药？

答：陈××说，质量高了卖不掉，只有搞假的。

一语泄露天机，这就是王志強的办厂宗旨，尽管羞答答故意假托他人之辞。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他就这样置天良于不顾。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几何公理也会被推翻。尽管他假冒开封制药厂生产的首批“批号”为（861017）的产品很快被安徽省阜阳地区行署药品检验所认定

为不合格产品，王却在黑色的潮流中越游越远。从最初的7人小厂到后来拥有300余名职工，从小打小闹到成批生产，从生产冒牌兽药到制作伪劣人药，从

1986年初露峥嵘到1992年下半年东窗事发，王志強的“实绩”之大，堪称创纪录之举。

2. 原副厂长郭新灵、生产科长李振、人保科长杨德泉的供词和工人们的揭发互相印证：该厂生产手段之奇，令人瞠目结舌。

庭审在继续。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法庭问及该厂的生产工艺情况时，身为一厂之长的王志強竟装聋作哑，极力抵赖：“说不上，我不管具体事”；“没安排过具体生产，好些事后来才听说。”

他心里怀着什么鬼胎？

无独有偶，当法庭审讯其他几名直接参与制、售假药的被告时，那几个也都推三阻四，诬称不知，只偶而从牙缝中漏出些许真情。

女副厂长郭新灵，系全厂上下公认为王志強的主要助手，和王志強的关系远非一般。一旦王志強外出，她就代行厂长职权。就是这么个尖牙利齿、思路清晰、具有高中文化的中年女性，当问及该厂的生产情况时，故意装傻说：“我只管财务，不懂生产。财务也是厂长一支笔。”又一再强调：“生产什么都不知道。”

审判员又问：你们厂一线工人知不知道生产工艺？

郭新灵想了想才回答：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审判员再问：厂里有没有原始生产记录？

郭答：冒充其他厂家的没有。

问：药品原料是怎么配法？

郭（迟疑片刻才答）：用本厂的商标就加，凡是冒充外厂的不加。

随后接受庭审的李振，是由县农业局任命的生产科长，后又由王志強聘为抓生产的副厂长。他于1987年4月进厂，曾去开封制药厂学习过有关技术，算是个小权威。当审问及生产情况时，他居然也佯作茫然无知状，回答道：我不清楚厂里生产环节。

或语无伦次地辩称：我只在比较忙时去传达生产任务，其余没参加生产。

审判员问：你是怎么传达生产任务的？

李半晌才答：通知1缸水加8斤药。

法纪苑

问：你们厂是否生产过合格产品？

答：这个我不清楚。

同是1987年进厂的人保科长杨德泉，最初回答法庭的讯问时更觉得委屈，竟说：我从来不知道厂里生产什么药。

审判员问：你去过车间吗？

杨立刻作答：没有，从来没去看过。

问：知不知道本厂生产过合格产品？

答：不知道。

问：知不知道你厂有合格设备？

答：不知道。

然而，当场得到质证的部分工人的证言，当庭揭穿了他们的无耻谎言。事实真相是，该

厂生产的所有假药，都是在王、郭、李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出笼的。而人事保卫科科长杨德泉不仅知道本厂“制假”内幕，还多次直接参与销售假药。

这伙人的手段太卑劣了，卑劣得连自己也不敢当众开口。

看，他们在“指导”工人制造土霉素了。用的何种原料？

大黄粉加色素是也。大黄搓不成团、压不成片怎么办？往里倒乳胶。什么人用药片里不能胡乱添加化工原料？他娘的只要能卖钱就行。

这些“红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等等是怎样制成的？将滑石粉、淀粉、苦料等等放进铁锅里来个大搅拌，眨眼工夫不就变成“货真价实”的消炎良药了！还有什么人用庆大霉素，在王志强等人眼里都只不过是白粉末而已。

这里在往细小的玻璃瓶里灌各种“杀菌”药水，那挂满蛛网的作坊还有个敲起来“梆梆”响的名字：针剂车间。那是通过哪种高精

工艺提取的仙台甘露；不怕你笑掉大牙，此乃正宗“老强牌”蒸馏水是也。造假？不往里灌自来水就算客气的了。你以为那么多矿泉水都是真的？这就是他们的“安乃近”、“氨基比林”等等专利产品，比起数万年前曾在这片古陆上活动过的神农氏来，不知高明多少？

脏兮兮的地面上摊晒的是啥？别动，都是能变成“哗哗”响的现钞的宝贝儿。那儿烧起一堆大火在烘烤个啥？小心，同样是能掏空人家钱包的鬼精灵。原来用这个粉那个粉胡乱捏合的“药片”得及时干燥，而购买烘干机却得往外掏钱。管你消毒不消毒，经济效益数第一，为了早早出手，当然要“土法上马”。

坐在被告席上的主犯王志强



够了，“制假”的闹剧就这样酷似童话。至于往大缸清水里倒进几滴买回的现成药液，或将购进的药片碾碎后掺进大量毫无药性的干粉重新捏制，已是慷慨之举了。这就是王志强等策划、组织、指挥“制假”的实况片段。现已查买的那安乃近、氨基比林等11种假劣兽用针剂，敌百虫、新诺明等7种假劣兽用片剂，和庆大霉素等5种人用假药，就是这样出笼的。至于人家买去能不能治病，是延误病情还是加重病情，那才管不着。当法庭宣读湖北有200多头种牛、安徽有数百只鸡在用该厂的假劣药品治疗无效致死的证言时，王志强尖着嗓

子申辩：“我的药是治不死牛的。”

3. 为了让制造假药的罪恶活动得以延续，直至永远，王志強制定了一整套瞒天过海、严于防范之术。

不就是一个非驴非马的小小兽药厂么？缘何有手持钢枪，身穿警服的“武警”站岗？君不见由武警战士站岗的部门，乃至至关重要的党政机关，或关乎安危的要害部位！原来王志強刻意拉大旗作虎皮，旨在阻止外人进厂，戳穿他的“西洋镜”。为此，王志強煞费苦心，和原沈丘县武警中队的负责人搭成荒唐协议：中队派4名战士为厂方执勤，厂方每年支付劳务费4600元，另给执勤战士每人每天补助2元。

这种出卖影子给魔鬼式的协议，该县武警中队几任负责人在未请示支队同意的情况下，竟然同意了。于是从1988年9月到1992年春节前后，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象征——武警站岗执勤制度，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移植”到一个制售假药的黑窝点门首。我们在为该县武警中队原来几任负责人丧失立场的做法痛心疾首之余，不能不为王志強的手段所折服。

光有“武警”执勤，王志強还觉得不妥。他惶惶乎贼心之虚，如临万仞绝壁。于是又另组建药厂保安队，配备各种械具，将厂区锁守得铁桶相似。大门口用横木挡道，行人车辆轻易不得进出。凡有欲进入厂区者，须得先经过武警的第一道岗哨，再经过保安队第二道岗哨，然后由保安队报告厂长，厂长恩准后方可入内。曾有好奇者买菜从厂门口经过，往里探了探脑袋，立刻被怀疑是企图“窃密”的奸细，拉进去挨了一顿毒打。类似周围村民挨打现象时有发生，彼此关系一触即发。在厂区内，各车间工人之间严禁串门，彼此不许打听生产情况。工人大都临时招聘，车间主任们也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生产者只能俯首贴耳干这干那，却不被告知制造的是啥玩艺。假冒商标印制者另居一处，灌装、包封、贴签又各有工序。厂内职工请假限时，外出登记，返厂消号。如有走漏消息者，轻而开除，重则编造莫须有的罪名严加迫害，有的还祸及亲朋。假药一旦

成品，立即转移至厂外秘密仓库存放，以防突遭不测。

王志強等不知道“制假”是犯罪行为？已有他们的当庭供述记录在案。就因为心中有鬼，才唯恐走漏风声。事实戳穿了王志強的谎言，他明明具有犯罪的故意。尽管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掉了几滴泪水，然“不慎其前而悔其后，虽悔无及矣。”

### 销售假药的拿手绝招

1. 群众举报和法庭调查证实，该厂销售假药的绝招之一是“低价抛售，条件优惠”。

1992年7月1日，一份标题为《揭发一个在县党政主要领导人支持下制售冒牌假药的地下工厂》的检举信，寄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检举信详细列举了王志強等人制造假药的种种伎俩，并揭发了他们的促销秘密。信中写道：

“假药销价一般低于国家牌价百分之三十左右，都是现金交易，不开票据，夜间伪装外运……”

法庭在9月6日下午出示了两份证言，指证者均系曾经购买过该厂假药的外省业务人员。其中一人证实：

周口第一兽药厂的业务员对我说，他们厂的药便宜，厂子大，有公安人员保护，外人不能随便进厂……等等。

另一购买者指证：我们都知道沈丘药厂的药便宜，而且条件优惠，可以送货上门……

便宜，便宜，多么诱人的词儿。在国人尚不曾普遍富裕的今天，便宜的东西当然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你看看那些卖处理物品的摊头，哪一处不是人头攒动。王志強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消费心理，来了个乘虚而入。他不是说过，质量高的卖不出去么？质高价亦高，比之他那无本万利的假冒产品，自不可同日而语。

2. 施行强买强卖之术，对发现上当而拖延付款的买主，武装劫持人质，实施非法拘禁。

1988年12月，太康县城郊乡兽药站发现

该厂发来的70件兽药包装不整，药品颜色混沌，即生疑窦，要求化验后再付款。王志强闻讯大为恼怒，当即换上自己在市面私购的警服，带上手枪，伙同郭新灵和两名在厂“执勤”的武警战士，连夜驱车赶到太康。当来到该兽药站站长梁某家门前时，已是凌晨4时。

“砰砰！”一阵急剧的敲门声。“谁呀？”“开门，不开门就踢！”房门只好在无可奈何中敞开。梁某其时还衣冠不整，睡眼惺忪。“请问你们是哪儿的？”“沈丘县公安局刑侦队的，跟我们走！”王志强恶眉倒竖，不由分说就把对方往车上拖，还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手铐给梁某紧紧地戴上了。

临时改制的囚车一路飞奔，将梁某连夜载到王志强制售假药的大本营。梁某立足未稳，先挨了一顿“下马威”。王志强以“刑侦队长”身份亲手打梁的耳光，并令他写出交款的保证。

却说梁的爱人眼睁睁见夫君被抓，只得四处求人担保。负责取保的两人来到兽药厂门口，却见门口果然有武警战士把守，不仅进去不得，反而自己有身陷虎牢之险，只有返回等款赎人。这儿梁某被非法关押一天一夜，且遭非法审讯。其后，王志强又通过当时的沈丘县公安局政委刘某某，将梁某安了一个罪名，投进县公安局拘留所。直到太康县城郊乡兽药站被迫交出购药款4924元、赔偿费1000元后，梁某才恢复人身自由。

据周口地区药检所检验后得出结论：卖给太康的这一批兽药（批文8881108）为不合格产品。王志强的“促销”措施，和剪径盗匪何异？

3. 一旦销售的假药露馅，立刻宣布销售者和兽药厂无关，以此确保“销假”渠道永远畅通无阻。

假药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东西，难免有个闪失。王志强于是开办之初便制订一条颇有远见的规矩：一旦外运被查扣，押车人必须独自承担一切责任，以示与本厂无关，工厂再以现金为出事人作补偿。

这一招还真见灵。

1991年3月，该厂副厂长陈进龙（现拒捕在逃）押运一车冒牌安乃近针剂，计划销往南阳某公司，被南阳工商局及时查扣，来了个



人赃俱获。假药是冒充开封兽药厂的牌号，销售者为堂堂副厂长，这一来岂不彻底露兜？王志强却有妙计在手，当下制造假文书一件，“啪”一声盖上“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的大印，怒火火令人保科长杨德泉偕同某检察员往南阳送去。文书上写的是啥？“陈进龙早于某年某月某日辞职离开本厂……”

好一个金蝉脱壳之计。

此计既然奏效，再用又有何妨。1992年元月27日夜，该厂另一副厂长李××押运假药一车销售时，在安徽省阜阳市露了底。此次车上装有冒牌广西钦州地区制药厂的假土霉素190多件，假冒四川射洪兽药厂假安乃近40件，价值数十万元。王志强先是想用行贿方式求对方开绿灯，因为这一车假药的损失太大了。然而行贿并非万能，对方不为所动。王志强故计重演，又捏造文书一封，派杨德泉再赴火线。文书造假比药品造假来得更易：李××不是本厂职工，早已除名云云。

法庭调查时，负责写假证明材料的杨德泉对此供认不讳，只是强调：

“是王志强让写的。”

审判员问：陈进龙的假辞职报告是谁写的？

杨德泉答：是我。

问：为什么这样写？

答：想证明人不是我们厂的人，药不是我们厂的药。

看看他们的“销假”技巧，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4. 为了骗取顾客信任，王志强将自制的假光荣匾挂满高堂，给企业和本人树立虚假形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市场面貌光怪陆离。有经验的业务员们为了防止把乌鸦当作孔雀，总细心考察企业的整体形象。于是各企业也着意修饰自己，或埋头创造名牌，或到处参评参赛。哪怕办公的房子再挤，也要辟出一间“光荣室”，将奖杯奖状镜匾锦旗挂得满堂生辉，让外方业务人员见了，如同吃下一颗硕大的定心丸。

可王志强的“制假销假”工厂缺少这个。

自己造，他娘的！连假药都造得出来，几块破光荣匾还造不出。不就是一块玻璃镜框里面塞进一张破纸，纸上胡乱写几个歪字，下面再盖个红球么？比起制造假药来，工艺简单多了。这玩艺儿虽然简单，对于促销工作却有妙不可言的益处。

“奇迹”就这样出现。多少年来，我们见到的是某些单位或个人如何虚报浮夸，骗取荣誉。而在王志强的兽药厂，连“骗”的过程都嫌麻烦，或“叮叮咚咚”使锤弄锯，或着人去街上拎几块现成的大匾，“啪”的一声就往墙

上挂去。

于是，一块冒充周口地区工商局颁发的一九九〇年度“重商标信誉 创优质产品”的大匾制造出来了。地区工商局正式颁发的光荣匾是50×66.5厘米，王志强认为那正式的玩艺儿太小气，不醒目，因而自造了一个50×98厘米的怪物，高挂在他的“光荣室”墙头。

另一块所谓“目标管理红旗单位”的匾额造得更为离奇。这一以周口地区行署名义颁发的光荣匾，只授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重大工作目标、廉政勤政目标、计划生育目标完成好的单位，即优秀县、区和地直行政部门，根本没颁发给任何企业。但王志强瞅准了“目标管理红旗单位”八个金字，和“周口地区行政公署”那叫得响的落款名称，便不惜张冠李戴，胡乱仿制不误。这块大匾的规格和真实的大匾规格虽同，里面的字体却相去甚远，时间也牛头不对马嘴。且行署正式颁发的光荣匾里嵌有一只小小石英钟，而王志强嫌购买石英钟破费（请记住，他从来主张无本大



原沈丘县委书记刘炜东在此案中以受贿罪被依法逮捕

利)，故将石英钟剔去，成了一件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是假冒伪劣的产品。而它对外来业务员却很有欺骗性，须知行署一级的匾额是很有份量的。各种“销假”合同便在这些冒牌光荣匾的光辉照耀下签订，滚滚财源把犯罪分子的腰包胀满。

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王志强还有将别人的奖状拿来，换上自己的大名，压在玻璃板下的惊人“创举”。这种行为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对王志强来说却只是小菜一碟。就是这么个“制假”奇才，纠集郭新灵等若干个死心塌地的中坚分子，驱使数百名时聚时散的乌合之众，把曾属光荣革命老区、系淮海战役重要“支前”基地的沈丘县变成假药制售的大本营，瞒骗威逼等十八般邪招齐上，得以将自制的假劣药品销往全国8省几十个县市，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其罪孽之大，古今罕见。面对法庭，王志强狡辩无力，不得不低头表示认罪服法：“希望企业厂长们以我为戒，不要搞歪门邪道，存侥幸心理。”

### 屡查不禁的玄机奥妙

#### 1. 一个处长和一份假调查报告。

就在王志强一伙制销假药闹得红红火火，不义之财滚滚而来时，一份《关于江苏省丰县和湖北省黄冈地区诉“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售假药的调查报告》，飞到河南省畜牧局，又经省畜牧局呈交农业部。此报告写于1990年6月26日，落款是“沈丘县人民政府调查组”，加盖了中间刻有国徽的“沈丘县人民政府”的大红印鉴。

宽敞、安静的法庭里，回响着审判员宣读该“调查报告”的声音：

关于江苏省丰县畜牧兽医所和湖北省黄冈地区兽药器械公司诉“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售假药一案，我们从5月13号开始到6月27号，在省地畜牧部门的直接指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大体情况已基本查清……

首先，我们于5月17号进驻药厂，进行内查……这个厂是《河南日报》公布的沈丘县9个特级企业之一，被县政府命名为“重合同守信用创优质名牌企业”……经过核查证实：既没有发现任何生产假药的迹象，也没有发现任何销售假药的证据，更没有发现江苏丰县提供的几种假药产品和原料。通过人事档案和工资底册查证，该厂确无尹忠林其人（笔者注：尹忠林系销售假药的具体操办者）。

……

根据上述调查情况，对这一“假药案”我们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从未发现该厂有假冒批准文号的庆大的原料、成品和包装材料，该厂从未制售过庆大和大安等假劣药品；

二、江苏丰县畜牧兽医所购进的一批假兽药……不是该厂生产。

三、湖北黄冈地区兽药器械公司购进的一批假兽药……没有理由认定是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售。

据此，我们感到这次假药事件，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经济上、声誉上都蒙受很大损失。我们建议省畜牧局……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范围内通过合适的方式给予恢复名誉，以正视听！

请读者原谅引文也许太长，但这次调查关于该兽药厂往后的生存。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假设一切都如同“调查报告”所述，或这份报告能写出事实真相的二分之一，即“周口假药安全”的最后结局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王志强的下场也决不会这样悲惨。

让我们再回到法庭。

“传被告人靳广义到庭”的话音刚落，一个矮矮胖胖、头发浅灰、颇具饱学之士风度的男子被解进法庭。审判员问过他的年龄之后，窃窃之议如细浪般漫过旁听席。57岁，几多可惜，这是抱孙子、外孙的年纪呀，何况是有高级职称的科技干部。

审判长问：你和王志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靳广义答：1987年底。王志強去省里申报兽药厂批准文号时相识。

问：1990年4月26日，是你代表省畜牧局去沈丘县调查假药问题吗？

答：是。我当时带去国家农业部转来的黄岗地区揭发材料，还有一张在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购货的发票复印件。发票是一个名叫张×的人写的，上面有她的签字。

问：你去兽药厂见到假药了吗？

答：有。他们车间有“敌百虫”片剂，没有批准文号，按规定应列为假药。

问：你对发现的假药做了怎样的处理？

答：我当时对王志強说，这样不行。以后在饭桌上又对副县长崔东华和县农委副主任赵海滨讲了。

问：你们是怎样查处湖北黄岗所反映的假药情况的？

答：4月29日，我又开车到兽药厂去了一趟，带去了那张发票……

事情就出在靳广义重返之行。

4月26日与靳广义同行的共有6人，靳以省畜牧局医药处处长身份带队。当时的收获除现场发现假药“敌百虫”外，还提取了一张有张×字迹的发票，经初步比对，与湖北黄岗提供的发票复印件字体类同。这就是说，“周口假药案”有可能彻底穿包！

3天后的星期日上午，靳广义背着省地畜牧局联合调查组其他成员，偷偷摸摸弄了一辆小车，颠簸数百华里，如饿鼠觅食般一头直冲进王志強自制销售假药的老窝。

50好几的人了，6天之后才有一个星期日，在家听听音乐、看看电视节目也行啊。靳广义此举何意？据他本人辩称：主要想核对应实（即那张发票）。

咱们且信了他罢。

“靳处长！”王志強对靳的从天而降不免心惊肉跳。按国家规定，制造假药是可以吊销生产执照、追究刑事责任的。

靳广义果有动作，大大咧咧往沙发上一坐，板着面孔说了通假药危害，并不曾漏掉对

责任人将严厉惩处的意思，把王志強唬得诚惶诚恐，贼心跳上了嗓子眼，一个劲递烟敬茶，“嘻嘻嘻”媚笑一串。

“我们调查组内部有的同志基本认定，这张发票和湖北黄岗的发票是同一个人的手笔。”“轰！”靳广义真够残酷的，扔下又一颗重磅炸弹。

“靳处长——”只差没喊他“万岁爷”了。多少荣耻财货，全系于“靳大人”一身。

一场虚惊，靳广义其实是为着“解王志強于倒悬”而来。他口袋里揣着那张3天前从这儿提取的发票真迹，示意王志強把它换掉。如果两张发票的笔迹对不上号，不就可以抵赖了！

王志強是何等聪明之人，见靳广义刚掏出发票，立刻要了过来，转手交给旁边的郭新灵说：“换掉。赶紧给靳处长另开一张。”

几分钟工夫，偷梁换柱的工程便宣告完毕。郭新灵带着中年女性的媚笑将另请人重写的发票递到靳手里，顺便将原来提取的那一张撕得稀碎，道：“要这干啥？你说哩，靳处长。”

靳广义连连称是，接过那一不再保留张×笔迹的伪造的发票，郑重地夹进公文包里，信心百倍地说：“有了这个，官司打到哪儿咱也准赢！”

几天之后，靳广义应农业部之约，代表河南方面上北京和湖北黄岗及江苏丰县的同志当场质对时，不仅矢口否认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有“制假售假”行为，反而说湖北黄岗地区提供了假情报。他掏出那张重开的发票，请国家农业部的同志用以和黄岗提供的发票比对，以此说明：黄岗提供的发票是伪造的。

大棒就这样反弹过去，受害人反有了“假冒罪”。以后，当沈丘县政府把那份假调查报告呈上时，明知制售假药内幕，却不惜牺牲星期日休息时间，甘为王志強效犬马之劳的靳广义，立即将此件上报，从而使这次惊动了国家农业部和鄂、皖、豫三省的查处假药工作，不仅轻而易举告吹，反而为王志強壮了贼胆，多了“资本”。他从此有机会便吹：中央和省里



都查过我们的事，狗屁也没查出，你说咱们厂的工作还不过硬？

主管全省兽药生产、销售工作的业务处长靳广义，在“周口假药案”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2. 从“6·26”假调查报告的出笼，看沈丘县原农委副主任赵海滨的“丰功伟绩”。

原县农委副主任赵海滨刚在被告席上坐下，就为自己鸣冤叫屈，同时不忘评功摆好：“（起诉书指控犯包庇罪）不是事实。”

审判员问：你1990年5月3日代表县里去北京农业部汇过报吗？

赵海滨答：我本来不想去，因为不了解情况。是崔东华县长安排我去，所以才去。

问：你上北京坐谁的车？

答：王志强让我坐他们车。

问：从北京回来后你作过调查吗？

答：我向崔县长汇报后，崔县长让组织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畜牧、农业局的人联合调查。正是三夏大忙季节，打电话找了几个单位，找不到人……

问：调查报告最后是你写的吗？

答：是我写的。

问：你写调查报告的依据是什么？

答：有的是王志强提供的，有的是我调查的。

问：为什么让王志强参加？

答：我对王志强非常信任。

问：你们在调查报告中说：发票上张×的签字经过公安局鉴定，不是本人字迹。你到底鉴定没鉴定？

答：我让王志强去鉴定。王志强回来对我说，是复印件，没法鉴定。报告上就那样写了，写完后忘记改了。

问：你知不知道周口第一兽药厂制造销售假药？

答：以前不知道，中央工作组来了后才知道（指1992年9月由中央监察部等单位组成的中央工作组——笔者注）。全世界都知道了，我怎么不知道？

问：你写调查报告时，和王志强商量过么？

答：从来没有商量过。

在县级机关工作多年、已届56岁的赵海滨当庭撒谎，尽管他在为自己辩解时是那样慷慨激昂，几次忘记了自己的被告人身份，忍不住打起手势来。以至于审判长不得不严肃提示：“你的手不要动。”

湖北黄冈的同志在买得该厂出品的假药，使用时导致200多头种牛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万元后，曾派人来厂交涉。不料还没进门，则遭该厂保安人员痛打。无奈，他们只好诉诸北京。刚好江苏丰县也状告周口，于是农业部决定并案解决。靳广义带着重托在该厂表演了一番，其掩盖真相的用心与主管兽药厂工作的赵海滨不谋而合，一场闹剧就此推上高潮。

当赵海滨在宴请靳广义的餐桌上听说，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生产假药时，他不以为然地只顾埋头喝酒，权当耳背。用他后来在北京对农业部同志的话说：改革开放之后，伪劣产品多了，全国除了西藏、台湾，大部分省区都状告我县，管得过来吗？以后，副县长崔东华派他代表县政府向北京汇报，他干脆不避忌讳，携同家属一屁股坐进“假药案”被告人王志强的小车里，不但随车同时进京，还住在同一个旅馆：团中央招待所。

在农业部有关人主持的汇报会上，赵海滨亮开嗓门，打着手势，满怀激愤地控诉了一番，概括起来一个意思：有人故意和沈丘县人民过不去。由于他和靳广义一唱一和，致使汇报会毫无结果。

回到县里，赵海滨遵嘱写调查报告。怀着得胜回朝心态的赵海滨，哪把农业部要求如实查处的意见放在眼里，与王志强磋商之后，即要王去分头找来几份所谓证明材料，又令该厂的杨德泉先写“调查报告”初稿，一稿不成，再写二稿，最后才由他亲笔改定。其时，有一个情节曾使他颇费脑筋：

江苏丰县的揭发材料说得确凿：假药是从尹忠林之手买来的，而尹忠林实有其人，该厂

的职工花名册上明白载着。就算马上将尹打入另册，假药来源如何自圆其说？

“查，一个一个往下追。”赵海滨俨然包公再世，似乎要重演一场陈桥铡国舅的好戏了。

“追！没错。”王志强立即心领神会。几个臭皮囊凑在一起，立时便有了一条奇妙的锁链：尹忠林（写材料时已把他合法地“开除”出厂，注销厂籍）的假药源自朱××，朱××的假药源自吴××；吴××的假药源自孙××。而这个孙××，赵海滨已从报上获知他的名字和“事迹”：离家10年有余，一直来去无踪，谁也不知其下落。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年茫茫皆不见。”让你们找孙××去。

至此，由赵海滨亲手制作的“调查报告”便变得“功德圆满”，无懈可击。

不应忘记赵海滨在法庭上的多次自我辩解，除一口咬定“中央工作组来了之后才知道生产假药”的辩言外，还振振有辞地宣称：

“我不懂生产，没见过药品化验结果。我不知道他们生产假药，因为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他们制造假药。我不是‘明知’（他们生产假药）。如果‘明知’，为什么还要王志强去核实？”

这就是号称有39年党龄的赵海滨这个“老布尔什维克”的辩白。且不说这座谎言堆砌的山头一触即崩，就如他本人所说，是在1992年9月以后才知道该兽药厂制造假药，那么你在这以前干什么去了？该厂直属你管，王志强等人在你的眼皮底下犯罪，你就可以将屁股擦得那么干净？

愿一切责任者以赵海滨为戒。

3. 主管副县长崔东华出语惊人：调查报告我没有看，也看不懂。

胖胖的崔东华前额有点秃，回答法庭的审讯时也有些秃头秃脑。那份盖着县政府大印的调查报告，是由他最后签发的。他在形容当时的情形时，显得特别激动，大有蒙受千载沉冤之慨：

当赵海滨把报告拿给我看时，我正要出

门。6月初，大忙，三夏时节，收、种、打。我问赵海滨的调查结果。他说，从情况看认定不了，也否定不了。因为牵涉两省，无法调查，找人找不到。我说，等省里来人，省里不来，等地区来人，地区不来，那就把材料报上去，由上面看着办吧。

审判员问：你看过调查材料吗？

崔东华答：材料（指调查报告）没看，内容不知道。

问：你过问过调查情况吗？

答：没有过问过。

问：盖县政府的章是你同意的吗？

答：（这时显得有点急了）是我同意的。我当时那样忙，没时间看……再说，我就是看了，也看不出问题……

已经听不清他辩解些什么了，县政府大红印鉴落在纸上的声音淹没了一切。

崔东华极力想抓住一根稻草，所以才推说上面没来人。靳广义固然有他的帐，但当时在农业部汇报会后形成的意见是：责成县里具体查处。

崔东华同样忘了自己已是阶下囚徒，拿出往昔在台上做报告的架式，手舞足蹈地继续强辩。

——“假药案”我有一定责任，说玩忽职守接受不了，不公平。我抓好农业，大家有饭吃，就不是失职。我承担官僚主义。

——“假药案”省、地不来人，他们不管，我也可以不管。但我让赵海滨去查，又让公、检、工商几家共同协商，我这是负责任的。如不负责任，让畜牧部门胡弄，完全可以胡弄。

——以后我没具体过问，是事实。材料没看，是事实。即使看，他们编造得天衣无缝，我也看不出问题……

不必再浪费读者时间了，相信崔东华一副怎样的嘴脸已深入人心。他之所以愿意承担官僚主义而不肯认同包庇罪，是因为在“官僚主义”的软性盾牌下，曾开脱了多少为害甚烈的达官贵人，他崔某何不援引一二，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为啥对他“偏心”？值得补充的是，当

法庭问起崔东华何时知道王志强制售假药一事时，这位县太爷居然也摆出一副天真烂漫之态。一本正经答曰：“（中央）工作组来了之后。”

4. 群众对“周口假药案”其实举报多次，各级近10次调查却都未果。

如果把1990年5月的农业部调查汇报会看作一个波峰，即在这波峰前后，还真有几朵不大不小的浪花。

早在1988年11月8日沈丘县政府就接到县卫生局的正式报告：王志强生产假药，建议予以惩处：1. 对该厂罚款2万元，没收全部假药“硫酸庆大霉素”；2. 对直接责任者王志强罚款1千元，并予以行政处分；3. 该厂停业整顿。

卫生局的报告是空穴来风？不，他们在先后多次接到卫生部、省卫生厅、省公安厅批转的群众举报信后，组织力量调查，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敢大着胆子摸老虎屁股。其时王志强已相当红火，该厂已于一年前以县政府名义打了报告，得到地区畜牧局批准，准许“沈丘县兽药厂”更名为“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一个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屁大的厂子，不仅打起了地区的旗帜，还抢了个“第一”的尊号，其间费去多少辛劳，怎不为县里某些头儿宠爱。县卫生局见递上去的报告

不见回音，即于同年11月21日正式向县里四大班子详细汇报。这回答复有了，县长王明春阴沉着脸说：“新企业刚创办，不容易！”

大家哑然。第一朵浪花就此覆灭。也许这位“父母官”真是一心为企业的发展着想，但他忘了：保护的是一株罂粟还是一棵玫瑰？对着意扶植罂粟者该如何理论？

1990年6月，原沈丘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打假办”主任高修慈亲手接到某教师举报信一封：“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长期生产销售假药”，并提出重要线索：安徽阜阳××药店现仍有该厂生产的假药“安乃近”。高身负“打假”重任，不能不做做样子。他先派人去阜阳调查，发现药品转移。第二次高本人再去，中断的线索自然续接不上。他甩下一条尾巴：要求阜阳方面派人来沈丘反映情况。过了一段时间，不见对方有新的动作（其时王志强已把销售目标暂时转换，阜阳方面不可能及时找到直接证据，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哥德巴赫猜想”），高借机回答又一届县长张鲁舜的查询说：对方没来人。轮到张鲁舜县长皱眉头了，想了想答道：“没有来人就算了。”这话正中高某这“打假办”主任下怀，自此不了了之。

应该说县长张鲁舜对于这次举报，开始的态度是积极的，高也似乎在忙上忙下。但果要真抓，兽药厂就在你们的地界内，何必舍近而求远，缘木而求鱼？个中奥妙，唯当事人能解。

1991年9月25日，又一份批示件转到沈丘县主要头头手里，县委书记刘炜东见上级的批示写得明确：“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经销假氯霉素片问题，立即派人查处。”自知不便推却，于是安排某副县长负责此事。某副县长召集一个会议部署了调查方案，具体责成高修慈承办。高修慈已有上回“打假”之成功经验，顺手又推给王××。王××组织一帮人“大张旗鼓”地又是搜查又是验票，着实累得可以。唯有请王志强、郭新灵作东，在豫东饭店吃一顿，才得以恢复精力。不待食化酒醒，结论早就得出。至于那份一级一级递上去的“调查报



告”里编派了什么，你就别去打听了。

顺便补充一笔，原沈丘县委书记刘炜东于1993年9月6日，也被押上了审判台，罪名是收受贿赂1.4万元。当法庭问他何时知道王志强制售假药时，油光满面的他，回答竟然和崔、赵如出一辙：“中央工作组来了之后。”还赌咒发誓道，“如果有人证明我在这之前知道他们制造销售假药的情况，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处罚。”

够了。就是这样一班老爷们，龙踞虎盘在沈丘县的各个要害部位。靠这种假话说尽的老爷们去“打假”，能不能与虎谋皮？

制售假药主犯之一的郭新灵，在法庭辩论阶段说：“我们敢胆大妄为生产假药，靠什么？靠披着干部外衣的人包庇支持。”剔除这话中为自己开脱的部分，还真够发人深省的。

### 假药案后面的受贿罪

先看看处长大人靳广义。

自诩一心为公的靳广义星期日缘何私下兽药厂？原来他在这之前，已先后4次得到过王志强的“好处费”1000元。现在王志强大难临头，他岂有不搭救之理？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安知志强一旦出事，不会牵扯到自己头上？这，才是靳大人不惜赤膊上阵以假救假的真谛。志强方面也毫不含糊，对靳广义上京汇报的食宿全包，事后又分两次赏给靳广义跑腿费1000元。靳大人2000元“好处费”到手，“假药案”轻轻掩过。上哪儿洽谈这等公平买卖？

往下，就只需开列刘炜东一干人等的受贿名册了。据新华社1993年9月13日通稿载：

刘炜东，先后两次接收志强贿赂1.4万元，且利用职权为其妻兄在兽药厂谋取私利数万元；

崔东华，先后两次受志强馈赠1万元，还因为爱看武打片，接收志强的录相机1台；

赵海滨，索要志强录相机1台，价值

2500元；

卢成云，县农业局局长，向志强索取贿赂5000元；

高慈修，接受志强现金2000元，水泥10吨。

……

他们都可以来而无往么？不，“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乃古今之通义。靳广义等还真算个“正人君子”，为防志强的罪行败露卖够了力气。刘炜东、崔东华、赵海滨等人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还报给志强又一大堆硕果：什么县“农业先进工作者”、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县“先进企业”等等。请读者注意，这些可不是志强假造的，均系县里有关部门双手奉送。还有那正儿八经列入县直领导干部名册的“沈丘县农业局副局长”的封号，都并非出自造假能人志强本人之手。

或许某些当事人又表示不服：志强所以被提拔为副局长，是因为他私自篡改档案，没错，现年37岁的制假高手志强，在部队服役期间因经济问题、不正当男女关系和超计划生育被开除党籍，撤销副指导员职务，以战士身份复员。对此耿耿于怀的志强，一直图谋东山再起。1990年初，他再度发挥“制假”之特长，私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师党委”公章一枚，假书：王所受处分拟改为留党察看而非开除，请地方予以办理云云。这事，志强本人固然罪该当罚，但是，那陆军第××师并非子虚乌有，一个电话即可联系上。王在复员6年之后自己交来这么一张废纸，你们就奉若神明，把它作为恢复其党籍、承认其干部身份的根本依据。假使另换一人，你们会这样做吗？提拔一名局级干部必须经县委常委讨论通过，刘炜东们对志强强制售假药的罪恶行径个个是瞎子聋子？志强被任命为副局长的时间是1992年5月，离罪行彻底败露不过3月有余。

没有志强的假药案就没有刘炜东、崔东华等今天的受贿罪；没有刘炜东等的受贿罪也就不会有志强今天如此规模的假药案。他们

就这样相依相生，成为两个长在同一条藤上的毒瓜。过去说“打假”的主要阻力是地方保护主义，不对了。在“地方保护主义”后面往往还暗藏着另一只黑手：行贿受贿罪。那些人在竭力维护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别把他们想得太好了。

### 濒临覆灭的最后挣扎

1992年10月，晴天炸响霹雳：中央工作组将进驻沈丘，专查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的问题。

先不表中央工作组到来的背景，且看听到这惊人消息后，赵海滨、王志强一伙是何种表现。

审判员问：你们原来的帐本哪儿去了？

王志强答：烧了。

问：什么时间？

答：工作组进厂之前。

问：烧帐本是谁决定的？

答：崔东华、赵海滨都知道这个事。

王志强的话是否可靠？且看赵海滨在法庭上的交代。

审判员问：你知道烧帐本的事吗？

赵海滨答：知道，是王志强对我说的。当时工作组问崔东华，崔东华说帐本找不到。这时王志强对我说，帐本已经烧掉了，是三个人在三个地方烧的。第二天，中央工作组叫我去，我告诉工作组：王志强说帐本烧了。

问：工作组后来怎么说？

答：工作组让写个材料，我就让王志强找几个人写证言。王志强把写的材料拿来，但见时间不对头，有的写成中午烧的，有的写成晚上烧的，我就又让他们改。统一时间，烧的地点，为什么烧，写了一张，交给了工作组。

问：交给工作组的证言是按实际情况写的吗？

答：不知道。

问：写材料之前，你们商量过吗？

答：没有，绝对没有。

接着，法庭宣读了几份证言，实际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也没烧过帐本，全都背了黑锅。而写的材料却确实经过赵海滨修改，改后还被退回重抄一遍。

这伙人作贼心虚，谁也不敢面对事实真相。

综述法庭调查表明：当得知中央工作组即将到来，赵海滨经请示崔东华后即来到该厂，和王志强、郭新灵等商量对策。据他们分析，工作组来后，无非是内查外调，查财务帐本，查产、销情况，查漏税情况，查开支是否合理等等。为了不让工作组发现秘密，于是一致决定：将帐本烧了。

这儿有一点巧合。1992年8月31日，该厂因长期与当地群众对立，而当地群众则早就恨透了他们生产假冒伪劣药品，于是双方发生冲突，该厂的部分围墙被推倒，一些物品被拿走。王志强借此声称：所有的帐本也都被附近群众抢走了，烧了。

堂堂县农委副主任赵海滨竟也信了这话。

王志强、郭新灵无疑是烧帐本的主谋，是他们害怕罪行败露，故而将一切存据帐簿一烧了之。事后编造谎言，欺蒙上级。他们尽管极力想把一切都推到赵海滨头上，但终究徒劳。事实已经证明，为他们写假证言的三人，谁也没见过帐本是啥模样，故而都写得牛头不对马嘴，只好返工重抄。

但是赵海滨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你对王志强就那样轻信？如果心里没有鬼，你为何安排了个写“证言”者统一口径？你倘若真想把烧帐本的真相弄清，为什么不站在中央工作组方面，通过假证言找破绽、查真相？相反却背着中央工作组私下搞小动作！一切表现证明，你和王志强、郭新灵等人，完全沆瀣一气，竭尽瞒骗之能事。

由于帐本被烧，致使后来的查处工作遇到极大阻力。到底王志强一伙制售了多少假药，永远是一个谜，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确说不清。

王志强、郭新灵等人的垂死挣扎还不止这

些。

一个满脸胡茬的中年汉子被押进法庭了，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没太多心机的农民。他叫李海龙，小学文化，系制售假药的女厂长郭新灵的丈夫，和郭新灵那尖齿利舌的样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审判员问：起诉书指控你犯了窝赃罪，是不是事实？

李海龙答：是事实。共藏了10来张存单，合计199万元。

问：是谁给你的？

答：是郭新灵。她说是公家的，搞建设的，是放在家里，待她回来后再交给她。

问：你知道为啥收审郭新灵？

答：她作假药。

问：后来你把钱交给谁了？

答：给了朱一芝。我说，钱太多，放在我这儿我害怕，搜查出来是个事。

问：朱一芝怎么说？

答：她说，我不要。我说，你不要我就交上去。后来她也就收下了。

问：中央工作组后头找你了么？

答：找过。和我谈话，要我交钱，我说没拿。

不要再往下引述他的供词了。读者已经知道他的悲剧之所在。是谁害了他？当然首先是他的妻子，然后是他自己。他看来是悔罪了，大把大把泪水流个不住，几乎伴随着他整个受审过程。当说到家里的两个孩子因父母双双收审而过着流浪生活时，这个犯有窝赃罪的被告几乎泣不成声。

王志强的老婆朱一芝的情况，或许比李海龙更可悲。

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村妇女，头发稍嫌蓬松，几乎直不起腰。当问起她是否知道王志强生产假药时，她很快地说：“他从没对我说厂里的事”。

她在某种意义上确是个法盲。当问及她是怎样从李海龙那儿把钱拿来的，两人的说法不尽一致，她竟然不顾法官的警告和法庭纪律，

和李海龙你一句我一句吵起来：“是你是你是你。”那情形和在村里吵架没有两样。

显然，她也是被自己的亲人所害，尽管王志强曾亲口布置她转移和窝藏赃款。

请听听朱一芝在法庭上互不连贯的最后陈述：

原来不懂法。接受教育，再也不犯法了。孩子没处吃饭，也不上学（哭）……不说了，说完了……

或许是不应出现的现象，朱一芝的最后陈述，引起旁听席上一阵唏嘘。

把赃款转移窝藏，还不是王志强一伙的最后动作。看，又一个被告被带上法庭了。

此人叫王学昆，现年61岁，下巴上挂着一片银白色的山羊须，曾任区武装部部长，管过政法工作，中共党员。此人是谁？乃王志强的父亲。何罪之有？窝藏！

就是这个王学昆，当公安人员决定收审该厂副厂长陈进龙，以便突破假药案真相时，当即拿去300元现金，跑到陈家，要陈逃跑。由于陈进龙的逃跑，确使得假药案久攻不破，陈本人也逃脱了法律应有的制裁。王学昆平时和王志强没住在一起，从哪儿知道公安局要缉捕他的内情？自然不言而喻。王志强的算盘拨拉得天真：陈是主管销售的，让他跑了，然后将诸事往陈进龙身上一推，其“金蝉脱壳”之术，不就应验了！王志强为了掩盖罪行，不惜把老父亲也赔上了。

王志强的应变手段中，还有一项叫“坚壁清野”。他在工厂附近掘了一个离地4尺的大坑，长7米，宽5米，将生产出来不及销售的假冒伪劣药品用尼龙编织袋装着，统统埋入。又在另一个坑里埋进已经印刷好的假冒商标，用土掩没，做上暗号，局外人却看不出半点痕迹。

王志强此举何意？除了想匆匆掩盖其所犯罪行外，还存有一大侥幸。这个假药高手也算是见过世面了，一次次都能安然无恙，多少人都能被拉下水，未必这回就真的大难临头？他才舍不得把那些假药、假商标彻底销毁呢，虽

然说投入的成本不多，精力却有。哪一天风头既过，挖出来不是能赚钱么。

结果却是，王志強这回彻底失算。

### 岂容黑伞长遮天

对王志強一伙令人发指的罪行永远就莫之奈何？

1992年7月1日，一封题为《揭发一个在县委党政主要领导人支持下制售冒牌假药的地下工厂》的检举信件。飞越千山万水，从周口径邮北京。该信密密麻麻，长达6000余言，通篇都是事例，句句充满愤怒。选择这一天投寄，无疑有深沉的寓意。信尾是一长串署名，如同一群百姓翘首期盼。

1992年8月3日，一件编号为“中办国办信(92)豫字257号”的公文，直接发送时为河南省省长、现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同志。文中除附送检举信原件外，还有一长段凝重的文字，文尾郑重嘱托：“请阅批。”

1992年8月16日，该文件到达李长春之手。以省长公务之繁多，无疑是第一次接触此案。李长春将检举信看过之后，挥笔就写：

“明义：①对制售假药者，坚决查处。②注意保护举报人。③结果报我。也请省技术监督局配合地区办。”

8月24日，省长批示旅行到中共周口地委书记王明义手中。

批示件在王明义手里如同一团烈火。颇为遗憾，在这之前，本地区还没有谁正式向他反映此事。他深深地自责着，当即确定一名副专员具体负责查处，本人自此始终亲自督办。据称，为此专门召开的地委各种会议计40余次。

为了加大打击力度，1992年9月15日，由国家监察部、国家工商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共同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进驻沈丘。

“朝廷真的派老包下来了！”——一时群情激动，议论沸沸扬扬。

公正地说，周口地委、行署在“打假”方面的态度是应予肯定的。各级批示下来前的3

月2日，在专员向玺主持下，由地区工商局等单位组成的4人调查组根据群众举报，代表行署赴沈丘调查。其时该兽药厂副厂长李××销售假药时在安徽阜阳被扣，随即被举报到周口地区工商局，专员向玺即根据这次举报的线索决定查处。然而当工作组前往沈丘县政府通报情况时，负责接待的赵海滨却大白天说鬼话：“我昨天还见到李××呢，李××怎可能去安徽卖假药？”他这一挡驾，查处工作便无法进行，调查组只好于当日返回。

3月18日，行署调查组增至9人，再赴沈丘，且和王志強正式交火。王志強是那样凶狠，不准调查组进入车间，并且狂吠：“我们只受畜牧局领导，你们没资格查处。要来也得先打招呼。”而当调查组第二次进厂时，车间却打扫得干干净净，连晒过药片的布单也已经洗过。9人调查组穷忙数月，总算认定他们有销售假药的犯罪活动，而对于“制假”方面仍无进展。有什么办法？调查组和县里赵海滨等人联合办案，他们的每一步骤，王志強都了如指掌。在这片为淮海战役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土地上，查处一起假药案件，竟有这般艰难。可伶得很，中央工作组进驻沈丘后，以王志強为中心构筑的明碉暗堡遂即被摧毁。10月25日，政权机关对“制假”主犯王志強、郭新灵采取专政措施，其他和假药案有关的犯罪分子亦相继落网。那一箱箱从地底下掘出的假药成品和各种制假原料，既是其罪恶的见证，也是其心虚的标志。由此笔者想到，一旦真正对假药伪劣者施以重拳，有什么顽固堡垒不能夷平？假若各地“打假”都得仰赖“钦差大臣”，那“钦差大臣”岂不要满天乱飞？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同样，在王志強一伙遭到法律严惩的同时，为他们提供黑保护伞的新广义之流，谁也逃脱不了法律的追究。所谓保护伞者，不过是纸糊的玩艺，休道牢不可破，只看你下的是毛毛雨，还是在刮劲风。

“周口假药案”休矣，“假药案”教训深矣！

# 第一个拥抱奥斯卡金像 的炎黄子孙

□爱真

1 912年明朗的一天，在洛杉矶的一个公园里，美国拉斯基影片公司正在拍摄一部电影。在旁观的人群中，有一个面部平平、鼻子宽宽、嘴唇厚厚、眼睛明亮、小个子的中国男孩，他叫黄宗霏。他好奇地观看着这拍摄电影的场景，久久不肯离开，一直到天快黑摄制组离去后，他才走开。一连几天，他的脑子里一直萦绕着的都是拍摄电影的场景，特别是那架摄影机，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对摄影痴迷若醉，几年间，收集了大量的废旧瓶子，从一家药店换回了一台盒式照相机，一直摸索着摄影的技术。那天在公园里看到拍摄电影后不久，一位朋友告诉他，拉斯基公司正在招工，黄宗霏决定去碰碰运气。可是拉斯基公司的守门人看了看这位小个子的中国人的样子，怎么也不让他进去。于是，他只好绕过正门，瞅准空子钻过高高的摄影场篱笆，亲自找到了摄影部的头头，一再缠磨，终于谋得了一个打扫摄影棚的职位。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钻”，使他开始与电影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他一生拍摄了125部影片，曾10次被提名竞选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候选人；其中有两次获得此项摄

影金像奖——《玫瑰梦》(1955年)和《赫德》(1963年)。此外，在他拍摄的影片中，还有脍炙人口、众声称誉的《北极星》、《自由万岁》、《灵与肉》、《老人与海》等优秀影片，在外国、在中国都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誉为好莱坞八大摄影师之一，是美国权威性学术团体“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成员。

黄宗霏是从社会底层一步步登上电影摄影艺术的巅峰的。

1904年，他的父亲黄浩丢下了妻子，带着5岁的黄宗霏离开故乡广东，在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小镇上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不仅饱受继母的无情打骂，而且深深地感受到美国种族歧视的冷酷无情。在这座小镇上，很少有中国人，他一上街，白人孩子就经常揪住他脑后的辫子戏弄，他疼得啊啊直叫，而白人孩子却因此而哈哈大笑，一怒之下，他咬掉了辫子，但黄皮肤是无法改变的，为了对付这些孩子的侮辱，他开始练习拳击，小个子的身体练得十分结实。可是在学校里，白人孩子照样喊他“中国仔”，一位老师，甚至因不愿给这位黄皮肤的孩子上课而辞了职。

年轻的黄宗霏，自从进了拉斯基电影公司后，他心中一直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摄影

师。他干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清理工。由于他的温厚、严谨、勤奋、刻苦，接着被推荐当了摄影助理，任务是搬运机械设备，拿拿镜头号牌，时时为摄影师出一点小小的主意。有一次，片场要拍一个金丝雀啼唱的镜头，试尽了各种手法，金丝雀就是不听指挥，怎么也不肯唱，把大家急得直冒汗。黄宗霏在一边突然灵机一动，把一片口香糖塞进金丝雀的嘴里，金丝雀转动着嘴，想要把糖吐出来，于是拍下了这默片镜头，就象是它在歌唱。黄宗霏的这一招，立刻引起了周围人们对他的刮目相看。

在这以后不久，这家公司要开拍一部战争片，其中有一个镜头表现德国鱼雷艇发射鱼雷，击沉一艘美国商船。导演要求在海面水平线拍，使画面上能看到鱼雷射出，一直冲到商船边爆炸，商船徐徐下沉。要取这样的角度，就要把摄影师和摄像机绑在鱼雷艇的发射管上，然后让鱼雷艇下沉，只留下摄影师和摄影机在平面上。可是，这太冒险了，美国摄影师拒绝这样做。小个子黄宗霏站出来表示愿意承担这桩任务。黄宗霏拍下了这个镜头。当人们看到样片后，都啧啧称赞。由于黄宗霏屡次出人意料的表现，被升为第二助理摄影师，



从此，他才有资格操纵摄影机。

但他的转折点，也是第一次令人惊异不已的绝技是发生在1922年。一天，他为20年代的美国大明星玛丽·迈尔斯·明特拍了一张照片。不料，第二天他被片场主叫了去，他以为闯了祸，可能被炒鱿鱼。谁知，那张小照明特小姐爱不释手。原来，明特小姐虽是20年代的大明星，可是她眼神往往受那双蓝眼珠子的限制，这在黑白片上总是美中不足，也是黄宗霭竟然把明特小姐的淡蓝眼睛拍得“变黑”了，增添了她的貌美。黄宗霭这一手使明特小姐决定要他拍她主演的《命运之鼓》。

黄宗霭是怎样神通广大，竟然改变了明特的生理状态，从而改变了她的精神气质的呢？这办法说起来却很简单，而且事出偶然。黄宗霭经仔细观察研究，原来明特的眼神之所以显得乌黑有神，是因为摄影棚里挂着块黑色天鹅绒，它反射到明特的眸子中，就把淡蓝色变成了黑色。于是，他用一个木框架绑上天鹅绒，中间剪了小孔，把它垫在镜头周围，造成黑色反光，使瞳孔“变黑”。因为黄宗霭常常能用灯光和镜头角度使演员的生理缺陷在胶片上隐藏起来，所以许多女明星都争着要吉米（黄宗霭的爱称）给她们当摄影师。他的摄影技巧对男演员——无论中年或老年都产生了出色的效果。如他在《自由万岁》中使华莱士·皮雷创造了一个粗犷而亲切善良的战士；在《老人与海》中使斯宾塞·屈赛深刻地表演出在险恶海浪中与鲨鱼生死搏斗的精神风貌。固然表演的成功主要靠导演和演员的艺术修养，但黄宗霭拍摄的影片，往往能在摄影艺术上为表演增色。他善于运用光影和黑白的绘画性手法，把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发挥了电影美学

的特性。

1927年，黄宗霭参加了《在底层》的拍摄。他不满足于走老路，总想推陈出新，走出新的路子。他采用新的全色胶片拍摄。影片出来后，很受观众欢迎，黄宗霭自己也很满意。可是没有想到，合同期满，老板没有与他续订，他失去了固定的合同公司，只得四处奔走。正在这时，上海明星公司发出了邀请。1929年4月，黄宗霭回到了阔别24年、魂牵梦绕的祖国，也见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生身老母亲。他在祖国呆了半年，给明星公司讲授化妆与摄影艺术的关系……这半年中，美国好莱坞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完成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可是他只有拍无声电影的经验。不过在黄宗霭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一回美国，就很快掌握了拍有声片的规律，并找到霍华德导演，两人同病相怜，决定倾全力拍出一部高水准的影片《横渡大西洋》。黄宗霭亲用了当时一般人不敢并不善使用的广角镜头和深焦距镜头，用新的白炽灯特别配光。结果，影片面世后，大获成功，原先萧条的电影院前等着买票的观众，一时间，人们见面就谈《横渡大西洋》。这部影片确定了黄宗霭在好莱坞的地位，由最初每月40美元的最低薪给，成为好莱坞年薪最高的摄影师之一。

这一发不可收拾。他首创了“蟹行车”，更重现光线的运用，形成了朴实独特的摄影调子。他所拍摄的《汤姆历险记》，人们至今不能忘怀。这是他拍的第一部彩色影片。那白色的木板教堂，神秘、宽阔、缓缓而流的密西西比河用平实的技巧描绘出来，好象童年的梦幻。

1938年，他拍摄了《海角游魂》一片，第一次获得了奥斯卡金

像奖提名

的荣誉。

1953年，他拍摄了影片《玫瑰梦》；首次体现了宽



银幕的特点，从而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当这位小个子的中国人走上第28届奥斯卡奖大会授奖台，接过奥斯卡金像时，全场掌声雷动，会场外，成百上千的华人为之欢呼，黄宗霭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是第一个拥抱奥斯卡金像的炎黄子孙。1963年，黄宗霭又拍摄了《赫德》一片，把一部情节平淡的西部片，经过他的超级镜头，拍成了一部轰动影坛的片子。德克萨斯的广阔原野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朴实无华的城镇和荒野中间的原始环境，被衬托得淋漓尽致，黑色摄影产生了卓越的效果：旷野茫茫、渺无人烟。文学性很强的影片在他手下便成了优秀的电影艺术。黄宗霭由此再次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

1974年，黄宗霭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了，那年《滑稽女郎》正在拍摄过程中，由于摄影师指导对滤镜的实验而使影片发灰，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黄宗霭虽因病卧床不起，可是制片人在无奈之中，非要请黄宗霭亲自出马，黄宗霭明知这样做可能断送他的生命，但他还是答应了。在拍摄现场，他几次昏倒。这部影片经他完成后，他荣获了第10次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

然而黄宗霭已经心力交瘁，1976年7月12日，这位为炎黄子孙赢得了莫大荣誉的人，这位世界上最杰出的摄影家之一，77岁的他坐在花园里的藤椅上，伴着研究了一辈子的光和影，飞向了天国。

# 为毛泽东和鲁迅架「桥」的冯雪峰

辛平

## 1. 他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

1974年8月，因延边人民出版社准备将鲁迅著作翻译成朝鲜文，为了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关人员到北京访问被鲁迅夫人许广平称之为“鲁迅研究的通人”冯雪峰。

中华伟人毛泽东和鲁迅，如两座交山巨峰，终生相望却未相逢。幸而两“山”之间曾有一“峰”，为他俩架设过一座精神桥梁。他就是冯雪峰。当两位伟人名传四海声震全球时，他们间的“雪峰”却一直沉默着。但是历史不会沉默，两“山”之间的一“峰”，其风采应为人所识，其悲欢应被人共知。

在谈话中，他们问雪峰：“鲁迅这样信赖党，党中央和毛主席又这样了解鲁迅，为什么鲁迅在组织上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雪峰说：“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且不谈他对革命的贡献大小，单说革命者对他的信任就往往超过一般的党员。记得成仿吾同志1933年下半年从武汉到上海就是通过鲁迅接上组织关系的。……再如，1936年4月，党中央在陕北也是收到他和茅盾的贺电才派我去上海找他们。党对他的信任是完全和自己同志一样的。尽管这样，我们和鲁迅本人都没有考虑过他入党的问题，让他当秘密党员有什么好处呢？毛主席最理解鲁迅，以前我和他常常谈起……”

雪峰说到这里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停顿，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有悲凉、酸楚，也有几分犹豫。过了好久，他才说：“以前可以和毛主席常见面，随便交谈，他没有后来那么忙……”

但是，毛泽东和冯雪峰的中断交往，仅仅是因为“忙”吧？

雪峰与毛泽东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25年。那时，毛泽东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雪峰，希望雪峰能到南方去工作。雪峰当时正迷恋于文学，陶醉于“湖畔”，

（雪峰是20年代湖畔诗社的成员）所以没有成行。1927年4月，李大钊的被害强烈地刺激了雪峰，他后来说：“我那时认为李大钊同志才

是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虽然我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受了李大钊同志的殉难的刺激，才加入共产党的。”

此后，雪峰到了上海，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进行了文学创作和评论，并参加了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一度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就在这一时期，雪峰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 2. 鲁迅说毛泽东像个“山大王”

1933年底，雪峰因身份暴露，不便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调入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央党校教务长。这时的毛泽东正受到王明路线排挤，被免去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只做政府工作。毛泽东抓住这一时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苏区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之中，消息十分闭塞，许多外部情况，除了从一些过期白区报纸上获知，就来自刚到苏区的同志口中。毛泽东听说雪峰调到中央党校后，便约雪峰谈话，两位“诗人革命家”一见如故。从雪峰的口中，毛泽东知道了许多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更了解到雪峰与鲁迅的特殊关系。

毛泽东对鲁迅心慕已久，他几次对雪峰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他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

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

雪峰却先对他讲了一个日本人说的话：“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毛泽东开始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他搞农村调查，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提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此后，又领导了秋收暴动，建立了第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展开了土地革命……

在国际上还没有对毛泽东给以足够重视的情况下，那个日本人，竟能将一个披着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加以肯定，也请难能可贵了。

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对于毛泽东的了解并不比那个日本人多。他说鲁迅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又一次开怀大笑了。他的“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等名句，确有一股梁山好汉的气概。他早就对《水浒》等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长征路上，他还特意让警卫员找《水浒》来看，到延安后，他会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此言宛如出自梁山好汉李逵之口。不仅如此，还热衷于以造反故事为内容的《打渔杀家》、《逼上梁山》等剧。还特地给编演者写信予以支持赞扬。尽管毛泽东晚年批判了《水浒》，说宋江搞“修正主义”，只不过是古为今用的一例。其实他一直喜欢《水浒》，在视力极度衰退的情况下，还让人念给他

听。更为有趣的是，毛泽东对“山大王”这个称号甚为得意。1974年筹备“十大”时，一天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毛泽东问王洪文道“你今年多大了？”王洪文：“38岁。”毛泽东：“你比我强多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井冈山唱南瓜汤呢。”王洪文：“主席那时已经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了。”毛泽东笑道：“不，是山大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

### 3. 毛泽东不同意鲁迅进苏区

在言谈中，毛泽东对鲁迅的作品特别是《阿Q正传》感兴趣。当年他对冯雪峰说，阿Q是一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睬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了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睬，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说他当时很想重读一遍，可惜苏区内找不到。

后来雪峰又向毛泽东谈到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斗争写成小说，他曾陪着去上海治伤的陈赓到鲁迅家里，整整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认为确实比《铁流》和《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并打算继续收集素材，同时，又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而苦恼。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没有作声，雪峰接着说：“独立房子（指博古等中央领导人）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

“干什么？”毛泽东问。

“担任人民教育委员（即中等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

“谁主张的？”

“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

“这些人，”毛泽东摇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现在的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受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挺身而出，将艰巨的任务承担起来，是可贵的性格。我们民族几千年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系不坠，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性格，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就这样，毛泽东通过雪峰对鲁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雪峰与毛泽东之间，也建立起了十分密切和相互信赖的关系。

1934年10月，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毛泽东随军出发，雪峰被编入上干队，在长征途中，尽管两人难得见面，毛泽东却一直惦念着雪峰，他知道雪峰与自己一样离不开纸烟，曾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送给雪峰。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已经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1936年4月，雪峰奉党中央之命去上海恢复党组织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前，中央书记洛甫嘱咐雪峰，到上海后，务必找到鲁迅、茅盾等，了解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说派你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等熟识。

### 4. 鲁迅治丧委员会中唯一没有见过鲁迅的人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约雪峰到自己住处，一直谈到深夜。他说，可以把底牌告诉你，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暂时很强大，要把他们赶出中国去，需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条战线甚至包括了蒋介石本人在内。

雪峰一到上海就找到鲁迅，当

天晚上，他们长谈不息。雪峰恨不得把关于红区、长征当时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新政策等，一下子都告诉鲁迅。当时，鲁迅的身体已经有病，但他一直认真倾听，毫无倦意，异常快慰。

以后几天，他们连续长谈。雪峰绘声绘色地向鲁迅描述了毛泽东同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故事，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宏大气魄和设想，以及他非凡的诗文……

这时的毛泽东在鲁迅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山大王”了。他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称呼毛泽东的代号）的政策是对的……”

就这样，雪峰在鲁迅与毛泽东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桥梁。在这两个终其一生未谋面的伟人之间，他是一条不可替代的纽带。这两人又是他最敬佩最密切的朋友。

雪峰这次在上海，设法找到了毛泽东流落上海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委托东北军将领李杜将两个孩子带出中国送往莫斯科。他又惦念着长征途中的在陕北过着艰苦生活的“烟友”毛泽东，特意请人给正在陕北的毛泽东捎去香烟。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不幸逝世，雪峰作为鲁迅的密友和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主持了悼念活动。他特意将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在治丧委员会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没有见过鲁迅的人。这也是第一次公开的将鲁迅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 5. 重庆重逢重见瞿秋白的长衫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的巨头在重庆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9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紧张谈判和频繁地与民主人士的交往中抽出时间，约见当时正在重庆的冯雪峰。自从1936年4月，雪峰受命赴上海后，与毛泽东已有近10年没有见面了，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他心



鲁迅与左联的同志谈话

情异常激动，很希望能见到当年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但他也知道今日的毛泽东已不同往常，所以并无奢望。在心中与毛泽东共享喜悦和分担忧虑。谁知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还惦记着他这个老朋友。

雪峰清楚，他既非政要，也非民主人士，当时在党内连个职务都没有，重要的是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友情。雪峰郑重地从箱子里取出一件长衫穿在身上。这件长衫曾经属于共产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准备长征时，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希望能随军出发。但是，他的请求被当时的中央领导所拒绝。雪峰听说这一消息

后，请求毛泽东去为秋白说句话，毛泽东虽然自己也几乎被留下，但他还是为秋白争过。他对雪峰说：“他们坚持要让秋白留下来，我无法说服他们。”

红军出发前，雪峰怀着抑郁难过的心情去向秋白告别。秋白紧紧地握住雪峰的手说：“不要为我的安全过分担忧，你们突围北上肯定比我更艰难，道路更险阻，让我们共同来承受严峻的考验吧！”两位同与鲁迅知之甚深的战友相互压制着内心的痛苦，依依惜别。秋白脱下自己身上的长衫披在雪峰的肩上，深情地说：“雪峰，这件长衫伴着我战斗了七八年，留下与鲁迅先生共同战斗过的痕迹，现在给你做个纪念，伴随着你出征吧！”雪峰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知道秋白临别赠衣的深意。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白区报纸上看到瞿秋白被害的消息，他对雪峰沉痛地说：“瞿秋白同志被敌人杀害了，不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从此，秋白的长衫始终伴随着雪峰。1941年1月，雪峰不幸被捕，临出门时，他将这件长衫穿在身上，表示要像秋白一样去迎接考验。这一次雪峰又穿上了长衫，这意味着他要和秋白一道去瞻望毛泽东。毛泽东见到雪峰时，认出雪峰身上的长衫，他沉思了片刻说：“秋白是个好同志，牺牲得太早太可惜了！”

### 6. 毛泽东的好心几乎害了冯雪峰

毛泽东对重庆的文化工作很关切，认真听取了雪峰的介绍，然后说：“好几年来还没有看到过象

《乡风与市风》(雪峰杂文集)、《真实之歌》(雪峰的狱中诗集)这样好的作品。”雪峰听到毛泽东这样夸奖自己的作品，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毛泽东又问到雪峰在国民党狱中的情况，他说：“我在狱中用的名字是冯福春。有一次特务总教官将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否认得胡秋原。我说认识。总教官狡黠地笑着说：‘胡秋原是有名的共产党，你同他是什么关系？’我一听堂堂的总教官连胡秋原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当特务都不够格。我告诉他：‘胡秋原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以前是陈铭相一派的……’总教官突然打断我的话说：‘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冯雪峰！’这句话可把我吓了一跳，我想是否出了叛徒，不管怎样，一定要顶住，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暴露身份。我说：‘不错，我在胡秋原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用的就是这个笔名。’其实我哪里在胡秋原的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谈话中，我发现这个愚蠢的家伙，竟然对上海文化界的事情知之甚少，反而让我变被动为主动。从那以后，特务再也没有提起冯雪峰这个名字。”

毛泽东听后，面带歉意地说：“好险哟，险些把你害喽！”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42年1月，一批作家通过重重封锁到达延安，毛泽东在欢迎会上，问起冯雪峰的情况，当他得知雪峰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时，当即同陈云商量，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将雪峰营救出来。不久，中央指示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设法营救冯雪峰。董必武收到中央的电报后，便马上给胡秋原打电报，请他帮助营救冯雪峰。胡秋原当时在政治上是以“第三种人”面貌出现的，颇得国民党上层人物的赏识。他接到董老的

电报后，便给上饶集中营发了一封电报，愿意为冯雪峰做保人，保释冯雪峰出狱。由于董老当时不知道雪峰在狱中用的是冯福春这个名字，所以才出现了上述那段险情。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良好的动机，不一定都能带来良好的效果。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比如我们现在谈判，就是要使国家尽快地恢复起来，同时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但是，如果蒋介石一定要打，为了长久的和平，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来奉陪到底。”

就在毛泽东同冯雪峰谈话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积极的调兵遣将。不久，重庆谈判的碰杯声，被全面内战的枪炮声所代替。毛泽东和冯雪峰，再次天各一方。虽然全国解放以后，他们都到了北京，但却……

#### 7. 他不幸成了老朋友的“靶子”

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班研究生李希凡和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教师蓝翎，因对俞平伯和胡适的研究《红楼梦》有不同看法，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

李希凡先给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艺报》写信介绍他和蓝翎的文章，询问贵刊可否刊登。没有回音。他们便寄给了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结果，在1954年第9期上登出了。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了意外的反响，特别是当时在文化部文艺处挂职的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发现这是一个染指文艺界领导权的大好时机，就拿着这篇文章，跑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予以转载，声言要发动一场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

报》有关负责人认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不同意转载。江青后来又到中宣部，把文章交给周扬和胡乔木。他们浏览了一下，不在意地说：“这是小人物写的，这种小人物怎么敢批评俞平伯？”但是，他们考虑到江青的背景，商量出一个折衷的办法，指定在《文艺报》上全文转载。

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约李希凡和蓝翎谈了话，告诉他们，准备将他们的文章中写得比较粗糙的地方改一改，另加编者按语在《文艺报》上转载，谈完话，雪峰一直将他们送到大门外，替他们叫了三轮车，还预付了车钱。

9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8期上转载了李、蓝文章，文前由冯雪峰亲自撰写了《编者按》：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

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



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这篇《编者按》明确指出：作者试着用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的论点提出批评；作者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不仅对《红楼梦》，而且对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都可以进行争鸣。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雪峰都表示了对作者的支持。

雪峰没有意识到，在这篇文章背后正孕育着一场政治风暴。而他写的那篇《编者按》则使他成为被挞伐的对象。

身为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在文章上做了多次批注，并于10月16日给政治局诸同志及有关人员（包括冯雪峰）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他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表示：通过对俞平伯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反对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给俞平伯定了性，也对文化艺术界的现状表示了极大愤懑。

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一场批判运动自然也就在紧锣密鼓中登场了。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认真修改后才发表的。毛泽东用他那飘逸潇洒的草书写道：“《文艺报》在这里跟

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的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

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这篇文章马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冯雪峰，此时的雪峰正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和先烈遗著的整理出版上，对于突如其来的批判，几乎毫无精神准备，但他还是在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上做了检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他在“检讨”中痛苦地解剖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于我平日对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在泛滥的现象熟视无睹，问题的严重更是在于当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向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资产阶级唯心论开火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认识到这开火的意义重大，因而贬低了李、蓝两同志的文章的重要性，同是也就贬低了他们文章中的生气勃勃的战斗性和尖锐性，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新生力量。这错误的最深刻的原因在哪里呢？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特别严重的是，我长期地脱离群众，失去对于新事物的新鲜感觉，而对于文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确实是重视不够，并且存有轻视的倾向的。

#### 8. 他是这样一个“老爷”

雪峰果真像他“检讨”中那样吗？

首先，他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作家，且不说他在解放前所写的那些充满斗争激情的评论、杂文、

寓言、诗歌，且不说他为鲁迅先生起草的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文章，只要看一看解放后他对资产阶级思想毫不留情地进行过斗争性的文章，如《反对资产阶级的说辞》、《对资产阶级展开思想斗争是革命的迫切任务》等等、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决不是一个对“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在泛滥的现象熟视无睹”的人，也决不是一个“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的人。

其次，雪峰是否“失去对于新鲜感觉”，对新生力量重视不够，“并且存有轻视的倾向”呢？作为一个同鲁迅一起生活和战斗过的人，他身上当然有着更多的鲁迅精神。鲁迅一生都在发掘新生事物，都在扶植青年作家，雪峰不也是这样的吗？也就是在李、蓝文章发表前几个月，刚刚30出头的杜鹏程应雪峰之约去谈他的成名作《保卫延安》，杜鹏程回忆道：

一天夜里，我又到了他家。他伏在台灯下，正在深深地埋下头，奋笔疾书，……当雪峰同志发现我站在那里时，以手示意，要我坐在桌旁的凳子上。……接着就把一堆草稿推到桌边，说：“这是我写的文章，你看看。”我把这篇题为《评〈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的洋洋近二万字的大作捧读之后，非常激动。……

我从他贤慧的夫人口中得知：一天夜里，家里人全睡了，他伏在写字台前的台灯下看《保卫延安》打字稿，深夜时分，他的夫人听见他咳嗽得很厉害，起来一看，炉火熄了，他又没有披大衣，结果手脚快冻僵了，而头却烫烧，患了重感冒。雪峰同志若无其事站起来，摆着手，来回走着，说：“这位作者在哪里住着？现在我很想和他谈一

## 殒星篇

谈。”他的夫人说：“夜里（应为凌晨）四点了，你到哪里去找人？我马上给机关打个电话，让车子开来，把你拉到医院去看病。”雪峰同志立刻焦急起来，厉声说：“看什么病？”然后他就激动地向她讲述作品的内容，讲到有些人物和场景时，眼里滚着泪水：“我们的战士多英勇！中国人民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啊！”

雪峰就这样，用一股热心去扶植青年作家，全然忘了自己。杜鹏程因为《保卫延安》一书，而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雪峰对之倍加爱护，提醒杜鹏程说：“到斗争生活中去，这是最根本的；离开群众，不管怎样有才能的人，也一无所成。你看我坐在北京能写出东西吗？”并且谆谆告诫：“不要当了作家，就坐在北京当‘新闻人物’；什么作报告啦，介绍创作经验啦，这种风气很不好，会毁坏人！”

对于李希凡、蓝翎也是一样，雪峰不仅将他们的文章转载，以扩大影响，同时也指出文章中的不足。

然而，批判与事实竟有那么大的反差。《人民日报》文章竟说：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对此不理解的人很多很多，杜鹏程便是其中之一：

“1954年秋天，我从外地刚回到北京，那时雪峰同志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那场批判中，作过检查，还被撤销了《文艺报》主编的职务——罪名之一是‘压制新生力量’。可是在几个月之前他还

废寝忘食地帮我看稿子，奖掖我这个文学新兵哩！”

在这场批判中，被批判者与批判者一样的可悲。雪峰虽然在“检讨”中提到：“我平日当然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当我受到说我轻视新生力量的严厉批评时，我最初心里还迷惑，以为我做了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应该说，在通篇“检讨”中，这是最真实的一段文字，雪峰当时兼职很多，对于每一个职务下的工作，都是认认真真地去做，他从不青马虎，但精力有限，他本想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职务让德高望重的巴金来做，巴金在上海分不开身，他只有自己担起来。这样他一身挑起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兼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常务委员等职。他不是个超脱挂名的人，事事都认真，忙得不亦乐乎。即便如此，他仍在不停地挖掘新人，努力将他们推上文坛。他本可以问心无愧了。可他却却在检讨中说：“这正是我的包袱，阻碍我去从思想上认识问题的本质。现在我认识到，忽视和轻视新生力量的倾向，是有我自己思想上的根据的。这样忽视和轻视新生力量是最错误的思想，是最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在这上面也最深刻地说明了我的作风和思想是有着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的联系的。”他甚至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似的说：“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这样地给自己上纲上线，完全违背了他一贯的作人方式和行为



准则。

### 9. 鲁迅早就为他的愁直担心

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就多次提到雪峰’s “浙东人脾气”，说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有勇猛的锐气”，“好象没见过他双心过”。当年他和鲁迅在一起时也有与鲁迅想法不一时。有回雪峰说：“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鲁迅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雪峰又说：“先生，可以做那样。”鲁迅说：“似乎也不大好。”雪峰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鲁迅只是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雪峰以其韧劲达到了目的。

陈望道当年就鲁迅和冯雪峰之间的关系曾说：“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可见鲁迅对雪峰的偏爱，但鲁迅担心雪峰过于憨直，容易成为有些人的眼中钉。

可是经过了十几个风风雨雨，雪峰的性格并没有多大改变。文化大革命中，雪峰被打成“叛徒”，造反派不仅强迫他“请罪”，而且要他不停地写交待材料，每份材料都要准备四份：外调的一份，两派群众组织各一份，自留底稿一份。雪峰当时已年过花甲，每份材料复写四份，需要花费多大的气力啊！他凭着“硬气”，硬是写了下去，写得他的右手食指、中指都弯曲变形了，前后写出30多万字材料。在材料中，雪峰坚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提供任何伪证，更没有对自己的错误避重就轻和委过于人。

1969年春节前，一个自称“革命派”的头头勒令他交出自有的交待底稿，雪峰说要留着再写时参考对照用，对方却迫令他一定得交！当雪峰气得双手颤抖地交出那些材料时，这个从不落泪的硬汉，眼泪都流出来了。雪峰也不喜欢别人

随便流泪，丁玲1936年出狱后，经过重重波折，终于在上海见到了雪峰。她刚想对自己同志痛哭一场，以宣泄长期的辛酸委屈。哪知她刚一哭，雪峰却把脸板起来了：“你为什么老想着自己呢？世界上不是只你一个人孤独地在那里。”就把丁玲泪堵回去了。

雪峰自己流泪也是因为别人。他怕没了底稿再写材料会有出入，将给别人带来麻烦，他还想把自己所写的作为真实史料留给后人。

雪峰在“交待”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时，主动承担了作为党的领导者的责任。文革后，周扬听说雪峰没有把三十年代的问题都推到他身上，反而自己承担了责任，才意识到雪峰的宽广胸怀。他马上赶到雪峰家，紧握住雪峰的手说：“过去我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现在请求你原谅我。”雪峰说：“错误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有错误。”两个人说着抱头痛哭起来。

### 10. 他到底错在何处？

雪峰说自己“也有错误”，是真诚的。早在三十年代后期，雪峰就说过：“我一生中最钦佩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后来，雪峰又讲：“我是崇拜毛泽东的。”也许正由于他的坚信毛泽东，后来的批判是由毛泽东发动的，就由此推断出自己确实犯了错误，努力找出自己的问题，以缩小同毛泽东认识问题的距离。

但是他却未被毛泽东理解。毛泽东曾针对雪峰1954年检讨中说自己没有注意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批注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针对他检讨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批注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针

对“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批注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针对“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的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批注道：“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针对“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批注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一个硬给自己上纲上线，一个反认为是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一个已经认罪，一个却穷追不放。

这到底为了什么，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一下说清。

1954年11月10日，毛泽东再次就《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批语认为《文艺报》和冯雪峰“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毛泽东就这样将认识问题上升为立场问题。他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特地选择了雪峰在四十年代写的诗《火》、《三月五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动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等，分送给刘少奇、周恩来和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传阅，并嘱：“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

12月上旬，《文艺报》改组领导班子，主编雪峰仅仅保留了一般编委的职务。也许是毛泽东还



是给了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 11. 说来话长的是非恩怨

将政治斗争简单地归结于个人恩怨是对历史的误解，但每一次政治斗争中却难免夹杂着个人恩怨。

1954年对于由《红楼梦》研究引起的批判，致使《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被免职，丁玲、陈企霞被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将此事认定为党内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他曾气愤地说：“可恨的是共产党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他要通过为小人物鸣不平，将文艺理论阵地从反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夺回来，交给了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的这一举措，使正被压制的胡风兴奋起来，他不了解事件内幕，以为是他于当年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被称为“三十万言书”）起作用，错以为他受压的状况将会得到改观。

此事说来话长。1936年初，周扬等人在上海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4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赴上海恢复党组织，认为没有阶级立场，应该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经讨论，并得到鲁迅的最终认可，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胡风根据讨论结果写作并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由此出现了两个口号之争。雪峰后来对此事做过检讨，第一没有正式点明这个口号是鲁迅先生提出的，第二没有请示过陕北中央，不然，也许可以避免当时的那场争论。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雪峰曾试图说服两派捐弃前嫌，以大局为重，胡风在

雪峰的劝说下，没有再写文章争论，而周扬则拒绝与雪峰见面。雪峰只得派人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有关政策不断传达给周扬。以后又发生了鲁迅和徐懋庸的“公开信”事件，鲁迅表示了对周扬等人的不满，点出了“四条汉子”。这个专用名词，使周扬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周扬知道，其时鲁迅已病得相当严重。他回答徐懋庸和批评周扬的文章初稿就出自雪峰之手。由于周扬等人当年与鲁迅及雪峰、胡风等人芥蒂较深，结果埋下了1954—1955年政治风暴的原因。

周扬后来离开上海到了延安，地位逐渐地上升并得到巩固，而雪峰则离中共的政治中心越来越远。这一点胡风体会的最深刻。自1949年后，他因在许多文艺观点和理论问题上，和周扬等人不一致，因此一直受到冷遇，他面对执掌文艺大权的周扬等人，感到自己丧失了平等争论的权利。对于也在文艺界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战友冯雪峰，则由隔阂产生了怨恨。因为批判他和他的友人的文章几乎都登在《文艺报》上，而雪峰就是主编。1952年3月20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写到：“冯是小人，得了势就玩手段，内里空虚得很。”

#### 12. 老友胡风错估形势自投罗网

批判《文艺报》使胡风错以为形势将有利于他。

11月2日，胡风给张中晓的信



冯雪峰一家与鲁迅合影（1931年）

中写道：“缺口已打开了，紧张得很。这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问题要全面展开，已经公开提出了。二马（指冯雪峰）和该报‘带头’检讨，并深入检查，够好看的！第一步检讨先发表，而且也不限于‘红楼’一事的。”

11月7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的联席会上，胡风发了言，狠批了《文艺报》，而且点了周扬、袁水拍等人的名。紧接着与胡风观点一致的人也开始了反击。

胡风是一个文人，根本就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

12月8日，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主席团联席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周扬在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改过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由

此，斗争矛头，由《文艺报》一下转向了胡风。其来势之汹，攻势之猛，逼得胡风连连退却，迫不得已于1955年1月11日，写出了长达万言的自我批判，违心地承认自己在有些根本问题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方针。随着批判的不断升温，曾与胡风观点相同的一些作家只得与胡风划清界限，将胡风写给他们的信交出。毛泽东看到胡风的信和检讨，认定胡风等人是一个“反党集团”，指示成立专案组，并分三批登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编者按。胡风本人则遭逮捕，随即在全国展开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政治运动。

意想不到的政治形势，使冯雪峰沉默了。在对胡风的批判中，尽管胡风曾对自己不满，他除了一次应景式的表态发言外，没有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或揭发胡风罪行的文章，因为他不认为胡风有罪。相反地，他却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尽力保护可能被打入胡风“反党集团”的人。他的所做所为，当然令一些人感到极不满意，人家给你改正错误的机会，就是希望你能主动赎罪，还有比胡风的老战友提供的炮弹更典杀伤力的武器吗？但雪峰不是那种人。

早在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时，雪峰劝说胡风不要去争论，“沉默有时是最好的回答”，因为时间和事实会证明谁理谁非。胡风当时听从雪峰的劝告，顾全了大局。而这一次胡风说什么也沉不住了，终于撞在了阶级斗争的枪口上。现在又轮到雪峰沉默了。雪峰多么希望毛泽东能象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陕北根据地那样，随时能够交换一下意见，然而这一希望已被中南海的红墙阻断。

### 13. 他想沉默却沉默不了

沉默并不等于停止思考，雪峰不仅仍有见解，并且时有流露。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又被人揭发了。揭发他的人恰恰又是第一个揭发胡风的人。

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件坏事；但从今天研究雪峰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件好事，当年的揭发材料，又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雪峰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以政治排斥艺术的情况，忧虑地说：

政治标准第一，当然是对的，不过应该是说，对于一件艺术品来说，政治标准才是第一的，现在却弄成先不管它是不是艺术品，即使不是，只要政治性强，也就是好的。正好象我们说干部标准，德是第一，这是以一个活的人来说的，不能提一个木头在那里，就说他德怎样怎样好。

1956年，苏联共产党开始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国共产党内也开始批判现代迷信，雪峰对此谈了自己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看法：

苏联文艺界这些年老是转来转去，一会儿抓住这个理论，一会儿抓住那个理论，一会儿反对无冲突论，一会儿又跟着尼古拉耶娃大谈艺术特征。其实都不是关键，所以始终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这一回，根本关键才抓住了，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民主。作家其实都知道应该怎么写，不用人去教。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他怎么也不可能写得好。有了社会主义民主，都会写出好东西来……这才是雪峰的心里话，也是雪峰的真心卓见。可是雪峰却因此再遭厄运，可怕的罪名一个个被制造出来，诸如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加者、人民文学

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胡风的同路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当然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1957年7月25日起，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连续召开，在批判冯雪峰时，一位文坛要人发言说：

他的文艺思想是和党的文艺思想，具体说是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违背的。……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和胡风思想有共同点。怪不得后来批胡风时，雪峰同志作为文艺理论家，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一篇批评文章也写不出来。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有人说，在文艺思想上，过去胡风是雪峰派，后来雪峰倒成了胡风派，批评胡风思想而不批评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是不公平的，这话不是没有道理。

另一位发言者则否定了雪峰的全部历史。他说：

这是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一条隐蔽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之下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他们企图从内部来夺取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堡垒的。

雪峰从此被戴上“右派”的紧箍，只要“左派”一念“咒儿”，就可以让他痛苦的满地打滚儿。但是更使雪峰痛苦的是开除他已有三十年党龄的党籍，他几乎要以死来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但在支部会上宣布组织决定时，他仍以一名党员的态度面对这一事实：“我服从组织雪峰的言行大概使毛泽东非常失望，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特别点了雪峰的名，说他是“坏人”。

仅仅几年的时间，与鲁迅亲近的人纷纷落马。1954年，雪峰、丁玲等先受到煎熬；1955年，胡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1957年和1958年，雪峰、丁玲等戴上右派的帽子。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说这些

人都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那么又是谁提供的材料呢……当然，不是追究哪一些人的责任，而是应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 14. 鲁迅在毛泽东和冯雪峰之间

雪峰被过早地抛下政治舞台而成为“旁观者”和“运动员”，这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冷静的思考。

1974年4月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陈早春来到雪峰的家，向雪峰讲述了自己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举措不能理解。雪峰没有因为毛泽东说他是“坏人”，而对毛泽东怨恨，相反地，却耐心地向陈早春讲解了毛泽东一生的功绩，讲解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他特别指出：“毛主席百年之后，是非功过将引起争议。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将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在这方面不能夹杂任何个人的情绪。”

雪峰又分析了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对毛主席首倡群众路线而后又自己违背群众路线深表遗憾。他说：“毛主席后来由于地位变了，逐渐脱离了群众，既脱离群众，下情不能上达，两眼漆黑，就容易受坏人包围。这是主席晚年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雪峰引述了鲁迅著作中有关的一些言论，如《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所说的洋场上的翻译，《略谈香港》中所说元代官府裁判犯人时所用的“通判”，是如何作弄主子，又如何假借主子的威严去欺压百姓。他特别引述了《扣丝杂感》中所说“猛人”被“包围”的滴水不进的一大段言论，指出被包围者的可悲和包围者的可怕，并就此发出感慨说：“中国社会由于民主制度不发达，‘包围’总在出现。就是主席也难免被包围，

这是个惨痛的教训。鲁迅打算作《包围新论》，他说没有作成，其实已经在作了。只是这样的文章，后来者还得继续作下去。鲁迅说，打掉这样的‘包围圈’，中国有五成希望得救，我看可以基本得救。”

“由于毛主席已经这样被‘包围’，加之他目力所注，又主要在中国过去的二十五史，而不在当今飞速发展的外部世界，所以应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席所以犯错误，主观上应由本人负责，但这是旧中国社会的痕迹。我们应该由此看得更深一些，不要把对包围者的不满转嫁到毛主席身上。被包围者与包围者是有区别的。目前，大家都以为包围者的形象代表着被包围者的形象，通过包围者去看被包围者，其实是不对的。还是鲁迅说得对，包围圈外的看客，通过包围圈看到的并非‘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显现的幻形’。”

雪峰到底是鲁迅得意的学生，从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中，就能看出他对鲁迅思想稔熟的程度。至于“包围圈”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对毛泽东的评价，姑且不说；值得注意的倒是“包围圈”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毛泽东晚年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包围圈”？为什么打破一个“包围圈”后来又设置一个“包围圈”？而这一切却又偏偏与马克思无缘，很像是中国历史的翻版。注意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中国的土壤是生产专制的温床，如果不能改良土壤，就不能铲除专制，也就不能打破“包围圈”。而毛泽东似乎对改良土壤的兴趣并不大，因为“改良主义”正是他所痛恨的，那既缓慢又太温情。

毛泽东对于鲁迅著作稔熟的程度，恐怕并不下于雪峰。在他的

书房中，有一套印装精美保存完好的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由鲁迅纪念委员会编辑印制。这套《鲁迅全集》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每册的版权页上都印有“非卖品”的字样，毛泽东的这套编号为58号，是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辗转送到陕北的。1938年以前，毛泽东没有条件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得到这套《鲁迅全集》后，毛泽东爱不释手，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时，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睡觉。”建国后，毛泽东仍时常读鲁迅的书，并常常谈到鲁迅。而鲁迅被抬得最高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正是“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之时，毛泽东怀着“老当益壮”的心情说：“斗则进，不斗则退。”鲁迅一生都在战斗，这非常符合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他非常想重新读一遍《鲁迅全集》，但由于视力急剧衰退，已经无法阅读普通的版本，于是有关部门特地赶印了大字线装本。出一本毛泽东就读一本，等书出齐了，他也差不多读完了一遍。

他和冯雪峰一样，终生都在研究鲁迅的著作，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因而也起了不同的作用。这个奇特结果，鲁迅当然是不会想到的。

1976年，雪峰与毛泽东相继去世，他们认识有40余年之久，其中却有近30年天各一方。雪峰对自己的境遇从没有抱怨过谁，因为他是鲁迅最好的朋友和学生，也因为他曾经是毛泽东无话不说的战友，有这种际遇的，在当代史上找不出第二人，所以他虽然半生不幸，却又比别人幸运。

（责任编辑 卢弘）

在《炎黄春秋》上读到关于胡乔木同志的长文，不由想起萧军与他的交往。他们虽然一个是著名作家，一个是党内“大笔杆子”，经历和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却相交很久，并且很有缘份。1936年在上海，1942年到1944年在延安，1981和1982年在北京，他们曾多次交往。

### 一、在上海

1934年11月初萧军到了上海，写出了反映东北抗日斗争的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鲁迅先生看了原稿非常赞赏，热情地写了序言予以评价。

由于这种“言抗日”的小说国民党当局严禁出版，所以萧军是以“奴隶丛书”之二（之一是叶紫的《丰收》，之三是萧红的《生死场》），并自费，秘密找私人印刷厂印出，由内山书店和胡风秘密代售传播。鲁迅先生还托人将《八月的乡村》带到苏联、日本、印度、美、英、法等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在上海各大学里秘密推销，很快受到了广大进步读者的欢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文学战线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一面红旗。

1936年2月25日《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第23期第2章第4版发表了“左联”成员胡乔木评论《八月的乡村》的文章，其中写道：

“《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中国文坛上也有过写满洲的作品，也有过写战争的作品，却不曾有过一部作品是把满洲和战争一道写的。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人民革命军是怎样组成的，又在怎样的活动；里面的胡子、农民、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互相矛盾和一致；对于地主，对于商人，对于工人农民，对

于敌人的部队，他们是取着怎样的政策，做出来的又是怎样的结果。凡是这些都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急于明白的，而这本书却用生动热烈的笔调报告了出来。

这本书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在神圣的民族战争当中，谁是先锋，谁是主力，谁是可能的友军，谁是必然的内奸，它已经画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它用事实证明了这个基础不在知识的高下，不在性别，也不在年龄。它又暗示了中国民族革命的国际基础。此外，它又向读者说明了革命战争过程中无比的艰难，这艰难却不使读者害怕，只使读者抛弃了各种和平的美丽的幻想，进一步认识出自由的必需的代价，认识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

乔木同志就这样详尽地介绍了作品的内容，评述了《八月的乡村》的深远意义，热情地为它叫好，虽然他和作者并不相识。

胡乔木文章发表十几天后，张春桥化名“狄克”写了一篇攻击

《八月的乡村》和鲁迅的文章。

鲁迅先生一眼就看透了这个假“左派”的反动本质，写了一篇《三月的租界》杂文给予了回击和揭露。

萧军自己也写文章回击了狄克的挑衅和攻击。

由此可见乔木、萧军同鲁迅先生是一条革命战线上的战友。当年乔木25岁，萧军29岁，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个人住址保密，两人没有通信的机会，更没能见面，只能是一次并肩战斗的“神交”。

### 二、在延安

1940年6月，萧军在董必武、林伯渠和邓颖超等同志安排下，和我带着8个月的女儿萧歌由重庆到西安，乘八路军办事处军车到达延安，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追捕。

# 萧军与胡乔木的交往轶事

●王德芬（萧军夫人）

在宝塔山下延河边，人们不断听到萧军舒畅高昂的歌声。

萧军在边区“文协”定居之后，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和积极的态度为延安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做出了贡献。

只是萧军秉性耿直，脾气急躁容易冲动激忿，常常与人争论和争执，闹得很不愉快，致使他一度想仍回国统区去直接和敌人斗争。他向毛泽东主席坦率直言，毛主席再三安慰规劝和开导、挽留，他才决定不走了。毛主席接受萧军建议，着手制定党的文艺政策，对萧军委以重任，请他代为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为召开文艺座谈会作准备。萧军曾珍藏着当年毛主席给他的如下一封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1941年8月2日

此后不久，胡乔木成为毛泽东的秘书，萧军和他这才正式相认相识。只见萧军“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不念与胡乔木在上海的战友之谊，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又和几位同志辩论起来，除了欧阳山、何其芳、周扬，也有胡乔木。在谈到鲁迅先生所走的道路是“发展”还是“转变”问题时，乔木说是“转变”，萧军说是：“‘发展’，不能说是‘转变’！‘转’者方向不同也，原来向北走，又转向南了或者转向东、向西了，越走越远了。‘变’者是质的不同，由反革命的

变成革命的，或由革命的变成反革命的，是质的变化，鲁迅先生并不反动，所以只能说是‘发展’而不能说是‘转变’。”

当时朱德总司令说：“不但有转变，还有投降刚，比如我吧，就是一个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

萧军认为各人有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总司令可以承认自己是从反动立场转变到革命立场。但鲁迅先生却不是从反动立场转变到革命立场的，所以只能说是“发展”。

在大会上萧军和乔木没能取得一致意见，会后乔木给萧军写了一封信，经过思考又另外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信上还有两处毛主席用铅笔修改的字迹，说明乔木这封信是毛主席共同研究过的。（这封信萧军把朱德、林柏渠、王明、董必武……给他的信一同粘贴在一个信夹里，一直珍藏了20多年，可惜在“文革”初期被抄家的红卫兵都抄走了。）

1943年3月，萧军所在的“文抗”撤销了，作家们大都响应文艺座谈会的号召与工农兵相结合体验生活去了，有的迁到其他单位继续“整风”。萧军由于受“王实味问题”的牵连，哪个单位也不敢要他，原住处改成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萧军成了招待所的客人。当时我正怀着孩子，快到预产期了，招待所蔡主任对我们很不客气，萧军终于和他发生了冲突，气愤地当面指责蔡主任。对方道：

“你敢批评我？”

“别说是你，毛主席说过，连共产党有了错误也可以批评！”

“你嫌这不好，可以走嘛！”蔡主任说。

“走就走！”萧军也不示弱。

说走就走，第二天清早，我们冒雨离开了招待所。来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大门口。

萧军决心下乡去当老百姓，不吃这份供给饭也不受这份窝囊气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民政厅厅长刘景范怎么劝也不行，只好给他开了通行证，找两头小毛驴把我们送到了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刘庄安了家。我们成了一无所

有的人，亏得左邻右舍的老乡们伸出了热情支援之手，又交了一个放羊的把兄弟贺忠俭，才度过了难关。农村里没有医院也没有助产士，是萧军自己为我接生的一个女孩，为了纪念这次下乡务农，取名“萧耘”。

1944年3月3日，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领着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胡乔木来到了我们住的寒窑中，没有凳子，更没有椅子，只好请他们坐在炕沿上，乔木环视窑内一周对萧军说：

“老萧，我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好极了，我和老乡们交上了朋友，生活没问题，明年一开春就开荒种地，咱有的是力气。”

乔木和王书记对了眼神，王书记说：

“老萧，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万一孩子生了病，村里连个医生也没有，也买不着药，我看你还是回延安城里去吧！”

两个人的来意很明显是动员萧军回去。乔木说是“顺便”来看看我们，刘庄是个很偏僻的小村子，没有王书记领路乔木肯定是找不到我们的。在文艺座谈会上乔木已经领教过萧军的脾气，如果告诉他是毛主席派他来请他回延安城里去，岂不助长了他的傲气？所以乔木未吐真言。常写小说的萧军最了解人们的心理，哪能不明其中的原由呢！所以也就心照不宣未予拆穿，只说：

“让我考虑考虑再回答你们好吗？”

二位客人走了以后，我对萧军说，为了不辜负毛主席的关怀和党的政治影响，为了两个儿女的健康，还是回去吧。他只得同意了。王书记派了两头小毛驴将我们一家四口送到了中央党校三部，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都集中在这里参加整风学习。见到了罗烽、白朗、塞克、刘岷、阿甲、艾青等许多老朋友。

乔木也算不虚此行，完成了毛主席嘱托他的任务。

### 三、在北京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东北疏散人口，我带着孩子从抚顺来到北京，分配到市劳动局工

作。

萧军也要求调到北京工作，东北局宣传部只同意他到北京探亲。他于1951年1月来到北京后再也没有回东北，结果成了没有组织关系和工作单位的“无业游民”，没有供给关系也就没有了生活费，依靠向亲友借贷度日，专心致志地写他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和《第三代》。后来彭市长安排他到市政府文物组当考古研究员。以后又让他到市文化局当戏曲研究员。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运动员”，“文革”中更是差点送了命，关押加劳改8年，直到1979年冬才重返文坛，第一次参加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1980年由中共中央批复北京市委给他正式平反恢复名誉，政治结论中说……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随后又担任了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和全国政协委员。在1981年12月中国作协理事会上，阔别多年的萧军和胡乔木又见面了，老友重逢分外亲切，两人紧紧握手，久久不放。在会议期间，萧军把他的发言稿和会议的建议，交给乔木请中央有关部门参考。

开会期间，《文艺报》编辑请萧军根据乔木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当前思想战线若干问题》写点感想。萧军把乔木的文章反复阅读之后，写了一篇题为《一瓣‘新’香》的文章，其中写道：

“我觉得这篇文章是有着痛定思痛，语重心长……‘新’的愿望，‘新’的起点，‘新’的境界……而出现的。”

回想几十年来，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能够有今天，那是和我们的先行者流热血，抛头颅，经屈辱，历艰难……分不开的；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我们是痛定思痛，整顿、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认真地瞻望一下我们的前途，我们不能做一个无记忆的简单动物，无思想的随波逐流的愚氓，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来……

我做为中国共产党50几年的“老”群众，敢于说为了它好，为了它更完美些，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尽管我遭受到若干年的误解——但这算不了什么——我今天仍然是如此，一直到我的终生也如此……

这篇文章于《文艺报》1982年第二期发表后几天，萧军收到胡乔木一封来信，说他已看到萧军的文章，向萧军表示感谢！说他过去曾多次伤害过萧军而萧军却不予计较，仍以坦诚相待使他深感歉疚。

萧军看了乔木的来信也很感动，说乔木肯于虚心道歉难能可贵！也自我检讨说：

“我过去争强好胜，盛气凌人，常常不注意方式方法，态度生硬，言语粗鲁，很不应该！几十年来挨批挨整也是我咎自取，怨谁呢！我这是‘老虎掉山洞伤人太重’啊！”说罢不禁哈哈大笑，这笑，说明他和那些批判过斗争过他的同志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已一笔勾销了。

萧军到了老年脾气好多了，棱棱角角也磨光了，心胸开阔了，气量宽宏了，能够体谅人原谅人多做自我批评了。对人更加诚恳更加热

情了。本来还想把自传续写下去，最后决心不写了，他说：

“我这一辈子快乐的事少，痛苦的事多，我不愿再揭疮疤了，我疼，别人也疼，还记那些旧账有什么好处呢，让那些恩恩怨怨到此为止吧！”

1983年5月、8月、9月东北三省各大学及文化团体分别在长春、哈尔滨、锦县召开了“萧军创作生涯50周年“纪念大会”。1984年3月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市作协也为萧军召开了庆祝大会，人们给了他崇高的评价和荣誉。萧军在每次大会上都诚恳地表示：“让我们眼睛向前看，团结起来，为祖国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多做贡献吧！”萧军到了老年，胖胖敦敦像个弥勒佛，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总是那么忙碌和快乐，80岁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终于力不从心地倒下了！1988年6月22日永远闭上了那双充满笑意的眼睛，终年81岁。胡乔木同志特地送来了花圈。不料他自己亦于1992年9月去世，终年同为81岁。愿两个知心的朋友在天之灵能够欢聚！安息！

京剧是我国最大的戏曲剧种之一，不但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外也备受推崇，被看成是中国艺术的象征。哑剧大师卓别林于1955年在巴黎观看了京剧之后，说这是“焕发出光彩的珍珠”。

京剧起源于何时？它是怎样形成的？

这要从乾隆皇帝说起。乾隆皇帝爱看戏，他数次去南方视察，沿途有不少戏曲引起他的兴趣。1790年，他过80岁生日时，全国各地许多好戏班到北京演出。比较突出的是“四

大徽班”，即“三贡”、“四喜”、“知春”、“春台”四个唱徽调的戏班。他们在庆祝活动结束后，留在北京继续演出。唱二黄腔的“徽调”曲调刚健清新，演出生动活泼，使人耳目一新，逐渐超越了原来流行于北京宫廷和上流社会的昆曲，取代了昆曲垄断权。

1828年，湖北的“楚班”来到北京，演出以西皮腔为主的“楚调”，也叫“汉调”，常和“徽班”同台演出。这样，既有二黄，也有西皮，统称为“皮黄”戏，也就是后来的京剧。

“皮黄”戏在发展过程中，博采众长，从剧目、唱腔、表演、锣鼓等方面，广泛吸收了昆曲及各地方剧种的长处，生命力越来越旺盛，超过了“徽调”、“楚调”和其他剧种，一跃而成为全国观众最多、影

响最大的一个剧种。

京剧，作为一个剧种，从乾隆80岁生日算起，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从演古装戏到演现代戏，从单纯的民族乐器伴奏到引进西方乐器伴奏，日益兴旺发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

乾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他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史称“乾隆盛世”。乾隆数度下江南，体察民情，被传为历史佳话。在察访中，由于他素来喜欢看戏剧，被南方的戏曲所倾倒，在他80岁寿辰，召全国各地戏班进京，欢庆升平，才得以实现“四大徽班”相聚京城。因此，京剧的诞生，与乾隆皇帝有关，这也是他对中国戏剧艺术发展所做的贡献。

## 乾隆皇帝和京剧诞生

石林  
翟惠军

## 历览前朝兴衰事，成由勤俭败由奢。

——陈毅

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春秋以来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国力之强大，国土之辽阔，统一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但它只存在了 14 年，于公元前 207 年被大起义的浪潮所吞没，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它仅是一个瞬间。秦国的军队素有坚甲利兵之称，灭六国势如破竹，击匈奴，降五越所向披靡。如此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仅生存了 14 年就寿终正寝？难道人民希望战乱吗！

春秋战国以来，人民历尽分割割据混战之苦，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当秦国在客观上代表了这个历史进步的要求，进行统一战争时，“民莫不虚心而仰上”（贾谊《过秦论》），人民对统一表现出真心的拥护，希望统一后生存环境有一个较大的改观。然而，以秦始皇和秦二世为首的秦朝统治集团的所做所为，大失人民所望，生存环境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急转直下，全国人民被推到了死路上。陈胜、吴广在酝酿起义时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这段话发自肺腑，反映了当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心理状况。

以秦始皇、秦二世为首的秦统治集团是秦朝早夭的罪魁祸首，他们政治不廉、穷奢极欲、滥施暴政的为政作风是秦朝短命的直接原因。

秦始皇统一中国，堪称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可他却自恃功盖三皇五帝，所建业绩能“传

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统一之后，不是“安土息民，以待其敝”（贾谊《过秦论》），而是殚尽天下之财，以逞个人一时之私欲。秦始皇本来就是一个“少恩而虎狼心”（《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人，他的穷奢极欲随着统一战争的胜利而恶性膨胀。

秦都咸阳和故都雍，本来就有不少宏伟的宫殿，但秦始皇在灭六国的战争中，每灭一国就仿照被灭国宫殿的式样在咸阳再修一座。灭六国后，又大修宫殿。其中最大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阿房宫。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史记·秦始皇本纪》）。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在这些数不胜数的宫殿中，充满了供秦始皇享乐的姬妾玩好。“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三辅旧事》）。

秦始皇统一之后，征发刑徒七十余万在骊山为自己修造早已开工的陵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该陵墓“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观奇器珍怪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史记》的这个记载决没有冤枉秦始皇。近年来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其规模和精美程度为全世界所折服，而这些仅是秦始皇陵墓整个工程中较次要的一部分，由此完全可以想见其陵墓核心部分的豪华宏现。

秦始皇被胜利与享乐冲昏了头脑，不由得又做起了长生不老

#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

● 孔茂山

美梦。他不惜巨金四处请方士为之称求仙人不死之药，寻不死之药先后费金“以巨万主”（《史记·秦始皇本纪》）。巨金是费了，但长生不老药终不得有。秦始皇听信方士的胡言，“所居宫母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可得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秦始皇“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达到了如此荒诞的地步，他怎么能率领属僚官吏清廉治国，为政勤勉！在秦始皇身体力行的带动下，秦统治集团中的成员们也都是恣其所好，竞相享



乐。他们占有大片土地和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宫室，车马，衣服豪华秀丽。

秦朝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再加之修长城，击匈奴、开南越，需要大量的物资来支持。因而，秦朝赋税徭役特别苛重。“口赋、田赋，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一般自耕农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产品被政府掠夺去。力役“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粗略的估计，当时全国人口约两千万。其中有200万以上的壮劳力要脱离正常的生产去服军役和其它的杂役。这种不考虑人民承受能力的赋税徭役，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汉书·食货志》），农民破产，社会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的负担能力有限，而秦统治者贪欲难平。为了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膏血，秦统治集团采用了严刑峻罚。

秦统治集团非常重视法律建设，在轻罪重罚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建立了一套细密完整的法律。人民摇手犯禁，动辄陷刑。秦二世甚至以杀人众者为忠臣。各级官吏都成了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例如，范阳令“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斫人之首甚众”（《汉书·酷吏传》）。整个国家简直是一个大监狱和大屠场。“赭衣断道，圜墙成市”（《汉书·刑法志》）“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史记·李斯传》）。秦始皇死后，他的儿子秦二世是一个昏庸之辈，他没有秦始皇灭六国的雄才大略，却有胜于其父的残忍。秦二世有兄妹数十人，他先后杀了二十余人。在埋葬秦始皇时，命令秦始皇后宫女子凡无子者，均须殉葬；在秦始皇下葬时，把在墓中工作的工匠全部埋于墓中。如此一个杀人狂作为秦王朝最高首领，他能干出的事情恐怕

是不言而喻了。

秦王朝的奢侈暴虐远不只是以上那些，然而以上所述已足以看清秦王朝统治集团的为政风格。秦王朝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把人民推上了绝路，也把他们自身送上了断头台，使本来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王朝早早地夭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秦王朝统治集团为什么敢如此奢侈暴虐？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主阶级本性的制约。地主阶级是中国继奴隶主阶级之后的第二代剥削阶级，它的产生、发展和存在都是建立在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之上的。以秦始皇和秦二世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在取得全国政权时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被从前特殊环境压抑的劣根性猛烈暴发，认为“燬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汉书·食货志》）是他们打天下应得的报酬。尉缭曾说：“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这句话果然没错，秦始皇的行为给了最好的证明。

第二，迷信天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生。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所谓的“终始五德”是战国末年阴阳五行家邹衍用金、木、水、火、土来解释历史的变化，认为每一朝代都占一德，五德相克。尧舜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在孝公猎获一条黑龙，所以秦为水德，而水是能克火的，秦代周是必然的，是上天的意志。因水是黑色，礼服、旌旗都用黑色；因为水主北方为阴寒，刑狱峻严；因为六是水德相应的数，符的长度、法冠高度为六寸，车舆为六尺，乘六马。秦始皇这样

做的最终目的是要用五德说来神化他的权力。为神化他的权力，秦始皇还亲自登泰山举



行封禅大典。秦始皇在神化其权力的同时也欺骗了自己，对他的权力来自天确信不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自然地会有恃无恐，随心所欲。大修宫殿、骗山陵也好，残酷搜刮掠夺也好，无不与天命观有联系。

第三，崇尚刑罚。《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秦朝统治集团认为，刑罚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作了许多残酷野蛮的蠢事，甚至对文化进行疯狂的摧残。公元前213年，根据李斯的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除秦记以外的史书，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统统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种树之书。同时规定，谈论诗、书者杀头，官吏知而不检举者与同罪。秦始皇焚书，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浩劫，而且还使春秋末叶以来百家争鸣，自由思索的风气受到了致命打击。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秦始皇敢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对待文化，说明其对刑罚的崇尚达到了何种程度。

人民希望统一，拥护统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始皇本人也有雄才大略，秦朝确实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王朝。然而秦朝统一之后，统治集团不讲廉洁安民，相反却穷侈极欲，滥施刑罚，使一个有前途的王朝早早地夭折了，这不仅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也使秦统治集团自身过早地进入坟墓。

凡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对张辉瓒的名字并不生疏，可是对他的生平、劣迹也许不甚了了，本文用生动的笔触向您介绍张辉瓒被活捉的经过和如何被处决……

## “剿共名将”张辉瓒的“辉煌”与哀伤

□ 冯都 肖晓松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来到江西宁都县北部的一个村庄宿营，一天夜晚，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在一盏青油灯下疾笔抒写的烱炙人口的词篇——《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翻开中国现代史，人们知道，1930年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4万余人，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江西永丰县南部龙冈地区，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围剿”军主力——第18师两个旅和师直属队，共9000余人，活捉敌江西全省剿“匪”总指挥、师长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决定性胜利。那末，张辉瓒是何许人？他是怎样被红军生擒的？随后的归宿如何？

### 投身行伍

张辉瓒，号石侯，1885年生，湖南省长沙县人。其父张俊丞，在长

沙金井镇与人合伙开作坊时，发了横财，便购买田地，逐渐成为地主。他有3个儿子，在同堂宗族里，大儿子排行第三，二儿子排行第五，三儿子张辉瓒排行第八。张辉瓒从小娇生惯养，生性暴戾、刁滑、凶狠、目中无人，故人称“张八爷”。

张辉瓒幼年在家念私塾，青年时代在清朝开办的长沙“江南陵军学堂”读书，又是保定“北洋军官学堂”第一期学生，1908年被公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

张辉瓒在日本期间，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对袁世凯尊孔复古，出卖领土主权，复辟帝制等倒行逆施深恶痛绝，遂联络国内外的同乡、同学、同事开展反袁活动。回国后，得知袁世凯出重赏捉拿他，便躲回湖南，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军人拉起一支独立武装，充当游击司令。护国运动期间，湘系军阀谭延开与国民党右翼赵恒惕、程潜，在湖南组织湘军，张辉瓒遂成为谭派重要人物，1917年任第四区守备队司令。

护法运动期间，湖南军人分为拥谭和拥程两派。谭延开宣布自

治，以国民党为背景的程派军人起而反对。1920年11月，谭延开被程派军人赶出长沙，由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赵仍推行联省自治方针，又遭程派反对。张辉瓒为谭派“军师”，由其出谋，帮赵恒惕将程派核心人物捕杀，其他程派军人化装逃走。从此，湖南政权完全落入赵恒惕之手，湘军被改编，张辉瓒任第四混成旅旅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1925年7月，在苏联顾问建议下，国民政府整编军队，入粤湘军改编为第二军，军长谭延开，辖第四、五、六师和教导师，张辉瓒任第四师师长，辖3个团。1926年7月，张辉瓒率部参加北伐战争，临时划归朱培德指挥，驻守攸县，监视江西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军。9月初，北伐军主力指向江西，张辉瓒师改为右翼军，协同朱培德第三军出醴陵，进攻袁州，会攻南昌。经反复争夺，11月7日，北伐军攻克南昌。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加剧。1927年初，宁汉分裂期间，张辉瓒师（军长已改为鲁涤平）为骑墙势力，既不属于宁，也不倾向汉。6

月，宁汉合一，唐生智支持汪精卫，张辉瓒则反汪，协助李宗仁打败唐生智，一度驰名东南各省，被吹嘘为“铁军”。大革命失败后，鲁涤平投靠蒋介石，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辉瓒率部驻长沙。

张辉瓒爱打猎，爱打扮，不喜欢喝酒。他矮而胖，圆脸，体重150斤左右，性格好静，喜欢睡懒觉。他早上起床先是打一个哈欠，然后脚往床旁凳子上一搁，副官便连忙跪下一条腿蹲下身子替他扎绑腿。他经常穿一身崭新军服，肩上斜挂皮带，脚穿黑皮鞋，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脚步沉重而急促，显得威武。

张辉瓒爱讲排场。他的特务连士兵都配有一支“自来得”手枪，枪柄用金红丝穗，马刀柄上都系有蓝绸制的国民党小党旗，身穿崭新的灰色军服，十分整齐。这些特务连的士兵，就象“御林军”一样，装备待遇与众不同。张辉瓒外出从不走路，不是骑马就是坐轿。他规定师部大门口须站4个卫士，楼梯上下各1个，房门口又1个，一共7个卫士，戒备森严。

张辉瓒趁国民党军队经费是长官包干使用之便，虚造名册，进行贪污。他还常常克扣士兵军饷，使下级士兵一连几个月领不到军饷，连抽黄烟的钱都没有，士兵们对此敢怒不敢言。

张辉瓒对主子谭延开和鲁涤平，言听计从，忠心耿耿，毫不动摇。对蒋介石不信任非嫡系部队的做法不满，但又无可奈何。1928年，蒋介石借缩编军队之机，排斥异己，鲁涤平第二军被降为第十八师，张辉瓒师降为旅。对此，张辉瓒扬言要解甲归田。

当时，控制两广、两湖的桂系军阀，排挤、打击亲蒋的鲁涤平和张辉瓒。1929年2月，桂系军阀借口鲁涤平“剿匪不力”，免去其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由何健继任，并派兵入湘解决其所属部队。鲁、张闻讯，率部走平（江）浏（阳），退到江西高安。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对鲁、张极力拉拢，一面派员携慰劳书及现洋3万元慰劳，一面提升鲁涤平为第五军军长，辖第七、十八两师，张辉瓒为第十八师代师长。对此，张辉瓒感激涕零，发誓要效忠蒋介石，打倒桂系。4月18日，张率部首先攻入武汉，赶跑了桂系军阀，为蒋介石赢得胜利立下头功，得到蒋的嘉奖。

1929年8月26日，张辉瓒率

部离开汉口，开赴江西，出任南昌卫戍司令。9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鲁涤平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因规定政府官员不再兼任军职，故命张辉瓒继任第十八师师长，蒋介石为刺激非嫡系部队为他卖命，授予张辉瓒中将军衔。

### 反共先锋

张辉瓒身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和南昌卫戍司令要职，坐镇南昌，充当反共急先锋。他在全省各地严禁革命活动，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统计，在他任职期间，全省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1000余人，震惊全省，人称“张屠夫”。同时，他秉承蒋介石旨意，指挥所部加紧“清剿”工农红军。

1930年1月3日，张辉瓒所部成光跃第148旅由吉安分三路进攻永新红军袁文才、王佐部，又令戴岳52旅分路进攻弋阳漆工镇恩盘山红军方志敏部。3月2日，红军围攻吉水县唐云山旅时，张辉瓒派2个旅增援解围。

蒋冯阎大战爆发后，驻赣蒋军大都北调，只剩下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唐云山的一个旅，以及金汉鼎一部。3月，蒋介石任命张辉瓒为江西全省剿“匪”总指挥，规定所有驻赣部队由其调遣，担负全省“防务”。张辉瓒受宠若惊，亲赴吉安、吉水等地指挥“清剿”。入夏，桂军北上，援助冯阎，十八师合力堵截，红军乘虚围攻南昌，鸣枪示威，张辉瓒兼任南昌戒严司令，亲督师直属队星夜修筑工事，环城死守。



张辉瓒像

1930年10月4日，红军占领吉安，使赣西南苏维埃区域35县、400余万人口的广大根据地联成一片。工农红军的迅速发展壮大，严重威胁蒋介石的统治。为此，蒋介石在攻下郑州后匆忙结束军阀混战，决定调集兵力，对红色区域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重点对准江西中央苏区，把湘、鄂、赣苏区和赣东北苏区作为两翼进攻，希图一鼓荡平。由于当时在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只有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和独立第十四旅，共2万多人，兵力远远不足。蒋介石就下令调遣在陇海路的第五十师入赣，又调集在湖南的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由株萍路进入江西，组成国民党第九路军。到10月下旬，江西境内的国民党军猛增到7个师1个旅，共7万多人。后来又增加到11个师2

个旅，共10余万兵力。

11月2日，根据蒋的旨意，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令将在赣的7个师、1个旅编成三个纵队，以张辉瓒为第一纵队司令，谭道源为第二纵队司令，罗霖为第三纵队司令，准备向赣西发动进攻。这时，鲁涤平接到探报，红军全部集中在袁水流域，便正式下达第一期进剿命令，规定11月10日前各师先行集中，16日开始向袁水流域合围。按照计划，张辉瓒率部开抵樟树，向两翼击前进。

然而，红军总前委已在新余罗坊召开了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红一、三军团主力按照总司令部11月1日在新余县园前村发布的“纵诱敌深入赤色区

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进行战略转移，先后在5日和6日浩浩荡荡东渡赣江，在新干、吉水、永丰、宜黄、崇仁、南丰、南城等县发动群众，筹措给养，训练部队，使鲁涤平袁水流域合围的计划成为泡影。

鲁涤平获知红军已东渡赣江，心神不定，部署各师从11月8日起，运用“分进合击”战法，分头渡江，尾追红军。因此，张辉瓒率部于11月19日到达指定位置，占领永丰。

张辉瓒就任永丰县“剿共清乡

委员会”主任后，实行法西斯统治。他规定在军队中实行“连坐法”；将四周一日之行程内的小股红军全部肃清；在地方上建立保甲制，恢复各地的白色政权；密令地方保安团和守望队加紧镇压群众革命运动，以便为尔后的进攻扫清障碍。他还率鲁涤平电令，指派53旅副旅长洪汉杰进行检修临时飞机着陆场，每日抽派士兵千余人加紧施工。后因机场规模太小，不能使用而被迫停工。

坐镇南京的蒋介石，深感各地“围剿”红军的进度太慢，为了实现其11月25日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三个月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幻想，决定离开南京，巡视赣、鄂、湘三省的“剿共”军事情况，督促各地加速进剿。12月7日，他在南昌主持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各省党部和各师的主要官员。蒋介石在会上批评他们在一个月里没有切实合作，致使第一期进剿计划未能实现。当他得知吉安县东园一带驻有红军的消息，判断红军似有东园作战之企图，于是以总司令的身份，下达第一号作战命令，决定实行第二期进剿计划——会攻东园。为了加强对进剿军的统一指挥，还特别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全权指挥在赣各军。

张辉瓒系鲁涤平的心腹，鲁涤平希望张能在此次“围剿”中有所建树，为将来接替自己打下基础。为此，特给张委以第九路军前敌指挥官，负责指挥前线的九路军主力第十八师、第五十师和新编第五师。

张辉瓒受命后得意忘形，神气十足。他认为，红军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而第十八师装备好，老兵多，训练长，能征惯战，曾被誉



张辉瓒妻朱性芳像

上蒋介石现在对他很器重，更使他感恩不尽。他在出发时对官兵发誓说：“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愿吾汝辈共勉之！”他还用金钱作诱饵，鼓动士兵卖命：“红军主力集结在东固，只要一举攻下东固，红军就完了。”“东固建有银行，打进东固山，金子银子用箩担，打到东固去，发财归自己。”

根据命令，会攻东固各师于12月16日纷纷开始运动。张辉瓒师非常卖力，进展迅速。17日，张师进至永丰县罗坊（现三坊）后，下令休息一天，许多官兵在罗坊至潭头一线肆意骚扰和抢劫群众财物，宰杀牲畜，引起当地人民的恐惧和反感。

第二天，张辉瓒率部向东固方向攻击前进。19日晚，张师分别到达东固附近的火凤坑、九斗湾、上下坊一线宿营，准备次日一举攻占东固。20日清晨，大雾弥漫，张辉瓒判断红军在东固周围可能铺设了地雷，便派工兵营作前卫。工兵营士兵行到东固，一直未发现地雷。突然间隐约发现对面山上有哨兵，便开枪射击。对面也开枪还击。战斗越打越激烈，双方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张辉瓒见火攻不下，以为一定是遇到了红军主力，便亲自上前，调来迫击炮朝山上猛轰。过了一会，对面山上传来了号声，张辉瓒侧耳一听，原来是国民党公秉潘新编第五师（后改第28师）。结果，双方伤亡甚重。

东固误战，加深了张、公二人成见，张辉瓒认为公先到东固不告诉他，是对他的蔑视；而公秉潘则看不惯张的专横跋扈，全师带往富田地区，脱离了张的指挥。

东固镇，几百户人家，附近山谷里还有几十处零星的小屋群。张

辉瓒占据东固后，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对无辜的东固人民进行大屠杀，并将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东固医院和平民银行焚烧无遗。他的这种法西斯行径，激起了东固人民的无比愤慨，导致了他后来的可悲下场。

### 兵败龙冈

鲁涤平在弄清占领东固的详情后，方知是红军主动放弃东固，但是，他仅认为红军这一举动是“避硬仗，欺小敌”的一贯战法，因此仍下令各师继续深入红区。12月29日，鲁涤平得知红军主力集结在宁都县北部之黄陂、小布、麻田、砍柴冈、东山填、钩钵等方圆200里的根据地中心时，发布了第三期进剿计划，命令各师统限于1931年1月1日（元旦）拂晓，向宁都北面的所有红军实行聚歼。

12月29日，第十八师作好一切准备，奉命东进向第五十师靠拢，参加元旦的攻击。张辉瓒为照顾其妻兄之子朱耀华，以领取下月军饷和汽油为名，将所部54旅（朱为旅长），留下防守东固，自己亲率52旅和53旅以及师直属队共9000余人，向距离东固60华里之龙冈移动。52旅遵令从南龙村出发，其先头103团午前10时便到达龙冈街，104团正午到达龙冈。

龙冈，东邻君埠，北靠上固，南与兴国县相连，西与吉安县相接，四面峭壁高峰，地势险峻山路崎岖，易守难攻，热闹的龙冈街就坐落在中间的盆地里。街上周围有二、三百户人家，街的西侧有条龙冈河（又名孤江），河的上游，离街不到5里路的地方有一个较大的村子，叫城功村，村子的西面是海拔350米的万功山。这里土地肥沃，苍松红枫和满山的油茶树常年青葱，素有“油米之乡”之称。

龙冈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

统。他们拥护红军，支援红军，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了坚壁清野，积极开展应敌工作，使张师如赴异国，如入陷阱。正如52旅旅长戴岳后来所描述的那样：“29日到龙冈，圩镇铺屋300余家，当时市场上寂无一人，但遥见远山红旗隐约，于是我感到形势相当严重。”张师的官兵们经过一天的行军，走得腰酸腿痛，饿得头晕眼花，满以为到了龙冈可以大捞油水，哪知道翻箱倒柜搜了半天，不仅没有找到半点吃的，柴米油盐一无所有，连锅碗瓢盆都找不到一只。

张师先头部队到龙冈后，即派出侦察，探明东面30里之君埠虚实如何。行到半途的小别村旁拱桥边，与红三军一连化装成农民模样的侦察员相遇，便问：“君埠一带有无红军？”“红军在黄陂、小布一带，君埠没有红军。”红军侦察员机警地答道。“国军已到龙冈，要去黄陂、小布消灭红军，明天请你带路好吗？”张师侦察又问。红军侦察员答应后，发现龙冈街到处都是国民党士兵，便连夜逃脱，跑回君埠报告敌情。

红军原想先打谭道源第五十师，但在小布两次设伏时，谭师死守源头居高临下阵地，不肯出来，故设伏未成。为了转移目标，调动敌人，红军很快离开小布，秘密向西开到君埠寻找战机。此时，毛泽东、朱德得到张师已孤军深入龙冈的消息，果断下定决心，传令4万红军将张师全歼于龙冈地区。

当夜9时，张辉瓒在龙冈街召集副旅长以上人员举行军事会议。会上发生争执，52旅旅长戴岳提议



全师在龙冈停留一天，并建议急电54旅赶来龙冈，一同前往。张辉瓒则坚持己见说：“附近纵有红军，也只是黄公路的那些人。我师人多武器好，怕什么？现在红军主力正与谭师相近，谭道源迭电催援，恐已接触，眼下救兵如救火，应迅速前进，不宜迟疑。本师前去驰援，断于明天继续开拔，各旅须遵令前进，不得延误。”与会者见他态度如此坚决，谁也不敢多吭一声，只好硬着头皮，心惊肉跳地接受了张辉瓒的命令。

30日清晨，龙冈、君埠一带漫天灰暗，群峰雾锁，枫叶霜红，落叶满山，一派“雾满龙冈千嶂暗”的景色。

6时半，第十八师开始向东移动，由52旅黄团作前锋，李团作先行，接着52旅陈团跟上，师部和直属各队走中间，朱团作后卫，浩浩荡荡向君埠开拔。当黄团行了13里路，到达小别村的石拱桥时，即与红三军第7师前卫相遇，战斗由此打响。

龙冈战斗的序幕拉开后，黄团力不从心，借机退往300米远的山坡，被红军击溃。接着李团迅速占领两面高山，用机枪夹击，红三军8师、9师冲上去展开拼搏，双方在木坑一带进行厮杀，白刃格斗。经过一阵肉搏，52旅且战且退。

10时许，红十二军在52旅左侧后方发起攻击，旅长戴岳惊恐万分，感到有被包围的危险，便将战况电告在城功村的张辉瓒，要求53旅立即加入前线。这时，张辉瓒如梦初醒，方知龙冈有红军主力所在，立即飞调东固54旅赶来增援，急电鲁涤平请令公秉藩师火速援救。可是眼下情况紧急，远水难救近火，于是只将52旅陈团向前推进4华里，不作有力支援。戴岳不解其意，问主任参谋陈光枢这是何

故，陈分析说：“师长可能别有打算，如前线胜利则一同前往，万一失败，则率其控制部队退守东固以自保，而不肯努力增援。”

午后不久，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先后从上固、下固一线向龙冈跑步奔袭。这时，张辉瓒才将直接掌握的师直属部队和53旅朱团进行正面应付。下午2时许，红军总司令部发出全面攻击信号，张辉瓒深知陷入重围的后果，一面集中八门重炮和几百挺机枪，利用龙冈河的天堑进行猛扑，一面部署向万功山方向突逃。由于红军愈战愈勇，张师各部乱作一团，指挥失灵。不久，红军捣毁了十八师师部，活捉了师代参谋长周维黄、104团团团长李月峰、特务连连长张达泉。国民党南京交通兵团派驻张师的一部15瓦无线电机及其电务人员企图越山突逃也被捕获。在混战中还先后打死了52旅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朱先志。张辉瓒见势不妙，盘算如何逃走，53旅旅长王捷俊化装士兵后，蒙混在俘虏兵中被生擒，只有52旅旅长戴岳用欺骗手段在龙冈逃脱。这样，号称“铁军”的十八师全面崩溃，残兵败将纷纷退往万功山下的毛家坪向红军缴械投降。全师9,000余人全部被歼，进犯龙冈以惨败告终。

#### 被俘受审

枪声停息，红军在清点俘虏兵时，未见张辉瓒。原来他为了保全性命，临阵仓卒化装，急急忙忙脱下中将官服，穿上士兵军服，裤子来不及更换，仍穿着黄色哗叽裤，帽子也忘记戴，就抓起狐皮大衣，登上轿子，企图只身逃回东固54旅。那知两位轿夫刚刚抬上山路几步，就弃轿逃走。张辉瓒只好孤身一人朝山顶爬去。当他来到半山腰一片油茶树林的土坑边，听到山下枪声大作，不由一惊，本想暂时躲

躲再说，但红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声此起彼伏，他抬头一看，只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已占领了山顶。张辉瓒顿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又急又怕，扔掉身上大衣，不顾死活地钻进了土坑，准备趁夜色越山西逃。

几个打扫战场的红军战士搜索到这片油茶林，突然发现有一件狐皮大衣，立刻惊叫起来：“这里一定有人！”有个战士拿起大衣翻来复去看了又看，结果在一块指头宽的红牌子上看见“张辉瓒”三字。战士们又兴奋又紧张认真搜索，双眼紧紧盯住四周，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正在这时，身子卷成蛤状并紧贴着土坑壁上的张辉瓒，吓得浑身发抖，哆嗦不已，弄得遮掩土坑口的茅草沙沙作响。战士们犯了疑，眼下风平浪静，山谷寂肃，哪里来的响声？就朝土坑口走去，一个战士用枪慢慢将茅草拨开，突然发现了他的。“你是谁？快出来！”其他战士闻声赶紧围拢过来，几支枪口一齐对准土坑，厉声喝道：“快出来！”可是他不肯动弹，两手抱着头缩成一团，不停地筛糠。战士们火了，将他猛地拉了上来，摔在一边。啊，肥头胖耳，肚子挺挺，矮矮敦敦，脚穿皮靴。战士们见此模样，又气又好笑，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我，我是书记官。”一战士抓起大衣狠狠摔在他面前，愤愤地说：“什么书记官，还不老实，这不是你的么？”张辉瓒感到再也瞒不过了，低着头轻声说：“我是张辉瓒。”

战士们将张辉瓒捆绑起来，押往龙冈街。这时，纷纷回到龙冈的群众，在街口把张辉瓒团团围住，争先恐后看他的狼狈相。这个叫：“你们看，这个矮胖和尚的脑后还有一块痢头疤呢！”那个嚷：“他穿着士兵棉袄，裹着大肚皮，还想化

妆溜走，可是他象一个笨猪，连这条黄呢子裤和长筒黑皮靴也来不及换呢！”在一阵阵轰然大笑声中，有人编了一首歌，用赣南采茶曲调唱着：“龙冈小圩场，红军打胜仗，活捉张辉贇，全师被缴枪！”

俘虏兵也围过来了，纷纷指着张的鼻子骂道：“你这个老贼，死死扣压我们的军饷，害得我们连抽黄烟的钱都没有！这回我们不怕你了，我们要跟你算帐！”骂着骂着，上去就是“啪啪”几巴掌，打得张辉贇直躲闪。

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赶到龙冈街，见俘虏兵在打张辉贇，连忙进行劝阻，并吩咐松绑。朱总司令责问他：“国民党为什么要派十万大军围剿红军？你们十八师是怎样执行蒋介石旨意的？”张辉贇却傲慢地说：“你们红军要我出多少钱才放我？”朱总司令见他这种横蛮态度，便严肃地斥责道：“我们不是来做生意的。你带头围剿红军，侵犯根据地，革命群众决不会饶恕你。我们要代表人民的意志，在你自己的部队面前开会严厉公审你。”张辉贇无言以对，低着头不停地眨动双眼。

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毛泽东也从黄竹岭红军指挥所赶来，路上亲见人群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活捉张辉贇啦！前面捉到张辉贇啦！”张辉贇在北伐时与毛泽东有过交往。这回见到毛泽东连忙敬礼，双手拱拢，口称：“润芝先生！久仰，久……”“‘总指挥’先生，你是怎样指挥的呀？你从湖南到江西，又从南昌到龙冈，今天就叫你进到龙冈为止啊！你气势汹汹叫嚣要围攻我们，你可没有想到红军的厉害吧，你的‘围剿’反而被我们给围剿了。你在东固搞‘三光’政策，我们没有会到面，想不到今天在龙冈见到你，你还想怎么样了？

你在龙冈墙壁上到处写反动标语，要剃朱、毛的头，现在到底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在毛泽东那幽默诙谐却攻势凌厉的审问下，张辉贇面如土色，连说“有罪！有罪！”他非常害怕红军杀他，苦苦求命，一再表示只要免他一死，情愿捐款、捐枪、捐西药赎命。毛泽东便向他宣传了红军的政策，同他席地而坐，询问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并给他讲解了当前的形势和革命的道理。

### 魂归岳麓

红军活捉张辉贇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在国民党军界掀起轩然大波。鲁涤平伤心地说：“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未还。”陈诚在南京到处游说：“十八师送了九千多支枪，连个收条都没有得到。”蒋介石气得大骂：“十八师失败不足为怪，一败即馁，何鼠胆乃尔！你们每闻共党便张慌失措，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其实，蒋介石比谁都痛心。一方面他失去了一名得力鹰犬；另一方面他明白，国内外舆论都会拿这件事做题目，讽刺自己拙劣无能，拥有精锐武器还损兵折将，吃了败仗。这对巩固自己的地位是极为不利的。

张辉贇的妻子朱性芳得知其夫被红军活捉后，通过各种关系，想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用巨款赎回其夫。蒋介石也曾派人送信，要求释放张辉贇。作为回报，他将释放大批在押的“政治犯”并愿以20万元相赠。

当时，毛泽东、朱德根据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想把张辉贇放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大学训育系（即俘虏兵转为红军后派去学习军事的一个系）当教员，不料，一些受了“左”倾思想影响的人，却将张解往东固进行批斗。

1931年1月28日，东固地方

政府召开公审大会，东固及附近的群众纷纷赶来参加，聚集了三千余



人。广大群众对张辉贇在东固大搞“三光”政策，恨之入骨，争先恐后上台控诉其滔天罪行，强烈要求苏区政府为民除害。会后，张辉贇在一片怒吼声中被枪决处死，接着被人把首级割下。

当地一些群众对张辉贇被杀仍不解恨，将他的头放在一个做好的篾笼子里，用布盖好，并插上几面三角小白旗，小旗上写满了他的罪行，然后在附近祠堂里找了一块“张氏宗祠”大横木匾，将笼子放在匾上，用毛笔书写“这是张辉贇的首级，送给鲁涤平”字样，由几个青年轮流抬到百里以外的值复村，丢入村旁的滔滔赣江，让它顺流漂到南昌去。

2月2日，大雨倾盆而下，寒气袭人。驻防吉安城的国民党第七十七师哨兵，在赣江中看见远处漂来一块上面插着旗帜的木板，觉得奇怪，便派渔船在神岗山附近打捞上来，连忙逐级报告坐镇在吉安城指挥的鲁涤平。鲁邀张辉贇的同事和亲友一同辨认，在确认是张的首级后，鲁等声泪俱下，痛哭不已，并将首级抬到第九路军总部。鲁立即拍加急快电给蒋介石，又去电长沙要何键派人来接运首级。次日，鲁乘飞机飞往南昌，向在南昌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此事，又向留守南昌的十八师补充团官兵进行通报。

2月6日，第九路军总部派船只从吉安专程护运首级抵省，未上前线的第十八师参谋长肖文铎等人前往河边迎接。何应钦、鲁涤平

命所部买了几段整块大楠木做棺材，聘请南昌雕刻名家，雕手刻足做身子，将头装上去，棺椁用蓝缎包裹，规定从8日起照陆军仪式大殓，命第十八师残部和补充团全体官兵臂佩青纱哀悼。

2月23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在南昌成立“张公治丧事宜事务所”，由肖文铎任事务主任，林昌武等11人为副主任，下设文书组、庶务组、会计组、礼仪组、警卫组、招待组。公祭时间定为3天，3月1日为党政界公祭，2日为学绅工商各界公祭，3日为军警界公祭。追悼大会会场设在“顺宜”会馆，横匾上书“章贡波寒”四个大字，门首挽联是：“先軫归元千古仰，文山气节两间存”。

国民党利用“公祭”进行各种活动，强令各界群众参加“哀悼”。如3月1日，动员3,000余人参加，由鲁涤平宣读祭文，花圈的缎带上写着：“为国殉难，精神不死”字样；2日增至10,000人，由蒋介石派来的代表宣读蒋的祭文；3日又是10,000多人出席，宣读了何应钦的祭文和第十八师全体残兵败将的祭文。这些祭文都狂热地把张辉瓒打扮成一个“不朽的英雄”。

3月4日为出殡日，鲁涤平下令南昌全市下半旗致哀，各界放假一日，并规定棺材在主要大街上经过时，不准车马通行。在牛行火车站备有专列火车（花车）护运至九江，行前急电武汉行营派专车来九江迎接。起灵时，鸣礼炮17响，以示“哀悼”。

棺材运到汉口后，张辉瓒的妻子、儿女、亲友及各界官僚都赶到码头接运，随即安放在汉口徐家棚。3月5日至6日，武汉各界亦举行“公祭”。

接着，棺材又由其亲友护送，乘火车运至长沙，设立“灵堂”，请

了8个道士，做了7天7夜的道场，最后安葬在岳麓山半山腰处。由于棺材四周密封，又用蓝缎包裹着，张辉瓒的亲友一直未能见到张的真面目。

张辉瓒之死，蒋介石十分痛惜，以优资抚恤，每月还有约200元抚恤金发给其家属（直到抗战时才停发）。同时国民党在长沙岳麓山公园半山亭，用巨款修建了全套永久性“纪念”标志。其中有用麻石砌成的横跨1丈3尺的牌坊，用麻石建造的直径1丈的六角亭，300平方米砖混结构的寺庙（墙内设有花园）和占地面积50平方米的水泥圆墓，青石墓碑为高6尺、宽3尺、厚8寸，正面有蒋介石“魂兮归来”的题字，背面刻有张辉瓒生平简介和家属姓名。

1934年冬，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军卷土重来，占领东固。张辉瓒大哥的儿子，原十八师军需处军械股股长张远泽（龙冈之战时在南昌未上前线），被朱性芳派遣去东固，要找回张辉瓒的骨头（此时朱已知墓内是假尸体）。可是，哪里去找呢？张远泽便在东固捡了几根骨头，回长沙用一尺见方的盒子装好，埋在张辉瓒的碑石下面了事。

上述这些所谓纪念性墓志都是用优质麻石和琉璃瓦建造的，虽经数十载风吹雨淋，依然“壮观”。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得悉后登上岳麓山，将张辉瓒的水泥圆形墓彻底推倒，砸得粉碎，各处书写的字迹，除亭子上尚看得“浩气长存”的残迹外，均被刮得干干净净，荡然无存。现在，纪念亭被当作公园游人憩息的场所，寺庙内也已住进了居民。生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死后被吹捧为“反共英雄”的中将剿“匪”总指挥张辉瓒，到头来不仅落得身首异处，最后又魂归无所！

笔者再将张辉瓒家室的有关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张辉瓒妻子朱性芳，比张大1岁，47岁守寡，无文化。原随夫住南昌“东升巷”，张带兵赴龙冈，她仍在南昌。张被红军活捉后，她离南昌去汉口亲戚家。后来随张的官枢回长沙，不久将所得抚恤金买田地，雇佃农民耕种，以对半交租计算，她每年可收稻谷800多担，同时还放高利贷。她家长期雇佣4个长工，即收帐1人，种菜1人，做饭洗衣1人，上城办事1人。湖南解放，实行土改，她划为地主，先在天津儿子家住了8年，后在上海女儿家住了10年。1968年12月，湖南红卫兵从上海把她揪回长沙批斗时，已是84岁的老人了。1970年3月，她因心脏病复发去世，安葬在湖南长沙县本籍。

继子张远渠，系张辉瓒哥哥所生，因其父早逝，4岁便到张辉瓒家做长子。1925年去德国汉堡大学学医，留德12年，从事儿科研究。张辉瓒被杀时，他正在德国求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回国教书，以后在长沙开私人诊所。解放后任长沙第一医院儿科主任。

生子张远谋，1930年随军在南昌念书，小学毕业。其父被杀后在湖南读中学。抗战时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攻读化工专业，后来赴法国留学，又转赴美国进修，获“科学硕士”学位，在美任“中国同学会会长”。1949年回国结婚，加入民盟，任天津大学化工系教授，参加过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

生女张远仪，1930年张辉瓒被捉时才8岁，长大后随哥去昆明，在昆明读完高中，接着又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攻读英语，抗战结束后又在北京清华大学续读英语。因身体不好自动离职，尔后随夫在上海定居。（编辑 陈贻林）





公元

1793年，即清乾隆58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东方第一大国的中国和西方最先进的英国，第一次正式进行国事接触。

这两个最富代表性又以完全不同方式生活的国家，尽管一个是眯瞪昏睡、狂妄自大的封建王朝，另一个是拍岸激浪、向外拓展的资本主义政体，但它们却以一个皇帝的寿辰为契机进行直接交往，并以西方人深感惊讶的方式开始和结束，从此掀起了中西方经济贸易、政治文化等种种波谲的机缘，其丰富的交往过程又恰恰证明这是编年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这年8月6日，离天津城几十公里处的大沽口岸，发现了一支庞大的装备最先进的舰队，其中有装备74门大炮的大级别战舰“狮子号”。在舰首向岸而立的人堆中没有高领制服的戎装将军，而是佩星披带绣花天鹅绒官服的英王使臣。为首的特使马夏尔尼爵士已经56岁，他是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毕业的硕士，27岁就任驻俄公使，后又是英王统治印度的马德拉斯总督。与他并立站着的公使斯当东，是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和医学硕士，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他俩身后近百名随员中，有园艺师、军事家及各种科技专家，还有手持毛瑟或连珠枪列成受阅队形的数十名轻骑兵。紧随“狮子号”的“印度斯坦号”战船上，装有整整600箱准备敬献给乾隆皇帝的英国礼品。

这个从规模到行程堪称史无前例的外交使团，显然也满载着与

当时大英帝国地位相称的使命。除庆贺乾隆的“万寿”外，还要“平等地”与中华帝国互派使节，谈判并签定两国贸易协议，要求在北京驻使与设立货栈，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口岸通商，在广州等地划分一处地方供英商使用，准许英国商人按中国所定税率纳税等。他们要给中国提供一次了解西方强国的机会，携带了不少体现英国乃至欧洲科学技术水平的礼品，包括天象仪、地球仪，反射望远镜，太阳系仪，天文钟和铜炮，榴弹炮，连珠枪，大型战船模型等，英国人希望通过这些礼品向中国充分显示其科学技术及军事实力，希望清廷皇帝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今天看来，这些本属双方做生意的必然前提，也就是两个国家间进行贸易的起码条件。清朝则认为，这是外夷子民通商唯利是图的“阴谋”，堂堂天朝根本不需西夷的钟表大呢羽毛之类。允许远道乞求通商设站的西夷们入关，本身已经是一种恩典。

马夏尔尼特使尽管途经澳门时就听到一些西方商人悲观的忠告，但他心中仍然充满希望。因为这是对中英双方都育利的事件。他决心用当时最先进也是最珍贵的礼品，撞开中国这扇绿锈斑驳的大门。

如果说马夏尔尼使团的到来，构成了以中国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这种一个日益强大的西方殖民帝国向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挑战，从历史命运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新兴资本主义向老大的封建主义的挑战，是给清明提供了一次应战的机会。

18世纪末，尽管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于欧洲，但马夏尔尼使团来华时期，中国正经历着乾隆盛世，马背上的滴滴骑兵不仅跳下

# 大英帝国与东方睡狮的初次碰撞

——英国马夏尔尼使团来华二世纪反思

葛承雍

来接管了汉人的大片河山和亿万库藏，而且把明王朝复辟的幽灵埋在了云南边山和台湾海峡。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小马褂、长辫子、红顶子，稳坐龙墩的乾隆皇帝自然是高枕无忧了。他不仅写诗作画六下江南，跑到扬州妓院戏弄红颜，而且在登基的第21个年头上（1756年），谕旨关闭他爷爷康熙皇帝曾于1684年开禁的沿海通商口岸，把红毛夷子洋船一律赶往澳门、广

州了事。乾隆皇帝当然更坚信大清国有能力应付外来挑战，君临万国，恩及四海、何惧小小的洋人！

于是，他下旨恩准英国使团进入北京。

英国使团一入境，就与朝鲜、缅甸、安南（今越南），廓尔喀（今尼泊尔）等属国使臣一样，被清廷看作是天朝歌舞升平，万邦威仪臣服的道具。“天朝盛德四海、西夷叆喏利国万里来贡”的皇家告示贴在天津街头，“叆喏利贡使”的旗帜，高悬在从海河换乘的中国船头上。英吉利写成“叆喏利”，是蔑视“夷人犬羊成性”，加“口”字表示不可理喻与天朝的高贵。送往北京贺寿的英国礼物未经英方同意，就被清廷人员打开。英方译员上前说明在特使未将礼物交付皇帝前仍由英方照料。前来迎接的三品钦差大臣徽瑞立刻反驳道：“这不是礼物，而是贡品！”

8月9日，马夏尔尼使团抵达天津时，一公里长的仪仗队和军乐队以及成千上万争睹“红毛人”的 시민，使英国特使感到中国人的文明礼貌，热烈认真。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无意义的排场呢，还是清廷要抓住这个历史性契机走向世界呢？都不是。乾隆皇帝和大臣们并未意识到马夏尔尼使团祝寿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通商驻使才是真正的目的。于是，一场坚持和反对马夏尔尼为藩属国贡使的较量由此开始。

哒哒哒，马蹄声急。英国使团的情况凄折8月10日就送到紫禁城。当翻译在贡单中将使臣译为“钦差”时，乾隆皇帝十分恼怒，挥笔把“钦差”改为“贡使”，以符天朝体制。并批复严格按藩属国使者对待。由长芦盐政临时调来充任钦差大臣的徽瑞接到圣旨后，匆匆带着随从与英国特使开始会晤。

“贵特使的衣服窄小短便，和我们广博大方的长袍相比，似乎是我们中国的舒服一些。”话题从中国服饰异同拉开。徽瑞仔细打量着客人的衣服，又悠悠地接着说：“我们大臣叩见皇上时穿的衣服式样绝对是一致的。”他注视片刻客人迷惑不解的神情，突然指着护膝说：“这种东西缚在腿上行礼极不方便，贵特使觐见时请将它除掉。”

马夏尔尼心里赞叹中国官员说话拐弯抹角的手法高明，嘴上却干巴巴，硬梆梆：“这件小事不用钦差大人费心，我们在自己国家觐见君主时也穿这种衣服，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现在我们打算用觐见自己国家君主的礼节去见中国皇帝，想来贵国皇帝陛下不会强求我们用中国礼节吧？”

“……”徽瑞脸上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觐见皇帝三跪九叩首的礼制必不可免。马夏尔尼的态度软中见硬，表示难以从命。

其实，马夏尔尼对扑倒下跪、额头触地的清朝见君之礼，并非闭目耳塞一无所知。几年前荷兰人为争得与中国通商的许可，跪倒中国皇帝的脚前，曾遭到伦敦舆论的指责。然而，当今“西方海上霸王”的英国，绝不是没落衰败的荷兰，必须坚持外交会见原则：尽可能表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但不能去做任何把英国解释为中国藩属国的事情。

8月20日，英国使团将至北京，陪同的王、乔二人，又一次向英国特使直截了当提出：觐见皇帝礼节，是一件很重大的国事，绝不是区区小事，下跪叩头，这是中国“礼义之邦”常见的法制。他俩说完便当场向着一个方向撩衣跪下，深深地叩头，示范给客人看；然后坚持要求特使学习演示。遭拒绝后，他们要求特使看看，被马夏尔尼不

由通融地制止了，脸色变得非常难看的、王乔二人气得拂袖而去。

8月21日，英国使团住进北京专门接待外交使节的鸿胪寺，徽瑞为了下跪礼节再次亲自出面交涉。马夏尔尼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如果一定要迁就中国宫廷的下跪礼节也行，但中国方面需派一位官阶相当特使的大臣，向英国乔治国王、王后的肖像行跪拜之礼。徽瑞闻此摇首良久。在他多次担任钦差使命的生涯中，第一次遇上如此执拗的“贡使”和这些难以解决的礼仪问题。

这年已经82岁的乾隆皇帝按夏季惯例正在热河（今承德）行宫避暑。他得报后“深为不愜”，但仍气度雍容地准许马夏尔尼使团在北京逗留后向避暑山庄进发，并在距热河3公里处受到殷切接待。同时，英使也受到严密监视，以防其藉词生事，兴风作浪。

行宫外，倾朝重臣、文华殿大学士和坤坐在铺了绸缎的高太师椅上，钦差徽瑞和其他大员垂手站立在后，高鼻深目的斯当东公使庄重地呈上马夏尔尼特使所坚持觐见礼节必须平等的“说帖”。和坤神色冷漠，默然不语，整个会见不足十分钟。

第二天早晨，钦差徽瑞受命再次劝说马夏尔尼特使不要一意孤行，“勉强依照中国礼节”，不必固执“野性”，并明确指出，外国使臣向中国皇帝叩头行礼是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礼仪，你们怎能例外？中国官员又没有跑到你们叆喏利去，向英国肖像行礼显然是不合理的事。马夏尔尼则毫不让步，坚持大洋彼岸独立国家国王所派的正式外交使臣，和中国附属国所派的贡使完全不同，并请徽瑞把礼品单转呈乾隆皇帝，看看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的实力。

当夜，瀛泊敬诚殿后的四知书屋，乾隆皇帝对英使的礼品单一览了之，觉得这些礼品全是无足轻重的“奇技淫巧”之物，根本不能和他写过的四万二千首诗歌相比。礼品单中提及制造技术与安装的艰难，乾隆皇帝斥之为“张大其词”，令人嗤之一鼻。圣上的态度自然给中方官员定了基调，第二天微瑞就给皇帝上奏说：“即使外边的夷都成了奇技淫巧的世界，与大清天朝又有什么关系，反正咱们也不会去那弹丸小国买他的。”

据说，在随后的几日子里，君臣们剪烛夜谈，还讨论英国是否真的富强问题。君臣讨论最后的结论是：[英]哈利不逆是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者。”他们当然不知道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丝毫也未意识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个世界体系之中。

话说回来，对国际背景和格局变化茫然无知的清廷君臣继续误解着马夏尔尼特使的来意，更不知道英帝国在失去北美13个殖民地后，正转向东方采取一系列扩张步骤。关于跪与不跪的谈判，竟然争执了将近一个月。

9月10日，乾隆老人的万寿节。就在这举国上下同贺即将来临之际，礼节争执突然有了转机。或许，乾隆皇帝觉得在自己的“万寿”庆典中，不能少了“夷人”这一标志驾驭世界，外夷诚服的独特仪仗。这天，微瑞为英国使节带来了福音：你们可以行单腿跪地的英国礼节。不过，拉着皇帝的手亲个嘴，不成体统，干脆免去，否则会貽笑大方。

黎明时分，着意打扮的英国使臣，在中国陪同引导下进入热河行宫。沿着乾隆亲笔所题三十六景中的松鹤斋、如意湖、青雀舫、知鱼

矶、萃香泮……走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万树园皇帝驻辇的高大御幄前，只见满蒙王公与合朝大臣已早早盛装在此静候。过了一个多小时，方听到鼓乐齐鸣，呼报皇上驾到，所有中国的王公大臣纷纷爬伏在地，磕头俯拜。唯有马夏尔尼一行站立在中间，显得十分突出。

待皇上坐定，马夏尔尼特使双手捧着一个盛着英王国书的木盒，行英国屈膝礼跪一腿呈于乾隆面前。乾隆皇帝对这个饰以钻石的木盒，连看也不看，顺手递给站立一旁的太监，取过一只白色玉如意递给马夏尔尼特使。这是中国皇帝赠送给英国王的最高礼物。也是中国史上第一次由皇帝本人亲自赠与外域国王的皇家王柄。然而，在重视科学技术的英国使臣看来，则是一根既不值钱又无艺术价值的长石头。接下来，山珍海味的宴席开始，英国特使被召到皇帝御酒赐饮，威仪无尽的脸上露出一个高寿老人的圣恩远泽和慈祥兴致：“你们国王年岁多大了？”“有多少妃嫔和孩子呀？”当他听到英王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女也远未达到自己27个数目时，不禁为夷人不重视后代继嗣叹了一口气。

觐见后，马夏尔尼特使被请到和坤座前。和坤关切地询问了贵宾身体和夷岛气候后，说道：“皇上担心你们洋人不适应北京气候，霜降后非常冷，替你们设想，请尽快赶回去吧。”马夏尔尼一听，简直懵了，他以为皇帝接见只是此次访问的开头，怎么就结束回国呢？他委婉地提出英国要和中国永远共敦睦谊，自己作为英国久住北京的代表，应直接共商两国间的“正事”。并欢迎中国派遣政府使臣到英国，一切费用包括船只可由英国筹备代办。和坤听完只吐出两字：“送客”。

大失所望的马夏尔尼一回到北京就病倒了，头发也一下子灰白

了许多。他不甘心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抱着病体——拜访朝廷中的达官贵人，将搜罗来的望远镜、怀表、粗微透镜等等西方“小玩意”，作为礼物赠送给办事的大臣，但得到的仍是婉转催行的劝告。后来，马夏尔尼探知武英殿大学士福康安极受乾隆垂青，便找机会连连拜访，尽管他打心眼里看不起持矛张弓的中国军队，嘴上还是连捧福康安是中国精通兵法，驰名中外的杰出军事家。不过，福康安对他的吹捧毫不在意，当特使先生提出由英国卫队进行欧洲火器操练表演时，骑马挥刀操法，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也可，不看也可！”

10月1日，马夏尔尼特使拖着忧病之身再次被召到和坤的中堂，送别的仪式俨然不再容许他多留一天。中堂内摆着铺着黄缎的高椅，中间放着乾隆皇帝致英王“敕谕”黄封，让特使对黄椅、黄封行“接受礼”后，和坤让人指点着一旁桌上放的许多黄包，告诉哪个是给英王的，哪个是给特使的，哪个是给随员的，并将马夏尔尼特使赠送诸大臣的“小把戏”一一退回。

心头压上沉甸甸铅块的马夏尔尼特使回宾馆后，为使这次来华使命有所交待，硬着头皮又写出一个“说帖”，恳请中国政府批准英国派人驻京负责商务，准许英商在广州之外的沿海口岸交易，准许在北京设立一个商馆，或给小海岛一处作为收发买卖货物“特区”，并请中国录赐一份税率表，以便英商遵行纳税……



10月6日,马夏尔尼看到了由清廷官员送来的“批件”。乾隆皇帝针对他“说帖”提出的“干求”,逐条驳斥,毫无通融余地。大概内容如下:

英国贡使乞求贸易,还要在天朝京城另设洋行,甚至还欲求小岛屿泊货停歇,这些都断不可行,与天朝抚惠四夷统相背道。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若都象英吉利那样要求辟新地、设洋行、广贸易,那天朝疆界版籍岂不乱套了吧?况且语言不通,礼仪不懂,律令不熟,外夷洋商诸多不便,实不可行。念你国僻居荒远,对天朝体制不大清楚,所以命大臣向贡使详加开导,遣令回国。

马夏尔尼硕士和斯当东博士仔细阅读了这份他们在西方世界从来未领教过的外交文字——“敕书”,不觉悲从杯来,潸然泪下,归国后无法也无颜向大英帝国乔治三世国王交待。他们忧心忡忡,满脸愁云,束手无策,只好互相安慰:

“中国向来盲目自大,闭关自守,不知国际趋势,并不是有意排斥,恶伤我国。现今文明各国通行的缔结条约,互通工商等办法,他们统统都不了解。”

“是的,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永远固执不化,这次来华侥幸准予觐见皇帝,纵然时间太短,但已打开了铁幕大墙上的缺口。只要耐心联络,将来瓜熟蒂落,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正副使臣没有完全失望,等待着枯木逢春,有朝一日再回到这美丽宁静、夕阳黄昏的东方古都——北京。

公元1793年10月7日英国特使离开北京,经过近三个月的陆路到达广州。1794年1月8日,怅惘的马夏尔尼特使登上了早已停靠在黄埔港口“狮子号”战舰,向

东方这只朦胧未醒的睡狮告别。

这趟历时两年多,漂洋过海,耗资巨万远访就此结束了。平静的黄埔港一片渔舟唱晚、帆影点点的祥和景象,几乎没有什么送行的人,就连那个从北京一路护送的王大人,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到船边相送,所有周边国家贡使离去时都是这样的情景。我们无法推测马夏尔尼的心情是否凄凉、孤寂,只知他后来又担任南非好望角总督,一直到61岁才卸职。

英国庞大的舰队满载着茶叶,生丝等中国商品离港而去。那是马夏尔尼特使初到北京时恳请清廷特许,派“印度斯坦号”前往舟山免税采购的。带走的还有乾隆皇帝正式致英王的“黄封”,一份答复马夏尔尼特使请求的“敕谕”,以及十数箱各种各色天朝赐礼,特别是那个类似玛瑙的灵芝云叶头形的白色玉如意——堂堂天朝皇柄指划的象征。

这,是否预示着乾隆老人把关系着国家,民族命运的抉择权交给了大洋彼岸的大不列颠王国,是否意味着东方文明古国不知不觉昏昏懵懵地失去了一个主动改革开放、适应世界潮流的历史性契机,对这不幸或有幸都需要时间的检验。

马夏尔尼使团离华10年后,又一个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勋爵抵中国,因不行三拜九叩的“谢宴礼”,刚到北京就被乾隆皇帝的儿子嘉庆皇帝驱逐,理论是“大皇帝并不稀罕西人所谓宝物,以后再不要万里贡献了。”他返回国后提出对中国“用武力强迫其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

40年后,英王直接任命的商务监督律劳卑海军上校到达广州,因主客见面上下席座位不合乎中国礼节,被限期离开中国。律劳卑

不肯依从,导致中英贸易中断,英国商馆内中国员工全部撤走,英国两艘巡洋舰闯入珠江示威,中国朝廷下令包围商馆,迫其撤退澳门。

又过六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

我们如果把这一串由西方先进强国和东方封闭大国之间展开的争执,从中国这头看,结果大概更让人伤心。

马夏尔尼特使离华10年后,中国禁止西洋人刻书传教,并把在北京散发洋书的夷人德天赐押往热河圈禁,撤毁一切天主教堂。以后又命各省查禁西洋人和传教活动,杜绝内地“汉奸”与外夷勾结或串通外商。

20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输入中国鸦片每年3,698箱,海关外流白银数百万两。清廷严禁私人挟带鸦片,同时禁绝一切外来“奇巧物品”,以杜漏后。又20年后,鸦片走私增至每年28,307箱,外流银子仅1832年至1834年竟达二千余万两,其它年份海关无法统计。

又六年后,虎门公开销毁鸦片20,283箱,共1,188,127公斤,中英贸易停止。双方走向矛盾不可调和的最高形式的对抗——战争。结果是封闭落后的天朝大国虽四亿零一百多万人口,却在18艘英国军舰、汽船和不足一万名士兵队伍的进攻下一败涂地,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南京和议条约》,马夏尔尼特使近半个世纪前要求的“平等”被条约法律化,“大英”终于与“大清”平起平坐乃至骑在它的头上作威作福。这时扳起手指头算算,马夏尔尼使团离开中国48年4个月零8天,不到半个世纪。

作为历史年鉴,它无疑是一部走到尽头的失败总记录。

1949年，国民党驻外使馆第一个发动起义的外交官驻法公使的亲身经历，亲自撰写……

# 我在巴黎通电起义始末

□凌其翰

## 通电起义

1947年6月16日接到老友孟鞠如自巴黎来信，指出，大局已到转折关头，劝我想方设法，摆脱一切，出国以自救。继而1948年8月1日，我调任驻法大使馆公使。到任之日，鞠如又突然到我办公室与我密谈，劝我打破对蒋介石的迷信并以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法文本赠我，说是可以帮助我打破对蒋介石的迷信，……经过整整一年时间，陆续接触了陈立夫、蒋廷黻、宋子文、于斌等反动人物，亲自领略了他们的善行。

从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这整整一年，这批反面教员的表现象电视剧那样一幕一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无论是陈立夫、宋子文、或蒋廷黻、于斌，他们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形式，深深地教育了我，促进了我的思想大转变，正在这个时刻，孟鞠如、钱能欣同我密谈，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欠发我们的薪水已达三个月，我们大可以从索薪开始，发展成革命行动。这时，驻巴黎总领事馆胡有萼、萧君石、章祖貽也到使馆与我们频频交换意见。

1949年9月18日，驻法大使馆凌其翰、孟鞠如、王思澄、钱能欣、唐祖培、龚秉成，驻巴黎总领事馆胡有萼、萧君石、章祖貽等11人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即电外交部催发欠薪，尚于10月10日全部欠薪不能汇到，全体馆员决定停止

服务，我们还致函驻欧各使领馆，建议采取同样行动。结果，复函赞成上项办法的有驻苏联、挪威、瑞典、土耳其大使馆、驻奥地利公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驻马赛、昂维希（即安特卫普）、汉堡、利物浦等领事馆等11个使馆全体馆员与驻伦敦总领事馆副领事。

1949年9月30日会议决定10月10日起脱离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在工作岗位，保管公物文件，等候新政府接管。我们致电赞同我们索薪运动的其他9个使馆，希望他们一致行动，但一直没有答复，结果只有我们驻法大使馆和驻巴黎总领事馆两馆全体馆员始终团结一致，公推孟鞠如、胡有萼和我3人组成3人小组起草通电宣言稿。3人小组内分工是孟鞠如起草初稿，胡有萼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我定稿，宣言全文如下：

驻法大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欢腾鼓舞之下正式成立。久已背叛了孙中山的卖国贼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所把持的政权在英勇的人民革命武装奋而追逐之下，已经失去了一切苟延残喘的条件，我们一向服务外交的同仁，在极度兴奋的情绪之下，向新中国全国人民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表示热烈的贺忱和最崇高的敬意。

“中国人民大革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28年壮烈的斗争，快要取得完全胜利，军事阶段快要结束，建国工作已经开始，客观的事实要我们认识清楚，新民主主义是建设新中国的唯一途径，就是说，只有在广大工农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全国民主阶层，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够并且彻底完成中国的社会改革、经济建设和文化复兴。

“为了建设新中国，中国人民不仅需要国内统一，并且需要世界和平。中国人民必须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奋斗，使制造战争者不敢动手。

“我们要参加建国工作，我们先要痛下决心，把我们浑身封建官僚的积习、洋迷和个人主义的劣根性，彻底剔除净尽，然后才能够自己改造成人民，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

“我们郑重宣布和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自仍站在原有工作岗位上，保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人民政府接管和指示，同时，我们热诚劝告全体使馆同仁，快起来响应我们，打倒执迷不悟的死硬分子，制止他们盗用中国外交官的名义，在联合国和国际间散布谣言，侮辱中国人民，挑拨国际是非，危害世界和平”。

必须指出，我们所以选择十月十日为宣言发表之日，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我们在海外消息不灵，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日正

式宣告成立，二是因为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日，俗称“双十节”，在那天宣布起义，可能引起更大的注意，产生更好的效果。

当时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吴文燕同志与中央驻巴黎总支部孟雨同志已有联系，我们的情况早由孟雨同志通过吴文燕同志向国内汇报，宣言原文也于10月2日转电北京。

周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复电：

“巴黎前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暨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均鉴。9日电悉，甚为欣慰，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宣言亦收到。我对于你们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驻在其他国家的前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使领馆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均应效法你们的榜样，脱离反动阵营，服从伟大中国人民的中央政府，为祖国与人民立功，所有这种脱离反动阵营的有功人员，本部均将量才录用，使能对于祖国有所贡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周恩来

1949年10月11日于北京。”

我们接到周总理10月11日的复电和重要的指示后，非常振奋，就立即以“快邮代电”形式通函国民党驻外各使领馆：

“我们十月十日的宣言发表后，北京周兼外长复电极为重视，号召其他各馆响应，有功人员量才录用，并令坚守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听候接管。查此项任务的达成非无障碍。虽至今仍保持实际上的外交官待遇，天天到馆，前途亦可乐观，但为万全之计，我们均具最大的决心，绝不在任何威

胁利诱之下，退让半步，兄等尚有同样决心，切望立即参加响应，……”

### 反动派与我们反复较量

1949年4、5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对我们，特别是对我和孟翔如二人有所警惕。索薪运动更使窜逃到广州的反动外交部惶惶不安，适10月5日大使钱泰外出因车祸身受重伤，就电广州请求辞职照准，于是广州方面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

(一) 电调梁其翰、孟翔如回部。

当时反动外交部长是叶公超，除由部电发上述调令外，还由叶公超以个人名义发电给我和孟翔如，原文如下：

“此次调两兄回部实以现部中人才缺乏，诸多借重，至盼能早日返国共济危局，国内双方情形非如外传之简单，前途并非不可为，否则予早已引去”。

(二) 调驻英大使馆公使段茂澜为驻法大使馆代办，段茂澜即于10月6日抵巴黎。

(三) 调陈雄飞为驻法大使馆参事衔一等秘书，原驻英大使馆随

员赵金楠为驻法大使馆三秘。

陈雄飞于10月31日到达巴黎，因为他是我的震旦大学法科同学，到巴黎后即来我寓访问。赵金楠则随段茂澜于10月6日抵巴黎。

(四) 派新任常务次长董霖携带一笔款项于10月8日赶到巴黎。

(五) 此外，原驻柏林代表团一秘赵俊欣，驻荷大使馆一秘胡颂熙则以临时出差名义，先后到巴黎。

这一系列人事措施来势甚猛，估计由于我们择定“双十节”为我们两馆起义的日子，反动派就要想方设法，务使我们内部在10月10日以前，分化瓦解，把在巴黎孕育着的起义火种，消弥于无形之中。

于是跟着钱泰的辞职，段茂澜立刻到巴黎，董霖也兼程而来，将对我们施尽利诱威逼，挑拨离间的手段，借以破坏我们的团结。

10月5日，在段茂澜未抵巴黎前，我抢先一步到法国外交部向亚澳司长贝扬斯口头声明：

“我们全体馆员已决定脱离国民党的一切关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接管”



晚年的凌其翰

贝扬新闻后大惊，就说“当立刻报告部长”。翌日贝扬斯电话约见，由他陪同见法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礼宾司司长郑重地对我说：“由于法国政府还没有承认中国新政府，法国政府决定把你们的外交待遇维持到1949年年底，届时仍可接洽延期”。

我又说：“我们将继续到使馆坚持原工作岗位”。礼宾司长答：“只要段茂澜方面没有反响，我们不干与使馆内部事务”。

其次，8日董霖抵巴黎后，当晚我在寓邸设便宴招待董霖、段茂澜夫妇、蒋恩夫妇、赵金镛、孟鞠如等。在席间，孟鞠如约董霖于翌日晚逛夜总会，董霖表示同意，席散后，孟鞠如先辞出，董霖就开始挑拨我和孟鞠如的关系，公然在客厅中与我并肩挽手，说道：“我陪你到台北，我的常职职位让给你，好在公超（指叶公超）是明白人，好商量！”我立即严肃地答复：“今天的事是革命不是做官，决不能开玩笑！”当晚董霖见我对他的诱饵竟未上钩，似乎有些失望。

翌日晚，孟鞠如偕董霖到巴黎第9区一家舞厅会谈。董霖妄想以补发欠薪打消我们的起义宣言作为交换条件，孟鞠如坚决不同意，董霖只得补发欠薪。董霖的第一步计划落空。

段茂澜和随来的三秘赵金镛妄图诱骗机要秘书龚秉成退出起义未成，以巨额美金，收买他经营的密码本亦未成。仅谢东发、耿嘉韬二人意志不坚，竟受诱骗，分别表示退出起义。

从此，大使馆6人、总领事馆3人，总共9人，团结更紧，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天天到馆，各据自己的办公室坚守工作岗位，反动派对我们无可奈何。

## 途穷匕首见

自从1949年10月5日以来，反动派和我们之间，两军对垒，反动派施尽了分化瓦解的伎俩，仅诱惑了谢东发和耿嘉韬2人，我使馆6人和领馆3人团结更紧，天天到馆，段茂澜等认为我们既已领到欠薪，自不应再到使馆，而我们则认为我们天天到馆是履行周总理关于坚守工作岗位的指示，因而反动派和起义派就处于僵持状态。到了11月3日晨，僵持状态终于破裂了，我们到馆时，大门紧闭，门外有法国警察看守。由于我们迄今仍具备外交官身份，警察也无权阻拦，忽然有人来送信，我们就乘虚而入，冲入馆内，要求段茂澜保证不破坏我们坚守工作岗位的任务。彼此相持至深夜，临时从荷兰调来的CC分子斯颂熙忽然率领反动分子30余人到场胁迫我们立即离馆，我们严词拒绝僵持至11时，忽然来了3位华侨从中调停，决定11月4日下午2时在使馆召开华侨大会，设法解决我们到馆坚守工作岗位的问题。

11月4日凌晨1时，我们才离开使馆，当即公推孟鞠如龚秉成二人连夜奔走各方发动群众，爱国侨胞和进步留学生大约百余人于4日下午2时前结队鱼贯进入使馆，为我们声援。段茂澜见势不妙，推说已与法外交部有约会，必须外出。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指定陈雄飞代表参加大会。群众要求必须保证起义人员每日照常到馆，执行周总理关于坚守工作岗位的重要指示，不得勾结法国警察予以阻拦。当场爱国群众拟定保证书，由陈雄飞当场代表段茂澜签字承认照办，并由群众推出工人代表王子卿、商界代表陈卓林、学界代表杨承宗监督执行。

当日

下午6时  
爱国侨胞  
刚散会后，  
从海牙临  
时来的CC  
分子斯颂



熙会同青田帮特务陈楚本，率领早就埋伏好的特务五六十人呼啸而出，斯颂熙、陈楚本等当场指挥，每四、五个打手成为一小组，分别团团围住，把我们拳打脚踢，我们猝不及防实处于无法抵抗的地步。我的脑袋被打了好几拳，感到疼痛不堪，还瞥见孟鞠如的眼镜已被打得粉碎，龚秉成已经昏倒在地，肖君石则被围于墙角，王思澄亦受伤……我的汽车司机法籍俄侨丹尼尔急忙央求看守大门的法国便衣警察进入使馆把我抢救出来，由丹尼尔驾车送我回寓。翌日下午，陈雄飞还假惺惺地到我寓慰，不仅巴黎各报，连欧美各国的报刊均纷纷把11月4日巴黎中国大使馆发生的行凶事件作为头号新闻来报道。法国爱国华侨和进步学生纷纷开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并向我们表示同情和声援。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巴黎大学理科同学会、留法科学工作者协会、旅法华侨工商业联合会、留法勤工俭学同学友谊会、旅法中国公费生同学会、华侨报社等爱国侨团还发表告国内外同胞书和告法国政府、人民与世界人民书为我们声援。

从此以后，我们虽不能到馆内坚守工作岗位仍在馆外继续活动，团结更紧，联系更密，分别向各自认识的旧使领馆同仁，劝告他们采取不同方式脱离旧使领馆，回归祖国；或如囿于形势，一时尚难公开响应时，则仍站在原工作岗位，暗中负责监视，遵照周总理警告，不烧毁档案，不变卖公物，等候新

政府接管，协助移交。

总之，我们的起义行动确实震撼了旧外交界，直接受我们通电而跟着响应的有驻搭那那利佛领事馆、驻利物浦领事馆等，间接受我们通电的影响，向中央人民政府新派使领办理移交的，有驻缅甸大使馆、驻吉隆坡领事馆等，个别人员通过不同方式脱离旧使领馆，并通知我们的则不计其数，我们均已陆续转报中央。

1949年11月4日事件以后，我们原分散居住在馆外，因不再有薪水收入，莫不紧缩开支，刻苦生活，行动上也各自检点。我个人因眷属众多，就变卖自备汽车、冰箱、地毯、中式家具等，筹措行资于1950年1月30日送全部眷属8人从马赛乘船返国，从此减轻家庭负担，可以一人继续奋斗候命回国。

正在这期间，国际形势略有好转。1949年12月初，英国酝酿承认新中国，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亦开始议论，我们又有接管使馆问题，就决定由我电话通知陈雄飞到我寓讨论，我还利用这微妙时刻，专程往沙特罗维尔别墅访问定居巴黎的傅秉常，傅愿以调停人自居，在我和段茂澜之间商妥折衷的办法。但段茂澜于12月中旬赴伦敦观察情况，12月23日陈雄飞来电话称，段已返巴黎，愿与我作私人会晤，并称他决不焚毁档案，变卖公物。我考虑到如果法国也随英国之后承认新中国，从现在到承认应有一过渡时期，我就提出下列四点：

- 1、使馆内外，取消警卫；
- 2、允许9人自由进出使馆；
- 3、对外不作任何声张；
- 4、请傅秉常作调停人（正如上述，我已与傅洽妥）。

我展开谈判建交的策略，借以制止两个中国的阴谋。英国则不能迅速建交，法国因越南问题更难排

上承认的日程。傅秉常拒作调停人，段茂澜答复：（1）使馆很难开禁；（2）段茂澜不焚毁公物文件。若为此二事，不必晤面。

从此，我和陈雄飞的接触就告中断。

### 京中来鸿——奉调回国

自从1950年1月，新中国承认越南并进一步建交以后，中法关系转趋冻结，我们在法的行动亦陷于困顿，幸周总理和外交部对我们很关注，京中诸老前辈，特别是黄炎培和邵力子还驰书慰勉，如下：

1949年10月12日，黄炎培给胞兄凌其峻的短简：

“其峻兄手书示及，其翰兄率先反正，为之大慰，适愿来兄来，与之共读，亦为欣佩，特以奉闻，并致敬礼。

黄炎培

1949年10月12日

1950年1月9日邵力子老先生自北京赐寄长书如下：

“寄寒吾兄惠鉴：自兄与鞠如兄等发出正义的吼声以来，不祇为外交界增光荣，亦为全中国同胞在世界上提高声誉，当宣告及电文抵达北京时，因弟与兄及鞠如兄交久知深，弟之欣忭更逾于他人，并得为周总理详言弟所知之兄与鞠如兄，惟以素性疏慵，故未奉书左右。日前承令兄抄送函稿，兹又得11月27日惠书，拜诵之余，益增钦佩。法方对兄等维持外交官之待遇，不以1949年年底为限，弟先于周总理处知之，得以稍释系念。至承认问题，据兄推测，不至迟延过久，英国既毅然不顾美方，承认新中国（或竟得有美方默许亦未可知），法国决可随之而起，此在现时必已成为兄等所洞察而稍释忧矣。周总理深叹国民党旧垒之中，以外交人才为最少。兄等为外交界首义

者，其关切重视，自无待言。兄等行止固可一听中央指示，果确有困难，亦可据实向中央陈述，尚须弟代陈，请即函告。此数月中，兄等维持之艰，中央当自知之，兄等可深以为慰也。鞠如兄希代致意，弟本拟作一长函，表示欣佩，兼与讨论国际现势，而一念及鞠如兄之猛进，则深觉无庸辞费，兄为我代致拳拳足矣。驻欧外交人员中尚有不愿为顽固反动派之殉葬者否，回头纵迟，胜于直堕崖底，兄等能加劝告，亦大功德，至少望彼等能接受周总理最近警告。我们相晤或不甚遥，当紧紧握手，此颂健康。诸位先生均此致敬礼。

弟邵力子手上1月9日

我先后收到黄邵两老从北京来鸿，特别是我们于1950年5月在归国途中，还接到黄任老从法邮马赛曲号所转来的口信说：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已在台北对我们发出通辑令敦嘱我们要注意警惕，对我们如此关怀，不胜感激。

1950年3月30日，我们接到周兼外长指示：凌其翰、王思澄、唐祖培、龚秉成、胡有萼、萧若石、章祖貽等7人及眷属即调回国，孟鞠如、钱能欣二人仍继续留在法国待命。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拨汇相应的川资和生活费。当时，除我的眷属已先遣返，唐祖培因准备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考试，暂留巴黎外，我们6人和眷属总共不下20人于5月5日在法国马赛乘法国邮轮马赛曲号东归，5月末抵香港，由中共联络处张铁生同志主持接待，6月初即离港赴广州转车北上，6月9日安抵新中国伟大首都北京，欢欣之情，难以用笔墨所能形容。

（本文作者起义时任国民党驻法国公使，回国后任外交部专门委员，晚年为全国政协常委。）



# 民乐大家朴东生

□晓东

一台悠扬的民乐演奏会，在台北“国家音乐厅”肃穆高雅的殿堂中回荡，牵动着海峡两岸同胞的心。祖国的蓝天白云，锦绣的江河山川、灿烂的文明历史、民族的气节尊严，在一位指挥家潇洒的动作和神奇的指挥棒下，化作音符，浪浪不绝地奔泻、流淌，融进每一位龙的传人的心中……

这是1993年6月19日台北市国乐团第70次音乐会。大陆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朴东生应邀客座指挥。音乐会演奏的曲目除两首乐曲之外，全部是朴东生个人的作

品。

作为民族音乐家，朴东生在海内外音乐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早在1952年，年仅18岁的朴东生便以其处女作《苗族见太阳》在乐坛崭露头角，此曲成为共和国成立初期几首流传最广的民乐作品之一。1955年，他与人合作谱曲的童话剧《马兰花》音乐又深得苏联专家的青睐，此剧近40年来一直保持着全国最优秀儿童剧目之桂冠。

1956年，他创作了二胡独奏曲《在草原上》，不仅随即出版、录制唱片，一时间成为演奏家们争相上演的作品，还被全国各音乐学院选为二胡高年级教材。

1957年，他编配的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又一炮打响。1977年重新改编后，一直被中央歌舞团、中国电影乐团、中央民族乐团、辽宁歌舞团、新加坡广播华乐团列为保留节目。

1959年，朴东生又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而创作了一部建国以来第一部超大型的民乐作品——《江苏民歌组曲》。

80年代的新作

《洪湖主题随想曲》、民族交响诗《牡丹仙女的传说》又为人们展现了艺术家更加成熟、更加完美、更加深厚的艺术功底。

1987年，盛大的第一届中国艺术节拉开序幕。开幕式的第一个节目，是一出动人心魄的千人“中华大乐”。其声势之浩大、场面之壮观，均为海内外各界人士叹为观止。为演奏这台“中华大乐”，全国共调集了30多个艺术团体、千名演奏员和许多优秀的演奏家，在9个场地分片排练，——300把胡琴、200多弹拨乐、30多台扬琴、50余人的打击乐群同台共艺气势磅礴，热烈非凡。

这规模宏大、历史空前的巨型民族乐队，不仅由朴东生做总联络员，组织协调，他还亲自指挥了一曲已为海内外所家喻户晓的民乐名曲《金蛇狂舞》。

为适应大乐队的演奏，朴东生先生对乐曲进行了大胆独特的改编，强调了传统风格，又增强了现代艺术的魅力。段落衔接上，采用了假转调的手法，强化了调性对比，使全曲风格又有了独到的延伸。

新闻评论这样赞誉朴东生

“在他的指挥棒下，似乎有两条熠熠发光的火龙在烈焰之中热烈欢腾……。”

朴东生曾悄悄对一位知心朋友这样说过：“小泽征尔比我还小一岁，能成为世界级的指挥大师，我就不服这口气！我们的成长条件不同啊！”

当小泽征尔在世界乐坛享有国际指挥大师之盛誉的

人海  
浪



著名民乐指挥家、作曲家朴东生

辉煌时，朴东生这个心比天高、不甘沉沦的艺术家，却被关在牛棚里。

1972年，他因开罪了当权者，被下放到工厂当工人，并被宣告禁止全国内任何一家文艺团体接收录用他。这无疑宣判了他艺术生命的死刑。他不甘心就这样向终身追求的艺术告别。尽管严重的胃病折磨得他痛不欲生，但他硬是冒出了一个念头——著书立说。

当时，我国实用的指挥法教材，都是国外的译作，用外国人写的指挥法来指挥中国的民乐，总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这种不尽人意一直在中国持续了几十年。朴东生瞄准了这个空白，一头扎进指挥法的著作创作中。当他苦苦奋斗的几年，《乐队指挥法》脱手之时，严重的胃病已发展到非要切除不可的程度了。在被推进手术室的前一刻，他拉着妻子的手，唯一的嘱托，就是这本书。

近几年，我国民族音乐受到港

台、西方音乐和影视的冲击，步履维艰，朴东生十分焦虑。他有个绰号——“拚命三郎”，他和众多志同道合的同行们一起，硬是在民族音乐的低谷中拉起了第一届“全国民族管弦乐展播”和“龙乐音乐周”。全国40多个民族乐团（队）参加了展播活动，对民族音乐做了一次极好的宣传。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把这位著名的、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的企业家推到了一个充满竞争机制的文化企业之中——他忽然之间成了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的副社长、社长。

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朴东生仍念念不忘艺术之本。他通过各种音像制品，引进西方文明，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他学习他本来不懂的企业管理、录音录像制作、版权、版税知识，钻研与外商的谈判技巧，以他的“大家”风范和艺术家的名望，为国家的音像事业谈成了一个又一个项目，完成了

一件又一件大事。

目前，朴东生先生所主持的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不但在上海、海南、南京、湖北等省市成立了直属机构；与香港智才集团建立了合资企业；还在美国洛杉矶、日本东京及台湾等地建立了销售公司。

在紧张的工作和商业竞争中，朴东生先生从没停止过他的艺术创作。但他占用的却只能是唯一属于自己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睡眠时间。他常常在凌晨起床，伏在五线谱上“发豆芽”。目前，他正抓紧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阿里山素描》，准备于1994年再次赴台湾演出时公演。

“这首作品倾注了我全部的情感，我象绣花那样精心地创作，我要把它献给海峡两岸一直关心我、支持我的朋友们，为促进祖国早日统一，在有生之年多做些我该做的事。”

### 愿《女子世界》成为您的朋友 愿您成为《女子世界》的朋友

#### 欢迎订阅《女子世界》

《女子世界》——全新的世界、多彩的世界、与众不同的世界、拥有几十万读者的世界。

《女子世界》注重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贴近生活、贴近心灵，为您排忧解难，为您走上致富之路、成功之路助一臂之力。

《女子世界》追求时代性、追求

美、追求新，使您开阔眼界，受到后示，去开创新的生活。

主要栏目有：“名人长廊”、“影视”、“婚姻与家庭”、“三百六十行”、“女性与社会”、“往昔风流”、“七彩人生”、“国外妇女”、“情感世界”、“你同样美丽”、“家政广场”、“致富信息”、“警世篇”、“处世艺术”等。

《女子世界》封面新潮美观、版式新颖大方、印制精美、出版准时（每月1日出版）。国内统一刊号：CN13-1034/C。邮发代号：18-20。订价：1.40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社址：石家庄南马路244号。  
邮编：050051 电话：727871

### 炎黄春秋杂志社首届理事会名单

理事长：杜导正（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副理事长：贝兆汉（广州白云山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广尧（黑龙江省广泰实业公司总经理）

理事：白亚南（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总经理）

蔡道峰（广东潮州市振园运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林春露（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会主席）

秘书长：徐孔（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经理）

# 都市時空



攝影 / 鄒大力



## 林彪集團主犯受審



## 開國第一假藥案

張震上將與長江三峽  
剿共“名將”張輝瓚的“輝煌”與哀傷

作家蕭軍與胡乔木交往軼事

# 國門內外的倒爺

